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开沅 余子侠\主编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程斯辉 孙海英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

——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

○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第一辑

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开沅 余子侠\主编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程斯辉 孙海英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程斯辉,孙海英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章开沅,余子侠主编)
ISBN 7-5328-3655-X

I. ①厚... II. ①程... ②孙... III. ①吴贻芳—生平事迹 ②高等学校—学校管理—中国 IV. ①K825.46 ②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645 号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章开沅 余子侠 主编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程斯辉 孙海英 著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2092663 **传真:** (0531)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8.75 印张

插 页: 17 插页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3655-X

定 价: 47.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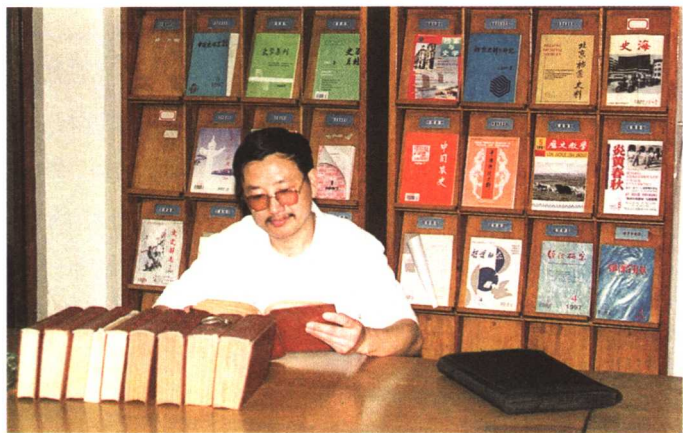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主编 章开沅，浙江吴

兴人，1926年生。1946—1948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5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90—1995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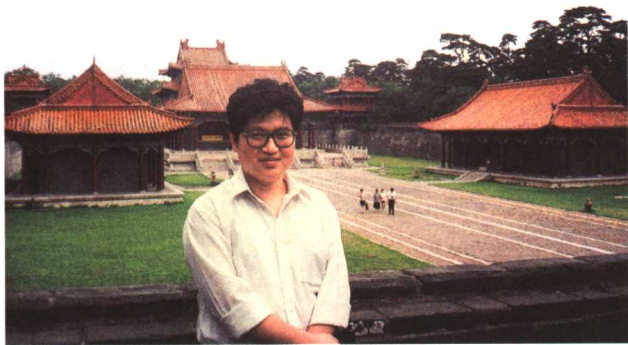
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等。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市民证书。撰著及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张謇传》《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实斋笔记》《鸿爪集》等。



主编 余子侠，亦名子峡，湖北蕲春人，1953年生。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生。先后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华中师范大学获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其学术研究涉猎教育学、史学等学科领域。撰著主要学术著作《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等。先后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研究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10篇为国家教委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育学》、《中国现代史》等刊转载。参编的多部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科类一、二等奖。



本书著者 孙海英，1948年7月生，江苏南通市人，197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以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哲学原理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统战部部长。主要教学科研方向为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史，曾多次获校教学成果优秀奖，优秀教材奖。出版编著《科学技术与社会》（1995年南京出版社）、《科学技术概论》（1998年南师大出版社）等，发表论文10余篇。20世纪90年代初兼任党务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开始金陵女子大学校史的研究，已出版《金女大大事记》，发表《试析金陵女子大学办学特色》《吴贻芳教育思想初探》《吴贻芳教育伦理思想》《著名爱国教育家吴贻芳》等文章。



本书著者 程斯辉，湖南省南县人，1962年4月生。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86年毕业，先后获教育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93年、1995年，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曾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现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教育管理学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湖北省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与教育管理问题研究。出版专著及主编、参编著作15部，专著有《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中国教育管理模式研究》《科学兴国的先驱——教育家张謇传》等。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高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湖北省1991—1994年度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8）二等奖。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博士（1893—1985）。



1907年吴贻芳全家与陈叔通兄弟合影（前排左起吴贻芳的父亲、妹妹、母亲、祖母、陈仲恕、陈叔通，后排左起吴贻芳、姐姐、哥哥）。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绣花巷校门。



二十年代吴贻芳在金女大校园。



1919年，金女大的全体同学留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吴贻芳。



1919年吴贻芳（左二）在金陵女子大学绣花巷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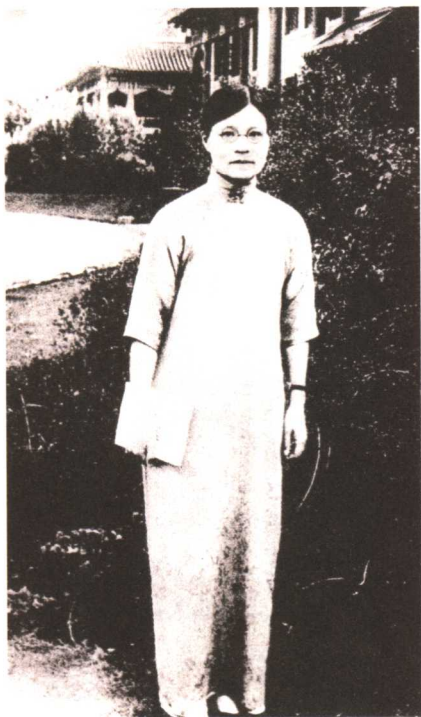
吴贻芳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摄于1928年）。



20年代的吴贻芳（右）和同班好友徐亦蓁。



吴贻芳大学毕业照。



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摄于1928年）。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紫色校旗和校徽。



吴贻芳（前排右五）、德本康夫人（后排左四）与毕业生合影（摄于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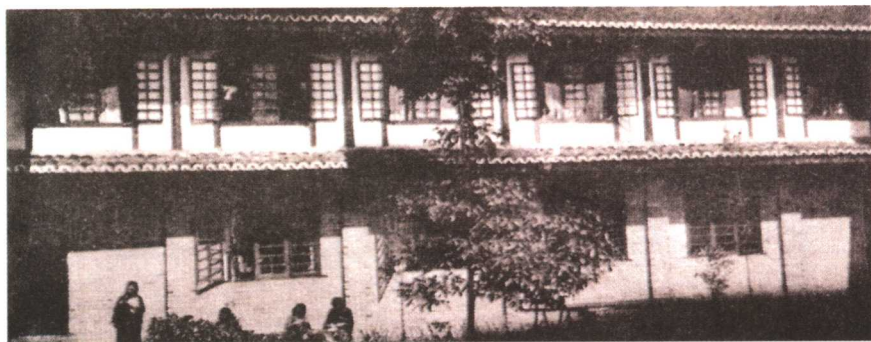
吴贻芳（2排右3）与美国密执安大学同学合影（摄于1924年）。



吴贻芳（前排左6）与全体教职员合影（193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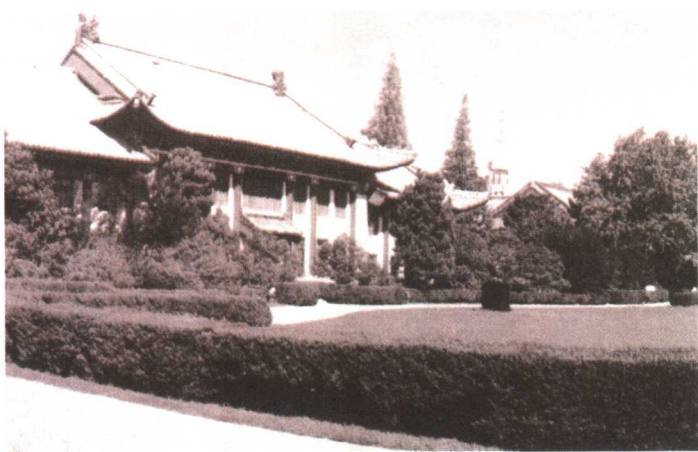


金陵女子大学陶谷校园图书馆（摄于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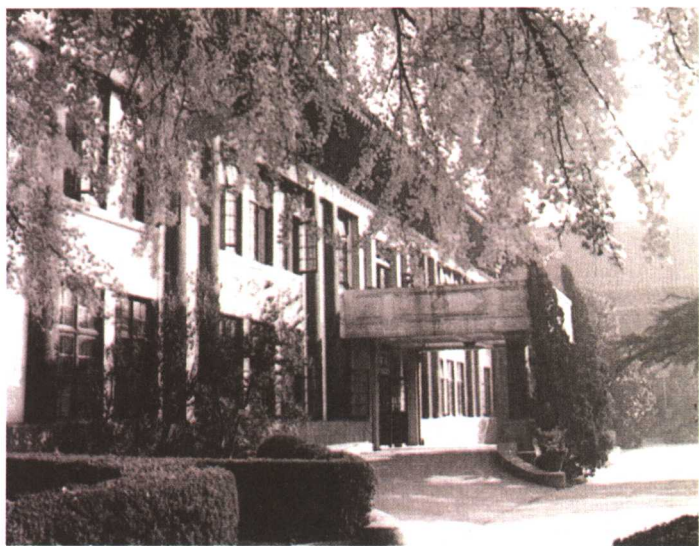


金陵女子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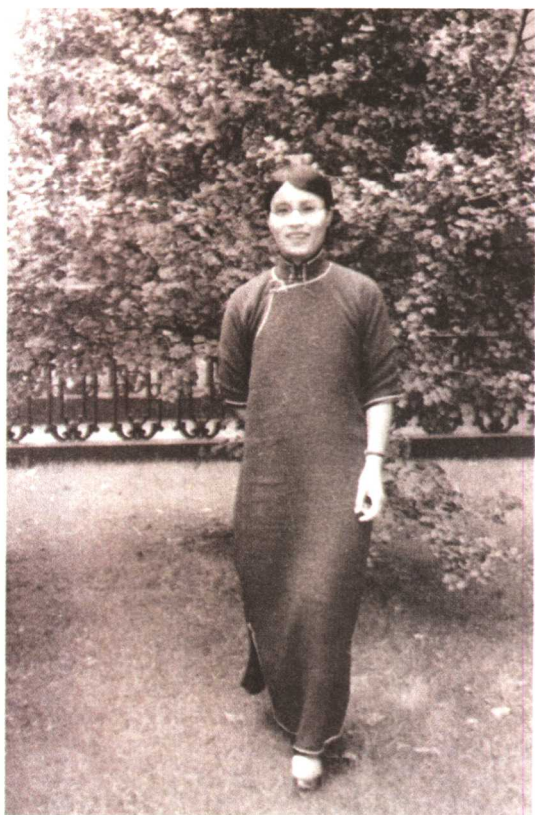
原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楼，
现南师大的迎宾楼。



原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楼，
现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楼。



吴贻芳



吴贻芳校长在美国波斯顿（摄于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吴贻芳与国际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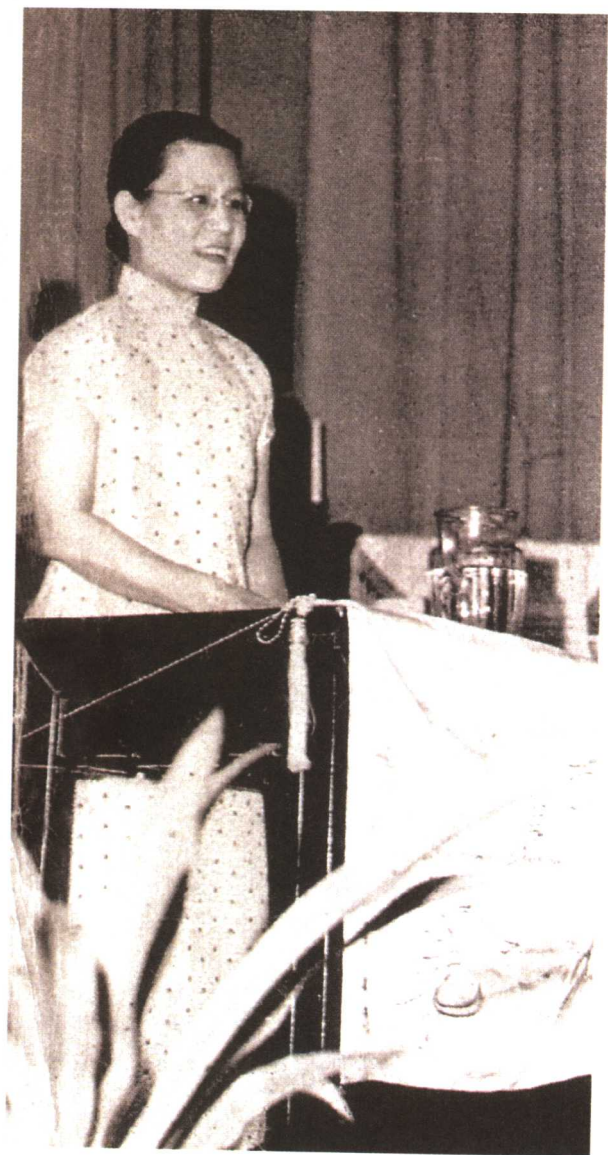


1940年吴贻芳陪同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三姐妹视察金女大。



吴贻芳在联合国制宪大会上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摄于一九四五年）。

吴贻芳



吴贻芳在美国向华侨妇女演讲(摄于一九四五年)。

吴贻芳

吴贻芳在美国（摄于一九四五年）。



和平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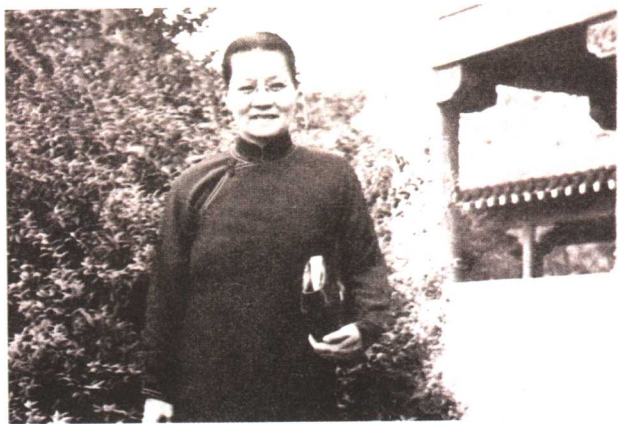
吴贻芳



吴贻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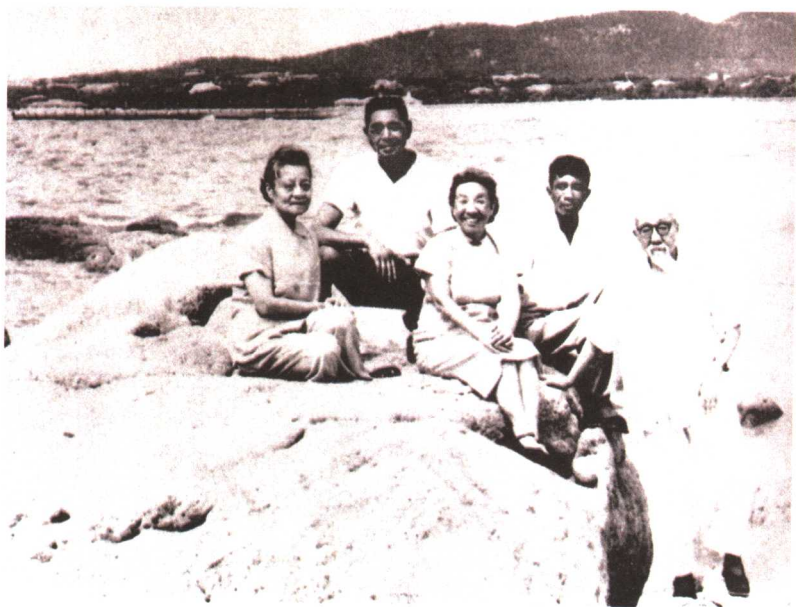
吴贻芳题词（摄于1945年）。



吴贻芳校长上班之前（摄于1948年）。



吴贻芳校长在办公。



1963年夏天，吴贻芳（左一）和陈叔通（右一）及其家人在北戴河疗养。



1973年，吴贻芳接见香港新闻大学教授。



1973年8月吴贻芳会见美国实业家缪云台先生（中）。



吴贻芳校长荣获智慧女神奖（摄于1979年）。



1979年6月，吴贻芳会见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1979年吴贻芳（前左一）到美国各地看望金女大旅美校友，前排右一为蔡路德教授



1980年，吴贻芳接见国际友人汤姆生。



40年代的吴贻芳



70年代的吴贻芳



吴贻芳（中）与旅美校友朱觉方教授夫妇。



总

序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



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释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



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





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筑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



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





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



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 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



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6)
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就职典礼	(6)
二、出任校长的外部环境	(9)
三、出任校长的内在条件	(18)
第二章 培养人格、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	(30)
一、金女大创始人的办学宗旨：培养为 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	(30)
二、吴贻芳对校训“厚生”的理解	(35)
三、女子人格教育主张	(37)
第三章 协调关系与社会活动	(45)
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	(45)
二、协调与教会组织的关系	(52)
三、协调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关系	(57)
四、协调与校友的关系	(63)
五、社会活动	(66)
第四章 专业设置与教学管理	(79)
一、学科设置与调整	(79)



二、特色系科及发展	(83)
三、教学指导思想	(95)
四、教学管理	(100)
第五章 学校组织与教师管理	(112)
一、学校组织管理的演进	(112)
二、现任校长与前任校长	(124)
三、校长与下属	(129)
四、教师管理	(134)
第六章 学生活动与学生管理	(150)
一、对学生活动的态度	(150)
二、学生社团建设	(162)
三、学生活动特色	(174)
四、学生管理	(188)
第七章 办学经费与学校建设	(198)
一、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198)
二、办学经费使用与管理	(210)
三、校园建筑及风格	(223)
四、校园环境育人	(229)
第八章 动荡艰难中的应对	(236)
一、应对自然灾害	(236)
二、应对政治动荡	(238)
三、应对战争环境	(239)
四、应对内战局面	(246)
第九章 学生眼中的校长	(249)
一、严格认真	(249)



二、慈爱宽容	(253)
三、平等公正	(257)
四、坚韧躬行	(260)
五、无私奉献	(260)
六、桃李满天下	(266)
 附录:吴贻芳学术活动纪要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83)
后记	(286)



31

言

吴贻芳(1893—1985 年)博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的女教育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1928 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直至解放后 1951 年金陵女子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她在校长岗位上工作了 23 年。在金女大校长任内,吴贻芳曾以著名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国内外重要的会议,曾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惟一女性成员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女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历任公立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



范学院副院长,南京师范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民进主委,省妇联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常委等职。由于教育和社会活动的突出贡献,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1943年被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在旧金山米文斯大学88届毕业生典礼上,被这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9年,吴贻芳被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授予“和平与智慧女神”奖,该奖项由密执安大学校友会授予那些终生致力于某种专业,有杰出成绩,并对社会服务事业、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为母校争取了荣誉的密执安大学女毕业生。

吴贻芳逝世以后,有关她的纪念集、传记、电视剧相继出版、公演,人们看到吴贻芳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妇女人才,也知道了她在20世纪40年代以著名民主人士身份参与重要的政事活动,了解了她的智慧与人格。但总体来看,人们对吴贻芳尤其是对她主持金女大20余年办学事迹的了解还是不全面、不深入的。一方面是因为吴贻芳注重教育实践,对教育实践的总结和对教育认识的著述甚少,以她自己的话讲:“我素来不做文章。”^①另一方面是因为金陵女子大学是教会学校,吴贻芳从事的教育事业与基督教及其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她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本人又是基督徒。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就使得人们对吴贻芳进行研究不仅面临着资料欠缺的困难,而且有着政治等原因的顾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放,人们对近现代史上客观存在着的教会教育开始给予关注并展开了一些研究,突破了过去只从政治的角度,或只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思维定式,而开始多角度、实事求是的评价与分析。这期间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开辟的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研究就取得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出版这样重要的成果。但正如章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教会大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讲得清楚,而且评论者由于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其视角与评判标准也必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得全面的理解。”^①随着对教会大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金陵女子大学,关注吴贻芳,但对吴贻芳办学实践的研究与认识依然处在零散和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而金陵女子大学作为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女子大学之一,创办和招生并非最早(比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为晚),

^①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总序》,《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她却发展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办学最具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教会女子大学，其他女子大学的校长频繁更换、影响不大，而吴贻芳主持金女大20余年，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其中有什么原因？是什么因素推动金女大的发展？在金女大的发展中，作为校长的吴贻芳起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尽可能搜集与金女大有关、与吴贻芳有关的资料，从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档案资料中，从金女大的校刊中，从金女大校长的年度报告、来往信函中，从金女大校友撰写的相关书籍与文章中，从对吴贻芳的学生的采访中，从已有金女大和吴贻芳的研究成果中来挖掘探讨、分析作为校长的吴贻芳是怎样管理学校的？她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是如何协调和处理内部与外部关系的？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战争环境，她是如何应对的？对于女学生她是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使她们在还有着浓厚封建习气的时代里走上为社会服务的前列，迎接各种挑战的？她在校长任内，金女大究竟形成了哪些办学特色而扬名海内外？她究竟有何人格魅力在教师与学生和同行中享有如此高的声誉？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吴贻芳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其办学业绩和经验，其办学思想与主张，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产生了很大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当代大学的发展和大学校长如何管理学校，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我们努力对作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吴贻芳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和研究，将吴贻芳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放在中国近代教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放在中



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来思考,以求给读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完整的大学校长形象;也因为如此,我们对吴贻芳在金女大之后即解放以后的教育生涯和社会活动没有涉猎,一则本书对吴贻芳的研究主要定位在她作为金女大校长角色上,二则关于吴贻芳解放以后之事业与活动,已出版的有关传记均有详细介绍。章开沅先生在谈到《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出版时讲,这套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读者对中国教会大学获得比较完整的印象,也多少可以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提供方便”。我们也期望,本书对作为校长的吴贻芳的研究,能够对读者了解吴贻芳的一生,了解金陵女子大学,形成完整的印象有一些帮助,对当代大学校长或即将成为大学校长的人们寻找历史的启示与借鉴有一些帮助,对有志于进一步研究吴贻芳、研究金女大乃至研究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人们有一些帮助。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第

一

章

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就职典礼

1928年11月3日,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中国人校长。

这天,坐落在古城金陵即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张灯结彩,举行新校长就职典礼。主席台上坐着金陵女子大学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和即将就任的新校长吴贻芳博士。主持会议的是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主席徐亦蓁,来宾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代表孟寿春,另有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校长等。出席新校长就职典礼的,还有全体校董、全体教职员工



与各地校友。徐亦蓁以董事会主席身份对各位来宾表示欢迎,赞扬了前校长德本康夫人创建金陵女子大学的功绩,对德本康夫人为金女大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同时宣布德本康夫人改任教师并兼任学校顾问,然后代表全体校董欢迎吴贻芳就任新校长。随后,德本康夫人讲话,并将办公室印章交给了董事会主席徐亦蓁。徐亦蓁随即介绍了吴贻芳的简历,将印章交给了新任校长吴贻芳。吴贻芳正式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接着,孟寿春代表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致词,中央大学代表俞庆棠、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代表赵运文发言,金陵女子大学教职员代表、同学会代表先后发言祝贺。在热烈的掌声中,宋美龄讲话,她着重讲中国妇女承担的教育责任,指出“如果中国妇女要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服务于全世界妇女的伟大事业,她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承担这一责任”^①。最后,穿着典雅朴素、面容端庄娴静的吴贻芳用长年不讲的汉语致答词,对各位贵宾的到来以及全体校董和教职员的信任表示感谢,说自己缺乏训练,没经验,对承担校长职务感到为难,但保证为发展金女大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尽最大的努力。就职典礼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当天晚上,学校举行宴会,一位校友代表全体学生向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赠送了礼物,这是一本金陵校刊纪念专刊和一面金陵校旗。吴贻芳在晚宴上接受了金陵校旗和一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枚金陵校徽,并再一次表示不辜负校友们的支持。

金陵女子大学是国内最早实施女子学士学位教育的高等学府。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展教会学校,尤其是创办教会大学的过程中,开始创设女子大学。最早的是1905年成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9年有4名读完大学课程的学生毕业。该校规模很小,1910年有学生8名,1912年有学生20名,1919年与燕京大学合并。华南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08年,首任校长为美国女传教士程吕底亚(Lydia Trimble),1914年开设大学本科一二年级课程,1917年创办四年制本科,1921年1月首届毕业生3人。此外,还有上海女子医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上海女子医学院1929年举行第一次毕业仪式,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创办。金陵女子大学开始就作为大学而创办,1915年正式招生,1919年第一届毕业生5人,“是最早在中国的大学里获得学士学位的”^①。学校发展到1925年,已有学生137人,“超过任何其他女子教会大学,学校有美丽的校园,毕业生很多在国内和西方的研究院深造”^②。

作为一位女性,出任一所名牌教会大学校长,不仅国内反响很大,而且引起了国外的关注。这不仅是当时收回教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②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



育权运动的成果,更是中国妇女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走出来,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和教育地位的标志。

二、出任校长的外部环境

(一) 收回教育权,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

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与时代背景密切联系。具体讲,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有直接关系。

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是由于教会教育在中国不受节制的发展膨胀引发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预定1922年3月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第11次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遭到中国进步学生的反对,并针锋相对地在上海组织起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通电全国,随之全国响应,在北京和南京等地先后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后更名为“非宗教大同盟”)和“非宗教学生同盟大运动”等团体。参加者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和各党派名流。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开会期间,他们发表宣言、演说,以科学的名义谴责宗教,并号召教育与宗教分离。蔡元培在“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宣传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成效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进而,他提出:“(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



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①

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则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校内学生的自由和参与爱国运动，进而激起教会学校内爱国师生的愤怒和反抗。1924年春天，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办理的圣三一学校的英籍校长，禁止学生组织学生会，一再开除参与爱国运动的学生，并扬言“学校内不许中国人自由”。被激怒的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发表宣言，提出“在校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的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走上战线去打倒帝国主义”。^②与此同时，广州圣心学校、徐州培心学校、南京明德女校、福州协和中学等十几处教会学校学生也纷纷起来抗议学校当局的罪行。他们提出了“反抗‘洋奴化’教育”，“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绝对不容许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于中国教育界”等口号。^③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反过来促进了非基督运动的深入。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深入，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1924年6月，广州学生会发表《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殖民地教育政策，“使中国学生洋奴化”，“使学生忘了其种族、国家、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观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9页。

②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念”，因此坚决要求“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的教育权”，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政府立案，课程设置要受中国政府的支配，在校内不得进行宗教宣传、教学和强迫学生做礼拜、诵圣经。同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3届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收回教育权问题，一些著名学者、教育家范源濂、章太炎、马寅初、陶行知、马君武等在会上发表演说，通过了收回教育权和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等提案。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举行第10届会议，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华办理教育事业和学校内不准传布宗教等提案。这样，由非宗教运动发展到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遂成为主要攻击目标。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形成高潮。全国各地许多著名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罢课，并激于爱国热情愤而退学。圣约翰大学学生抗议美籍校长侮辱中国国旗，阻挠学生爱国行动，全体退学，另组光华大学，自己解决学习问题。这一事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对教会势力打击沉重，并提高了曾受基督教奴化教育麻醉的青年们的政治觉悟。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北洋政府教育部对主权问题的思考，并着手实施。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凡外人捐资设立学校，须依照教育部所颁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校长须为中国人，如原系外人，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董事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将宗教科目列入



必修科。^①政府对教会学校的这些要求,实际是对教会学校原有办学宗旨和组织结构、学校管理权的否定,因此受到教会学校的抵制,尤其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规定更成为传教士和教徒反对的重点,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缓慢。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收回教育权运动随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向前推进。1927年1月,由“美国纽约万国传道总会”主办的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率先由中国人收回办理,随后,上海的教会大学沪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法科等相继由中国人收回自办。东吴大学改组董事会,选任中国人为校长;南京金陵大学改由中国籍教员维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奉行收回教育权政策。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如有特别情形者,得另聘外国人为顾问。”“私立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做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同时,大学院还在《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中规定:“外国人不得为校董;但有特别情形者,得酌量充任,惟本国人董事名额占多数;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②在南京国民政府督导下,全国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速度加快,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② 以上两个规程见《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1930 年底基本完成。至此,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打破了教会学校的独立王国地位。

正如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学校历史的卢茨博士所指出:“20 年代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上结束了一个时代。”^①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主办主管教会学校历史的结束,却是中国人自己主办教会学校的开始。吴贻芳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位中国女性,正是在收回教育权、中国人接管教会学校的大背景下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

(二) 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辞职

1927 年 3 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炮击南京,中国军民死伤 2000 余人,造成“南京惨案”。国民革命军在南京城内枪杀了几位西方传教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是其中之一。这震惊了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纷纷撤退到停在下关长江上的军舰上,多数人决定立即回国。由于外国教职员的出走,大部分教会学校不得不停课,有的甚至关闭了。不少教会学校校长在离校前匆忙地指定中国人为代理教务长,并授予紧急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权力。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德本康夫人和西方教职工离开金陵女子大学,疏散到上海,之后一个由金陵女子大学校友、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特别行政委员会承担了学校的行政责任。1927 年 5 月,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德本康夫人及外籍教员提出辞职,“希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1 页。



望学校能体谅她们的苦衷,她们这样做,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她们不愿继续在金陵工作,而为了推进学校行政机构的调整,促成一个中国人领导下的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① 德本康夫人的辞职反映了她对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认识,也反映出不情愿和无可奈何的心态。金陵女大董事会批准了德本康夫人的辞职请求,并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推举徐亦蓁为主席。此后不久,金女大董事会改组,依然选徐亦蓁为董事会主席。新成立的董事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尽快为金女大选一位新校长。

(三) 益友良师的提议、推荐

徐亦蓁作为金女大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的主席,提议由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获得校董事会通过。徐亦蓁是金陵女子大学首届毕业生,是吴贻芳的同班同学与挚友。她对吴贻芳的学识、性格、人品及身世非常了解。在金女大读书期间,吴贻芳为排解家庭不幸带来的心灵痛苦,经徐亦蓁介绍,在1918年夏天,同徐亦蓁一起去上海,在四川北路曼摩氏女中浸礼会怀恩堂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吴贻芳就任金女大校长后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和学校发展,徐亦蓁则积极募集经费,给予大力支持,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两人联手为金女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亦蓁,祖籍昆山,祖父主持昆山教会工作15年。父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和文学教授;母亲曾任昆山浸礼会女子学校校长,组织孤儿院,管理乡村卫生工作所与助产士训练所等。徐亦蓁出生于1894年,幼年在父母严谨的家训下,开始习字读书。她天资聪明,16岁毕业于上海曼摩氏女中,随后从事家庭教师5年。1915年,报考刚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心理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徐亦蓁和吴贻芳带领全校50多位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鼓动同学罢课两周。1919年6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徐亦蓁在金陵女大毕业后,应聘担任东南大学女生训导长1年,后又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和历史教师。1922年,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教育行政,副修心理学。1922年,获教育硕士,返回祖国,主管上海盲童学校、教会学校及孤儿院等。1924年,她与骨科专家牛惠生结婚。牛惠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当时远东第一所现代化骨科医院。徐亦蓁参与了募捐建院的一切活动。医院建成后,牛惠生任院长,她任职人事处,并管病人福利、骨科护士培训等工作。1937年,牛惠生不幸病故,儿子不满10岁,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沪宁一带每日遭敌机轰炸。徐亦蓁抑制悲痛,响应时局需要,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志愿护理大队长,抢救负伤市民医院院长,全国学生及战时孤儿救济会主席。1939年,为维持生活,携子到香港担任圣斯蒂文学院英文



教师。两年后去美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3年,再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攻读人事管理及学生辅导博士学位。1944年,获女生训导长(Dean of woman)专业执照。1945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吴贻芳是惟一的妇女代表。会议期间,吴贻芳聘请徐亦蓁为私人顾问。徐亦蓁知识渊博,交友广泛,对吴贻芳在许多场合的发言及演讲多有帮助。1946年,徐亦蓁出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她的发言与意见,受到其他代表注目,为中国争得了光荣。不久,她返回中国,创立全国大学妇女协会,担任副主席。金女大校董会成立咨询委员会,推举她为主席。1949年她到美国,继续从事辅导学生的工作。1951年,在纽约组织金女大旅美校友会,任第一任会长。1955年,她应聘渥州西方女子大学,担任历史系讲师、训导主任等职。当她年届65岁退休时,该校为答谢徐亦蓁的特殊贡献,颁赠荣誉博士学位。徐亦蓁虽在美国度过半生,但不愿长眠在异国他乡,遗嘱上写明骨灰必须撒在海上,随海浪漂流,总有一天会到达祖国的海岸,归宿在中国大地的怀抱。徐亦蓁于1981年2月1日逝世,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妇女教育事业和救济贫困慈善事业。她是金陵女子大学众多学生的优秀代表。

徐亦蓁提议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外籍董事的支持是很难通过的。尽管有中国政府颁布的有关规程限定,但像金陵女大这样的教会大学,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渠道依然是国外教会等相关机构的捐赠,外籍校长、教员无奈辞职,但决不会轻易放弃她



们的教会教育事业,选择一名中国人为校长得不到她们的认可,必然带来日后的诸多困难。当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一职时,被校董事会列为校长候选人的有两位,一位是前校长德本康夫人推荐的郝映青女士,一位是黎富思教授力主的吴贻芳女士。黎富思教授(Dr. Cora. Reeves)是美国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在密执安州立师范学院任教2年。1917年秋天,来到金陵女大承担生物教学任务,后担任生物系主任,一直工作到1942年退休回国。黎富思博士培养了一批生物学人才,第一届学生吴贻芳便是她的得意门生。当时郝映青与吴贻芳都在美国留学尚未毕业,校董事会一时定不下来。后因吴贻芳可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再加上徐亦蓁提议,黎富思的力荐,校董事会才最终决定聘请吴贻芳为校长。“决定一宣布,黎富思博士喜极而流泪。为吴贻芳担任校长之事,黎富思博士耽搁了去纽约法院办理继承遗产的法律手续,而损失了25万美金。对此,这位教师没有半点儿后悔。吴贻芳当了校长后,黎富思博士更是鼎力相助,金女大生物系在她的领导下办得十分出色。”^①黎富思博士60岁退休后,回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在西部的黑山建了一座“金女大之家”,以供金女大留学生假期休息之用。“金女大之家”房子不大,设备比较简单,厨房北窗旁设饭桌,上挂一张吴贻芳半身像,《圣经》一部,表明这位在金陵工作了20多年的老教授对金陵女大的深深牵挂、怀念和对吴贻芳的敬重。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72页。



三、出任校长的内在条件

(一) 留学经历、博士学位

金陵女大校董事会请吴贻芳小姐前来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建议,得到金陵女大行政委员会的投票赞同。但这时的吴贻芳正在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写作毕业论文阶段。金女大董事会便通过设在纽约的金女大托事部向吴贻芳转交了母校拟聘她为校长的信函。接到母校的来信,吴贻芳非常高兴,但对请她回校担任校长,思想上没有准备。她是学生物的,曾想回国继续钻研生物学,用科学来拯救国家,也曾想回母校做一名教师,以教育来拯救祖国,并报答母校培养之恩,从未想到去做校长。吴贻芳考虑再三,迅速给金女大校董事会复信,对全体校董的厚爱表示感谢,同时表明自己与母校有存亡关系,倘若母校急需她回国维持,虽论文未答辩,也可以立即回来相助,只是校长一席不敢接受。金女大校董事会接到吴贻芳的来信,更认为选人正确。考虑到吴贻芳很快将完成学业,在立即发出聘书,请纽约托事部转交吴贻芳的同时,告诉她不必急于回国,可先往纽约接洽事宜,参观考察美国的女子大学,作为以后办学之参考,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母校接任。这期间金陵女大的工作继续由德本康夫人负责。

吴贻芳根据母校董事会的要求,前往纽约接洽相关事宜后,开始参观考察美国一些著名的女子大学,“从学校的办学宗旨、规模、经费来源,一直到生源情况,课程设置等



等,都逐一详细记录”^①。除了参观考察外,吴贻芳还举办演讲会,介绍中国以及金女大的情况。考察结束后,吴贻芳从纽约回到密执安大学,夜以继日地撰写博士论文。由于吴贻芳学习成绩优秀,科研基础扎实,1922年下半年从北京女高师来到密执安大学留学,很快适应了学校的快节奏和高难度的课程学习。1925年,在密执安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黑蝇生活史》。由于具有厚实的基础,吴贻芳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答辩顺利,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当吴贻芳戴上博士帽,手捧密执安大学校长颁发的生物学博士学位证书时,这一年她已35岁了。接着,她给金女大发出了12个字的电报:“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

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与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历不仅是吴贻芳被选任校长的重要因素,更给她日后做校长带来了方便和益处。由于金陵女大为美国教会组织创办,主要经费来自美国传教组织的捐赠,因此,熟悉美国社会,精通英语,便使吴贻芳与金女大在美国的创办人等打交道没有了障碍。拥有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则使吴贻芳获得学术地位的认可,这对做大学校长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二) 教师经历

吴贻芳1914年杭州弘道女中辍学之后,由陈叔通先生介绍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任英文教员;1919年从金陵女大毕业后,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先生聘请,担任该校英文教师和英语部主任。据朱学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56页。





波先生所著《吴贻芳》介绍,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任教期间,吴贻芳对教学注入了深深的感情,虽然初次上讲台,但她态度认真,对学生们负责。同学们则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姐姐,有话都愿意和她讲。遇到一些基础差的学生,吴贻芳则不厌其烦地把课文中的难点分解开来讲给她们听,直到完全理解为止。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工作期间,吴贻芳不仅教英语,也教代数和别的科目,她教的英文课尤受学生欢迎。她注意教学艺术,努力使全班同学对英文产生兴趣。上代数课时,她把同学们觉得难懂的地方讲得深入浅出,使大家容易理解和接受。吴贻芳十分关心学生,除注意她们的学习外,还过问她们的生活。作为教师,吴贻芳还虚心好学,注意反思自己的不足,努力弥补。吴贻芳在武昌长大,英文字母 L 和 n 的发音分不清楚,因为这两个字母在湖北话里是不分的,“你 nai 了没有”和“你 Lai 了没有”,发音都一样。起初教学生时并未察觉。后来,有一次吴贻芳在东南大学暑假学校听了张士一先生的英语教学法课,张先生特别强调了 L 和 n 的发音区别,并教授了正确的发音方法。吴贻芳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发音有问题。返校后,她立即对自己的错误发音予以纠正,并以此为教训,把它写下来,以提高教学质量。

吴贻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敬业精神,对学生们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学生树立了师表形象,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据著名教育家陶淑范回忆,在北京女子高师做学生时,“吴贻芳老师是学生们最喜欢、最爱戴的。吴老师不但英文教得好,别的课目也很受学生



们欢迎。吴老师穿着打扮清新雅致,言行举止温文尔雅,尤其是态度特别和蔼,从不对学生发脾气,这些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对陶淑范来讲,吴贻芳老师对学生的“公道”,更使她终身难忘。陶淑范随哥嫂从齐齐哈尔来到北京读书,家境贫寒,穿着较一般同学土气。“有一天,有几位同学边走边讥笑陶淑范土气,说她不像个学生。吴老师听到这些话,站在那儿了。她没有生气,也没有发火,而是用一种平静的态度和声调,对他们说:‘对自己的同学,不应该这样。’从此,同学中没有人欺负陶淑范了。‘公道’两个字,在她脑海里打下了牢固的烙印。”^②从小失去母爱的陶淑范,从吴老师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比母爱更加高贵的感情,这就是一个教师对学生的爱。这种爱是公道的,没有私心和偏见的。后来,吴贻芳离开高师出国深造,陶淑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跟吴老师合影留念。

吴贻芳在小学和女高师做教师的经历,使她对教师的劳动有了切实的体会和感受。如何把教学搞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正确地对待学生,处理好师生关系,如何帮助同学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为师者要思考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她日后做校长管理学校,理解教师,依靠教师,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切实的帮助。如果获得博士学位的吴贻芳没有做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45页。

② 张朝阳:《陶淑范》,《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页。



教师的经历,也许能够履行校长职责,但也可以肯定,她进入校长角色的时间过程将延长,她对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举措将不会很快到位,她与教师之间、与同学之间的沟通将不会很快驾轻就熟而顺畅,因而也可能不会很快赢得教师与学生的支持与敬重。虽然没有材料证明金陵女大董事会选择吴贻芳为校长时是否将有教师经历列为条件,但可以肯定,有做教师的经历对校长来讲则是不可缺失的。

(三) 学生领袖经历

吴贻芳在金陵女大读书期间为首届学生自治会会长。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期间,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和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学生领袖的角色,使她得到多方面的锻炼。

金陵女子大学 1915 年 9 月招收新生 11 名。这一年,吴贻芳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任英文教员。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吴贻芳在杭州弘道女中读书时的美籍教师诺玛莉女士,这位教师对吴贻芳聪颖和好学上进有着深刻的印象。1915 年金女大开学后,诺玛莉女士应聘到金女大任教,这时她想起了吴贻芳,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了她的地址,便直接写信给她,推荐吴贻芳到金陵女子大学来深造。吴贻芳在姨父姨母的支持下,于 1916 年 2 月来到南京,作为特别生插入一年级,开始了她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习生活,成了中国第一代女子大学生。由于比同班同学少读一学期的书,她就用课余时间拼命把落下的课程补上。到这一年暑假,吴贻芳经过补考,门门功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是,学校批准她由特别生转为正



式生。吴贻芳深知到金女大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十分珍惜每一分钟,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生活上尽量降低标准。她平时不爱讲话,一旦讲起来却非常有条理,有魅力,特别是上台演讲,往往不用发言稿并能很快吸引听众,表现了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校长德本康夫人常常在周会上表扬她。

吴贻芳求学正是军阀割据、连年战祸、国家灾难深重的年代,尽管教会学校要求埋头读书,但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难时时地撞击着教会学校里的读书人,吴贻芳也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当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的消息传到金女大时,平时埋头读书的同学们欢欣鼓舞,集会庆祝。吴贻芳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义正词严地历数袁世凯的条条罪状,讲得有根有据,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当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成立时,吴贻芳被推选为会长,其同班同学徐亦蓁也是负责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各地。金女大学生被爱国热情所激动,学生自治会作出决议,参加罢课。吴贻芳以学生自治会会长身份,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历史洪流之中。罢课两周,吴贻芳又带领同学们复课,投入紧张的迎考复习。该年,吴贻芳和好友徐亦蓁及其他3位同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在中国女子大学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批学生。

吴贻芳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期间,由于成绩优秀,乐于助人,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有了声望,1924年被推举为





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组织换届改选,吴贻芳又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并担任了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在吴贻芳到来之前,这种职务是很难由一个女大学生担任的。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运动,当时美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国留学生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吴贻芳对日本和英国的残暴非常痛恨,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会领导人,立即组织同学们募捐、写文章,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内的斗争。1926年的某天,一位澳大利亚总理应邀到密执安大学演讲,听讲的师生有4000多人。演讲中,这位总理竟声称:“中国不能算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邻近的亚洲国家应当就近移民到中国去,改造中国。”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闻之哗然,群情激愤,不少人要求和这位总理大人当场辩论。吴贻芳更是气愤,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诬蔑。这天她晚饭也没吃,连夜挥笔写文章批驳这位总理,将文章送交学生编辑出版的《密执安日报》发表。第二天文章见了报,中国同学读了觉得解气,美国师生和其他外国同学看到吴贻芳,也翘起大拇指表示赞许。

吴贻芳作为学生领袖的经历,不仅多方面能力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培养了社会责任感、爱国精神和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献身精神。这些对于她日后做大学校长,管理学校,全身心地为金陵女大服务,无疑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四) 逆境磨练

吴贻芳接任金陵女大校长后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抗





战8年,维系学校的发展可谓艰难困苦,但吴贻芳率领金女大师生挺过来了,使金陵女大维持了独立与发展。这与吴贻芳在成长过程中经受艰难痛苦的磨练,养成了不向痛苦屈服,不向逆境妥协,坚忍不拔的性格、品质有着密切关系。

1893年1月26日,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父亲吴守训为当时的“候补知县”。吴氏家族祖籍江苏泰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吴守训的祖父是翰林,父亲是举人。吴守训是随父亲迁到武昌居住的。自吴翰林起,吴氏家族由于清廉自守,又不善治理家业,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后逐渐衰落。吴守训是吴举人的独子,生性木讷,不善言辞交际。读书虽然认真,但成绩不如上辈,好不容易考了个秀才,但再考举人数次不中。为了维持生计,便做了名私塾先生。吴贻芳的母亲朱诗阁是位大家闺秀,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嫁到吴家后,孝敬长辈,侍候丈夫,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吴贻芳之后又添了一个妹妹,加上祖母,一家7口人的生计靠教私塾相当困难。吴守训在父亲生前老友指点下,放弃私塾工作,变卖夫人陪嫁之物,走“捐纳”之路,获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空头衔。后又经人指点,再一番疏通,吴守训终于被委任为县牙厘局局长,吴家开始过上不富裕却平安的日子。1904年,吴贻芳11岁时与姐姐贻芬一起到母亲的家乡杭州,入公立杭州弘道女子学堂读书,开始了启蒙教育。紧张学习之余,贻芬和贻芳小姐妹定期到外婆家和二姨家看望长辈。吴贻芳的二姨与吴贻芳的母亲感情特别好,对小姐妹在杭州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姨父陈叔通,是杭州名士,思想开放,知识渊博,



为人敦厚善良,对小姐妹的学习十分关心,使小姐妹俩在杭州有在家一样的感觉。吴贻芳日后遭遇不幸,都是在陈叔通的帮助、开导下走过来的。

1906年底,贻芬和贻芳在姨父支持下,离开了就读两年多的杭州弘道女子学校,考入了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这所学校除了学习国语外,还特别设有英文课,并聘请外籍教师讲课。在这里,吴贻芳跟姐姐一起渐渐懂得了中国落后的一些道理,开始知道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1907年,吴贻芳与姐姐一起来到苏州,考入当时名气很大的景海女子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姐妹俩的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吴贻芳在学好其他科目的基础上,特别注重英文训练,打下了牢固的英文基础。正当姐妹俩勤奋学习,憧憬未来的时候,不幸事件却一个接一个地朝吴贻芳袭来,几乎把她抛进深渊。

1909年11月间,吴守训在湖北牙厘局任财务科长,为了一笔公款,他成了上司逃避罪责的牺牲品,倾家荡产,最后被迫投江自尽。吴贻芳与姐姐随二姨父一起赶回武汉。父亲死去,留下了吴贻芳的祖母、母亲、哥哥、姐姐、妹妹和她。对于刚过16岁的吴贻芳来讲,第一次尝到了人生苦果。生活的严酷,现实的残忍,使吴贻芳变得成熟多了。生活来源断绝,姐妹俩再回苏州景海女子学校读书已不可能,她们被迫辍学。辛亥革命后,吴贻芳一家在姨父和舅舅的帮助下迁居上海。吴贻芳的哥哥吴贻渠在清华学堂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经费来源没有着落,校方无奈只好停课,任教师们自谋生路,所有学生不定期放假。吴贻渠在北京



无法生活,便回到上海,但一时找不到工作。这样,一个依靠亲友接济的家庭,又添了一个大男子吃白饭。性格内向而又自负的吴贻渠常感无地自容,一时间悲观失望不能自拔,最终选择了一条自认为可以逃避现实、摆脱苦难的道路,借滔滔黄浦江埋葬了自己。久病的朱诗阁经不住夫逝子亡的双重打击,将家人托付给妹妹之后,也离开了人世。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夜晚,与吴贻芳朝夕相伴的贻芬悬梁自尽,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吴贻芳在世上最亲的亲人——哥哥、母亲、姐姐骤然而逝,只剩下她和9岁的妹妹贻荃以及7旬祖母。这是1912年,吴贻芳还不到20岁。20岁,是女孩子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应享受人间温暖和芬芳的季节,吴贻芳却遭受了异乎寻常的打击,只觉得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精神开始恍惚。帮助她料理丧事的陈叔通发觉了吴贻芳的异常情绪,便把她叫到面前,用极其慎重而又认真的口吻对她讲:“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你很痛苦,这我知道。但你不能乱想,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死去的人就这么撒手而去了,活着的人却要承受一切,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家里就你大一些了,你可绝不能像他们那样。现在你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9岁的妹妹,她们都需要你来照管。一个快20岁的大人了,应该勇敢地把责任担起来。你想过没有,要坚强起来,要振作起来,担起这个家,这是你应尽的职责!我认为你会想通的。”^①姨父的一席话,给吴贻芳几乎破碎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32页。



的心注进了生活的力量。吴贻芳已完全清楚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该由自己来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了。陈叔通考虑到吴家剩下3个人,吴贻芳年龄还小,又没有工作,即使有心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恐怕也难以做到,于是将吴贻芳她们老小接到自己家中,成了他家的成员。

自从贻芳姐妹来到陈家后,陈叔通对这对失去诸多亲人的小姐妹倾注了更多的关怀。他不但叮嘱妻子多在生活中照顾她们,自己也随时注意她们的思想状况。在闲暇的时候,经常把姐妹俩找来,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身陷不幸之后发愤成才的事例,以此来激励她们。1913年2月,20岁的吴贻芳在姨父的资助下,作为特别生插入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四年级学习。1914年,陈叔通到北京就职,吴贻芳也离开杭州弘道女子学堂,和祖母、妹妹一起迁居北京。不久,由陈叔通推荐,吴贻芳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教英文,开始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祖母和妹妹。

“不幸的灾难,可以使人沉沦,也可以催人发奋,磨练人的意志。坚强的性格往往不是遗传因子的作用,而是生活的逆境造就的。吴贻芳深沉坚强的性格,刚直不阿的品德,克己自制的毅力,就在这一场家庭灾难以后渐渐地形成的。”^① 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直至解放后金女大被政府收回,在20多年的校长生涯里,吴贻芳青少年时饱受生活磨难而形成的性格、意志、品质是她能够胜任校长之

^① 张竞:《吴贻芳》,《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责的重要内在因素。这里不是说一位成功的校长一定要经受磨难之后才会形成诸如坚强的性格、刚正不阿的品德和克己自制的毅力,但经受磨难而不倒,并能重新振作起来,对于一个在动乱不止、战乱不止的时代里办学的校长来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第

二

章

培养人格、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

一、金女大创始人的办学宗旨：培养为 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

金陵女子大学作为外国基督教教会在华设立的女子高等学校，创办的最初动因是为了适应基督教会女子中学之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其深层原因，是给中国女性以更高的基督教教育训练，使当时长江流域女子中学毕业生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1911—1912年，教会人士在上海举行一系列会议，计划在长江流域组建一所女子联合学院，呼吁教会女子中学的举办人将她们的毕业学生送到学院深造，“并通过培养



基督教妇女教育的领导人才而受益”^①。这所计划组建的女子联合学院变成了后来正式设立的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正式创办时,其宪章明确列出的办学宗旨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金女大得以创立。为伸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缘故,及为着教育的延伸,学校必须提供领袖训练,教育基督徒妇女,以装备她们为基督服务,并发展妇女高等教育。”^②金女大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在开学后的第二年,针对当时学校的实际,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要求我们的教师在业余时间提高自身素质,多与学生接触。我们要使任何与学院相关的问题(教育的、科学的、社会的、宗教的问题)的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要处于能够帮助低于学院水平的学校的地位。只要可能,我们将提供预测科学、教育、宗教方面的特殊课程,以便学生在服务于这3个领域时,身体、心智以及精神意志能适应其需要。我相信,学院全部学习训练对于那些有志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年轻女性来说,将是一种理想的准备。我想,这是一种她们自己愿意选择的训练。它将使我们把学院办得更有特点,更能鼓励学生树立高的目标,更能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奉献给耶稣基督和他的天国。”^③1928年,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德本康夫人在为新任校长举行的典礼上作离职演讲,重申金女大的创办宗旨,是为中国“训练基督徒

①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16页。

② 参见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29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妇女领袖”，并指出：“信、望、爱乃金女大之办学根基。金女大是以基督的爱来办学，以基督的精神来维持。这种爱植根在神的爱里，由耶稣基督彰显出来。”^①她期望学校能够继续培育学生的灵性，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来发展学生的人格。

从前引资料可以看出，创设金女大的主要目的，一是培训从事教会女子教育的领导人，二是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三是培养具有基督人格精神的人，以促进中国基督教化。就第三条而言，金女大从创办发展到1919年时，通过师生讨论，选定“厚生”作为校训。“校训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选定的，最后由董事部和金陵学院委员会予以确认。……校训——‘厚生’——在前进道路上有艰难险阻，以及人们的精神需要春雨的滋润时，是人们精神的源泉。”^②“厚生”这个词，来源于《圣经》中的一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与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义相近。金女大选定“厚生”为校训，是要告诫学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于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丰富。

金女大创设人的办学目的与当时在华的教会教育尤其是教会大学的办学总目标是一致的。早期教会学校的设

^①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第5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立,是为培训传教人员,目的是为信徒装备一些圣经、神学的知识,以便他们能协助教士进行有关的宣教工作;另一个目的则是培育信徒子女,提供所谓正确的宗教思想,以免信徒子女受“异教文化”的熏陶。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总结传教与办学的经验,认识到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因而决定加速创办教会大学。“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其他异教国家来,中国人情况更是如此。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①为了使教会教育服务于传教事业,狄考文要求“在强大的宗教影响下施教”,并为此建议学校:1. 从小规模学校开始,然后逐步扩大。2. 尽可能多地接收基督徒家庭的子女。3. 采取一些措施,保证学生不变动过快。4. 和学生应有大量的个人接触。5. 让虔诚有力的布道充满每一所学校。1907年,在华传教士为庆祝马礼逊来华100周

^①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年举行大会,作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委员会主席的卜舫济在会上指出:“我们相信怀疑教育工作功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都承认它是传教整体不可分的一部分。当我们表达一个创造的福音,一个在地上建立神圣的政府的福音,以及同时是一个拯救的福音时,我们看到办学是传教士必要的责任。特别是当人们逐渐对教会在世界的功能的了解加深广阔了后,我们明白我们不仅是从事个别的人的拯救工作,而是拯救整个社会。我们的重要目标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要影响社会各阶层,基督教要来拯救世界,使一切人际关系,无论是政治上、社会上、商业上及工业上的,都得以与神的法律和谐。而一个开明的基督教教育,是达至以上目标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显然,教会大学的设立,不仅要进一步接触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以便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所谓福音,而且要培养更多受高等教育的在华信徒,以便将来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金女大的创设目的适应了教会学校办学理念的变化,同时在金女大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传教士在举办教会教育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在吴贻芳就任校长之前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值得指出的是,金女大创办初期,创始人给金女大确立了很高的办学标准。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讲:“当时教职员只有6人,其中美籍者4人,中国籍者2人。她们第一次在中国办女子大学,竭力想把这个学校办得符合大学的要求和教会的宗旨。她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英美大学的



标准办学……”^① 把金陵女子大学办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大学,对继任校长吴贻芳有重要影响。

二、吴贻芳对校训“厚生”的理解

从1928年至1951年,吴贻芳做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23年。对于金女大创始人为学校确定的办学宗旨,吴贻芳在认同的同时,也针对中国的实际进行改造,渗透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吴贻芳曾讲:“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她对校训的赞同与理解。吴贻芳之所以赞同,是因为她看重基督的人格——基督的牺牲服务精神。1943年,她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信奉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基督徒的活动感动,看到基督徒自发地、有意识地把基督教训实践在生活里,相比之下,中国的儒家学说传遍中国,但人们没有把当中的理论付诸实行”^②。由此,吴贻芳自己也以服务人群为人生价值取向,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② 《吴贻芳1943年10月讲演》,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11/IV148,2923。





以自己的智慧和牺牲奉献精神积极服务社会。

吴贻芳作为在非基督教运动背景下出任金陵女大校长的中国人,她在尊重理解创始人为学校确定的办学宗旨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而对办学宗旨进行一些调整。事实上,吴贻芳从出任校长之日起就对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开始了调整,即淡化宗教目的,而非教会大学注重学问和道德,养成服务社会的本领的办学目的相一致。1928年11月,吴贻芳在就职致词中讲:“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她同时指出:“凡是办教育的,没有不注意学问同道德。”^①后来,吴贻芳特别强调“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乃学校的使命”^②。很明显,吴贻芳对金女大“为伸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缘故”而提供领袖训练,推进中国基督化的目的进行了调整,她把金女大办学目的的重心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了为国家培养有学问、有道德、有服务社会本领的人才上。正如黄洁珍女士所言:“吴贻芳的关怀更是广阔,她所强调的办学目的并不是在宣教的作用,她在金女大推动的基督教教育较为着重爱国的层面,是基督教教育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基督化。”^③

①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第11期,第59页。

② 1934年吴贻芳信件,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11/IV147,2904。

③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31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吴贻芳对办学宗旨的调整,也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在华捐资设学的注册要求。当时政府要求外国人捐资设立的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不得以宗教宣传作为目的”,“学校课程必须符合部颁标准,宗教课不能设为必修课”。这两项规定与金陵女子大学创设的目的是相违的。在金女大工作的美籍教师和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心目中,宣教工作是金女大的办学宗旨,如果不进行宗教宣传,不开设宗教课程,那么,基督教学校将面临严重的困难,一方面会影响创办人的资助,另一方面与美国的政教分离宪法大有出入。因此,对政府的注册要求,她们期望采取拖延的办法,因而使吴贻芳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金女大创办人与政府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办学宗旨表述办法,以便注册。对此,吴贻芳充分表现了她的智慧,使学校顺利注册,此容后述。

三、女子人格教育主张

针对金陵女大招收女生的实际情况,吴贻芳把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作为办学的目的,或者说为国家需要培养人才,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首先就要使学生具有健全人格。这是她对办学宗旨的具体化。吴贻芳讲:“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的人生有良好的发展”,“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学校教育“确非单独注意于课本上的接受,是在司教职





者能在他们整个生活中时时表现基督的真精神，以熏学子”。^①

从吴贻芳执掌金女大之后的论述、演讲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与训练可以看出，她主张的“人格教育”，首先要从细微处做起，而且要贯穿于幼教、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其次，吴贻芳强调教师人格的示范，认为没有教师的人格示范、为人师表、为人模范，对学生的人格熏陶便难收成效。第三，吴贻芳强调人格教育对于整个人生发展的作用，在她看来学生养成了健全的人格，对其整个人生都将打好基础。第四，吴贻芳所强调的人格教育的重心是道德品性养成，是导人向善，懂得如何判别是非。第五，吴贻芳强调在人格教育过程中注重个人教育，因材施教。她在《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一文中指出：“要注重特殊的个人教育，对于学生的训育和化导，一个一个要特别的注意；要知道今后的教育，是重在质而不在量的，每一人有一人的价值和性格，应视其人而‘因材施教’。”第六，吴贻芳主张的“人格教育”是德、智、体、群、灵五育充分发展的教育，是完全的人格教育。这一点表现在她对学生的要求和训练上。第七，吴贻芳主张的“人格教育”是一种爱国教育。她常对学生们说：“我们办学的宗旨，是要把大家培养成具有高尚理想，不图个人私利，掌握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与同学相互合作，对社会有精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

^①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1930年6月）。



义出发,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的人。”^①

第八,吴贻芳主张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是进行人格教育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必须指出的是,吴贻芳处在民族危机深重、战乱动荡的岁月里,作为一个爱国者,她有着国家稳定强盛的强烈愿望。因此,她主张的“人格教育”中,爱国教育有着特殊的分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吴贻芳在1936年即民国25年国庆日上讲:“对于我国的前途,还抱着无限的希望,民国成立虽有25年,在此时间,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难,果然得有今日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快乐的。”^②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9年的双十节纪念典礼中,她于演讲中提醒学生在念及为他人做牺牲外,当思及个人对国家曾付何种代价,并具体提出3点:1.在大时代中,各人皆有极大之使命,吾人对此使命要有痛切之认识。2.“拿炭烧口”,要亲自进入火中,由火与血之经验中,再生出热烈情绪,除去苟且偷安之恶习。3.当国家民族需要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否。^③吴贻芳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多是从爱国角度实施的。也正是从爱国的角度,吴贻芳不仅要求学生而且自己以身示范,投入到她所认为对国家有益的社会改造活动中,一改金陵女大对国事不够关心的形象。

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主张,是她办理学校培养人才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59页。

② 《吴校长演讲年终的感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57期。

③ 《双十节纪念典礼》,《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67期。



的具体指导思想。从实际办学情形看,她不仅这样主张,而且采取具有创建性的措施;她不仅要求学生养成人格,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努力做到以自己的人格示范学生的人格。因此,吴贻芳在金陵女大实施“人格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吴贻芳的“人格教育”主张虽受所谓“基督人格”、“基督精神”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人格教育思潮的兴起有联系。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和谐发展,培养共和国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尽管蔡元培此后不久辞去教育总长职务,但他关于教育方针的主张依然被北洋政府采纳并于1912年9月颁布施行。因此,培养健全人格的人格教育主张自然影响甚巨。虽然后来袁世凯搞复辟逆行时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宗旨,试图将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加以否定,但培养共和国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主张已逐渐被教育家们所接受,并将之贯彻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以举办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而闻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坚定地认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德、智、体三育并行发展,培养完全人格,以为社会谋进步,为公众谋幸福。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偏废。”^①

吴贻芳对人格教育的理解,反映出她由一个学校管理

^① 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者向一个教育家的转变。无论什么人在教育上做出贡献,赢得一定的历史地位,他必须对教育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些超越前人的东西或与同时代人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吴贻芳的“人格教育”主张,与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较,她结合学校的实际将基督精神渗透进人格,强调人格的爱国、奉献、牺牲品质,强调人格养成中的个别教育,强调人格训练中的完整性,即德、智、体、群、灵5方面的充分发展等,是其独特性的体现。就其对前人的超越而言,吴贻芳主张的“人格教育”主要是对女子的教育,从这一方面讲,则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真正获得平等地位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女子要受教育,但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实施,主要在闺门之内接受家庭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三从四德”。“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其中以从夫为重,强调“事夫如事天”。“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的具体要求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而要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妇言,不必辩口利辞,而要择词而说,不道恶言,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妇容,不必颜色美丽,要盥浣脏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妇功,不必功巧过人,要专心纺织,不好嬉笑,齐酒食,以奉宾客。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贤妻良母,即所谓“三代以来女子亦皆有教,备见经典。所谓教者,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①。女子不仅要受“三从四德”的教育,而且受“三纲

^①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387~388页。



五常”的束缚。“三纲”所规定的是男性权利,女子是处于最低层的。因此,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真正人”的教育,女子完全是在被束缚、受压抑的境遇中接受着训练,经过训练心甘情愿地忍受这种境遇。

近代以后,女子教育即为女子而设学校逐渐兴起,其中女子受学校教育是以教会办的女塾为发端的,后来女塾增加,女子中学出现。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了逐渐深刻的认识。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指出:中国不重视女子教育,女子长期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所束缚,结果造成占人口半数的女子愚昧无知,不能自主,这是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他要求对女子施以良好的教育,使之“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①。因此,梁启超在上海与经元善一起创设了经正女学堂,此后陆续有国人兴办女子学校。但由于封建传统影响的根深蒂固,女学发展缓慢,经元善发起成立的经正女学堂也因梁启超参与支持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停办。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重视女学,论证女学不兴之害。如有人撰文《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较全面地概括了女学不兴的弊端:“害于个人者三,害于家庭者三,害于社会者二,害于国家者二。”^② 具体所指是,害于个人者:戕其肢体,锢其智识,丧其德性;害于家庭者:贪嫠之媒,流传弱种,

①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797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92页。



家庭无教育；害于社会者：迷信僧道，败坏风俗；害于国家者：亡国之源，亡种之源。在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宣传鼓动影响下，清末政府才在制定学制时将女子教育归于蒙养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章程中。到1905年学部成立以后，才有《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女子学校教育方取得合法地位。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对女子学校教育采取提倡、鼓励政策。但袁世凯篡权后，北洋政府对女子教育的发展又采取禁止和恢复限于家庭教育的政策。如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讲话，公开声明：“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期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女子教育发展过程依然障碍重重。袁世凯死后，继掌教育部的范源濂、傅增湘等都是较进步开明的教育家，他们在女子教育方面继承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精神，采取了提倡推广的政策。如1918年6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请推广女子教育，增设师范学校及师范讲习所，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同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再次议决扩充女子中学，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及女子大学等。1919年，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作了具体规定。至于中国女子进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与男子同校读书，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过程中，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湏、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①。

^①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相比较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女子入大学读书的历史,教会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则较早。20世纪初,教会相继创办了一些女子大学,如在北京贝满学校基础上于1904年创办发展起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基础上于1914年创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正式开办的金陵女子大学等。除单独设立的教会女子大学外,其他教会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允许教职员和教会里的女子和少数开通家庭的女孩入校和男生同学。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为广州岭南大学,1920年,该校女生达28人。金陵女子大学是独立设置的教会女子大学,也是后来最著名的教会女子大学。吴贻芳在教会大学里提倡女子人格教育,培养女子高尚的人格和服务社会的本领,同“三从四德”教育相比,是一种真正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教育,是一种真正把女子当做“人”,当做与男子一样平等的人的教育,是中国女子由“非人”教育向“真正人”的教育根本性转变。





第

三

章

协调关系与社会活动

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

吴贻芳就任金女大校长后面临的第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向政府注册。一般情况下,创办学校向政府注册备案只要符合规定,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当时吴贻芳的处境则是夹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她不能只为承担承先启后的使命,履行创校人的办学理想而不顾中国时局的转变,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单为符合教育部的要求,而忽视教会的办学精神”^①。其实在两难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38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之间,吴贻芳首先面临的是金女大创始人不愿意放弃学校进行宣教、发展基督化人格的办学宗旨,她们认为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学校“不得以宗教宣传作为目的”,“宗教课不能设为必修课”是对基督教的敌意。这就给吴贻芳一个难题,即向政府注册却要保留学校的宣教性质。但她深知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不仅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做教会学校校长,重要的是反对宗教在学校教育中的渗透。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实为教育部)院长蔡元培认为:“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教会是有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天主教与耶稣教又不同。不但这样,耶稣教里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蔡元培进一步指出教会的这些特点与教育的进步性、教育的公同性以及信仰自由是相违背的,因而要求“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①。因此,大学院对一些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在注册过程中希望保留宣教目的、保留宗教课程的要求没有网开一面。这样就形成了教会学校注册期望与政府注册要求的对峙。金女大校董事会一方面认为要向政府注册,一方面希望保留学校创始人的设学宗旨。当吴贻芳主持的校行政组织向政府部门陈述学校董事会期望保留办学宗旨不被认可时,吴贻芳又加以修改以配合政府的规定,如此校董事会又不予认同。吴贻芳扮演官方与校方之间协调者的角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色,一方面试图说服金女大校董事会同意向政府注册的事,另一方面又在寻找着妥协的、双方都认可的办学宗旨表述办法。

1928年12月,吴贻芳向金女大委员会介绍了其他教会大学注册的情况,明确指出,学校的办学目标不能载有“基督教”字眼,否则注册立案不会被批准。她以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为例,办学目标、设学宗旨加以修改方能获准立案,以此建议学校董事会作出让步。吴贻芳为此还亲自拜访当时的教育行政当局,把与教育行政当局交谈了解到的情况转述给校董事会,以求立案注册之事尽速办成。但金女大董事会依然坚持办学目标中“发展基督化人格”字眼,而且金女大在纽约的委员会还提出了可否不注册的问题。为此,吴贻芳只得继续与教育行政当局联系,教育行政当局的回复是,要求学校注册的目的是删除那些只有大学名义而实质未达大学水准的学校;如果金女大不向政府注册,政府也不会把校门关上,但金女大会得不到一些利益,不能享受某些权利,如进口仪器和设备的关税减免,学生出国留学向政府申请奖学金的资格,毕业学生在政府注册的学校找到教席就业等。因此,吴贻芳于1929年5月再次给金女大委员会写信,说服修改“办学目标”的内容,希望条文不要包含“在基督徒的赞助下”、“发展基督化人格”等措辞,以表示愿意与政府的规则相协调。同时,注册迟缓也给学校带来困难,一方面严重影响学校招生,另一方面导致学生的不满,一些学生责问:为什么她们的学校在注册问题上比其他学





校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这种情形下，吴贻芳加大了注册立案的工作力度，但政府对教会大学注册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尽管 1928 年底蔡元培辞去了大学学院院长之职，教育部恢复之后的有关官员也比较关心金女大的前途，但早些时候注册的金陵大学获准在它的课程中保留宗教系的课程，金女大的同样要求没有获得批准，将哲学系和宗教系合并的折衷方案也没有得到批准。不过，教育部同意金女大在哲学系将宗教列为选修课程。经过与教育部官员反复讨论磋商，将金女大的办学目标陈述为：“指导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在南京指导一所私立女子高等学校的发展。这所学校将根据作为其创始人的 5 个基督教差会部设定的最初目的，依照最高的教育效率的标准，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使公民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发展自身的特征，使之成为同类学校的最高典范。”^① 吴贻芳认为办学宗旨的这种表述不符合教育部有关精神，需要把办学目标中的“5 个基督教差会”字眼删去。最终教育部批准的办学宗旨的中文原文是：“校董事会在南京设立这所女子高等学院，旨在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② 这样，金女大于 1930 年 12 月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完成注册。

这时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其中规定：“大学分

^{①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7 页，第 77 页。



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立为大学。不具备三学院以上条件者,为独立学院。”^①当时的金陵女大只有文、理两个学院,因此在向教育部立案注册后,金陵女子大学便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②金女大校名的更换,反映了自民国以来人们对“大学”认识的变化。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1912年10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共22条,其中规定:“凡文理二科并设者,或文科兼法、商二科者,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二科、一科者,皆可称为大学。”^③显然,金陵女大注册时,政府对冠以“大学”之名称有了更高的要求,但就金女大而言,由于创办者对人才培养标准的定位很高,对学校发展标准的定位很高,因此,其由“大学”更名为“学院”并未降低人才培养标准,相反,由吴贻芳主政,金女大的办学与人才培养,尤其是女子人才培养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吴贻芳就任校长后,注重与政府关系的协调,不仅仅表现在向政府立案注册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都主动地争取政府支持。如邀请教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到校演说、讲学,邀请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出席毕业典礼等,对提高学校的地位和和在兵荒马乱时代里维护学校秩序,都有着积极作用。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得在其所著《金陵女子大学》一书

① 中央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② 本书作者考虑到历史和习惯用法,依然用“金陵女子大学”之名称。

③ 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



中,专门记载了吴贻芳邀请蒋介石夫妇出席学生毕业典礼的事。“1934年6月,新的礼拜堂首先被用来举行大学生毕业典礼。蒋介石将军及夫人接受吴校长的邀请出席学生毕业典礼,给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蒋介石夫妇都加入了学校师生的行列,从科学厅门外一直行进到礼拜堂西门外。蒋向毕业班的学生发表了一个非正式的讲话,强调了宗教生活的重要性,鼓励高年级的学生在基督教大学毕业之后,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为社会服务。……蒋介石将军及其夫人的到来确实相当出人意外。正好在毕业典礼周开始之前,学校的一位护士遭到抢劫,并且被打死在校园附近的一条公路上。这一悲剧在几天之内将校园空气弄得异常紧张,蒋夫人曾专门派人去请吴校长面谈此事。很难想像,吴校长怎么会有时间去做这样的拜访。吴校长当然还是被请去了。结果是,蒋介石夫妇承诺出席毕业典礼,蒋将军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非正式讲话。”^①

吴贻芳注意协调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会大学向政府注册之后,教育行政当局加强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档”有关记载表明,注册之后的金陵女子大学受教育部的控制日趋严格。其中案卷号14:“教育部给金女大的密令”中的内容有:1. 加强道德训练,督促学生履行纪律生活由教育部训令。2. 教育部代电:“凡学生参加校外活动,除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法令所许可者外,应由学校校长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以示限制。”3. 陈立夫给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的教育部训令:“据密报异党在蓉活动情形。学校方面由各该校注意学生课外活动及校内学生团体之性质与其实工作,更由导师及其他训育人员,对于学生多做个别考查,切实明了每一学生之思想并积极领导之。教员中如经调查确有思想不正确者,应斟酌情形予以解职,或于续聘时特予注意,以期潜移默化,弭患无形。”4. 教育部密令:“各该校于新生训练时,应特别注意异党及汉奸分子之遏止;学生思想行为,并应由保证人绝对负责。”^① 此外,在其他号案卷中,教育部就学校总务、人事方面的事,实施导师制度的事,学生训育和军训的事,师生活动的事以及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等,都给金女大发有训令。^② 教育部的这些要求,尽管不只是针对金女大的,也包括其他学校,但表明注册之后的金女大再不是只接受美国差会创始人旨意的教会大学了。从教育部给金女大的训令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行政当局把涉及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有关问题引入学校教育领域,以防止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名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从此后的办学实际看,吴贻芳并没有按照国民党教育部的要求来管理学校和培养人才,而是根据她所认定的办学目标来培育她所期望的对国家有用的、为国家服务的人才,也没有对学生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爱国活动加以限制。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案卷号 14。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案卷号 15~20。



二、协调与教会组织的关系

作为教会大学校长,吴贻芳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调学校与在华教会组织的关系,协调学校与外国教会组织主要是给予学校经费支助的教会组织的关系。同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吴贻芳也要参与一些教会活动。教会大学虽在政府注册立案,但经费仍主要来自国外教会组织。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既要符合政府规定,又不与给予支助的教会组织发生冲突,还要坚持自己的办学主张,吴贻芳在处理多方面关系上表现出色。

首先,吴贻芳以基督徒身份出现,使得基督教教会组织能够给予她应有的信任。吴贻芳成为基督徒与她个人饱受磨难而寻求感情寄托有密切关系,与她对基督教徒的认识,如对金陵女大教师的认识有关系,同时,她信仰基督教更看重基督的牺牲精神、道德精神,由此把服务人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解放初期与吴贻芳共过事的石西民曾问吴贻芳:你为什么信仰宗教?你真的认为上帝存在?吴贻芳回答说:“一到礼拜堂里,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感情有所寄托,道德精神也高尚起来,渐渐也就成了习惯,这与迷信无关。”^①吴贻芳在1943年曾发表一篇演讲,虽然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反映出她的宗教信仰及对基督教作用的

^① 金女大校友会:《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认识。她讲：“基督教的社会福音透过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展开社会服务工作。战时的服务已令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存，不少宣教士不惜生命的危险保护同胞的性命，甚至舍身为人。这是爱的表现，是黑暗中的真光。”“我们的服务范围不单局限于不幸者，我们该把基督教的准则实行。凡事以社会国家为大前提，撇去个人利益，遵行耶稣基督的诫命，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寻求‘和平’之道。”“一个理想的国家领袖贡献最好的给国家，建立良好的世界秩序。基督教如何面对政治问题，教会与教会领袖有责任把真理传广，批评及反对违反真理的和平建议与协议，信徒有公民的责任去监察政治家的统治手腕，信徒更有责任去检视现时的制度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竭力把基督教的理念付诸现实世界。”^① 上述言论表明，吴贻芳信仰基督教，主要是要用基督教教义为现实服务，表明她不是一个简单地寻求感情寄托的基督徒，而是期望服务社会改造社会。她的观点与态度，赢得了具有同样观念的基督徒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吴贻芳以教会组织领导人身份出现，更有助于她协调金女大与一些教会组织的关系。1935年，吴贻芳被推举为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执行委员会主席，直到1947年辞去，任职达12年之久。此前，吴贻芳是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活跃分子。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于1922年在上海成立，早期的工作

^① 参阅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24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着重社会服务,认为社会服务是接触群众的最佳途径,透过生活的见证可使中国人确信基督教,并以基督教方式来改善中国。该组织用非直接方式多于用直接的宗教方式来传播教义。该组织所关怀的范围较广,由反吸食鸦片到农村重建及扫盲运动等。1930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发起五年运动,开始强调教育及扫盲。吴贻芳是一位基督徒,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故她参加了1928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年会,感到了解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情况和问题是有价值的。1933年6月至1934年2月,吴贻芳代表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赴美,并接受国际妇女会的邀请在会上演讲,其主要观点是“现在女性已拥有权利和机会,她们应做出具体的贡献,面对着经济衰退和世界各样的难题,我们应强调分享及合力维持世界的和平”^①。在美期间,吴贻芳还获得了到史密斯学校演讲的机会。这些演讲,或间接或直接地宣传了金陵女子大学。她还应邀参加联合海外宣教会议的发展会议,通过与美国教会组织和教会大学的交流,寻求加强合作的方式,争取对金女大的支持。

此后,吴贻芳作为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领导人,多次出席国际间基督教协会组织会议。如1936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委员会议,会后赴美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典礼。1938年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2届国际基督教协进会会议,任中国代表团主席,并作为会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26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论文,1996年。



议教育组召集人,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获得与会代表的广泛同情与支持。1947年,吴贻芳辞去中国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主席职务后,于1948年赴荷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大会,被聘为顾问。

吴贻芳参加教会活动并以活跃分子与领导人身份出现,不仅能够很好地融入教会组织,而且能够参与有关决策。这对于协调金女大与教会组织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海外,吴贻芳通过参与活动宣传金女大,得到不少基督教团体的支持,学校才得以维持庞大的开支。很难想像没有吴贻芳的多方活动,金陵女大没有教会组织的支持,尤其是经费的支持,吴贻芳能够执掌金女大20多年,也很难想像金陵女子大学能够在艰难中发展,培养数以千计的杰出妇女人才。

吴贻芳协调金女大与教会组织关系的另一项内容,就是调整宗教课程与宗教活动。金女大向政府注册之后,宗教教育如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必须依照教育部的指示进行,考虑到学校的性质与传统,吴贻芳采取了自由选择 and 淡化宗教课程与活动的策略。她说:“金女大在创办初期规定学生必须选读一门宗教课,每天上午必须参加早祷,时间约20分钟。1928年我继任校长后,由于受教会学校教育的影响,想不到改革,只是执行旧的传统,一切宗教性质的活动照常进行。在准备立案的过程中,宗教课才改为选修,每日早祷改为自由参加。不过,仍保留一些宗教课程,放在哲学系里。事实上主修宗教专业的人数极少,据注册处记录,主修宗教教育的毕业生只有1人。信教的教师在非教徒的学



生中进行传教活动,对不信教的学生,教师从不施加压力,主要是潜移默化。星期日的宗教仪式是在金陵大学做礼拜,由金陵大学聘请的牧师主持。两校师生自由参加。”^① 吴贻芳对金女大宗教教育的调整主要是借助外力进行的。这种调整 and 变化对金女大创始人来讲,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感到非常难过。在1930年12月,她写道:立案后学校的行政出现极大变动。学校放弃了必须学生出席早祷会及以宗教为必修课的要求。在每日早祷中,只有30%的出席率。学期初平均有50%学生出席。一年级学生出席人数少于20%。当她每次见到礼堂空置的座位时候感到悲痛欲绝,学校的士气大降。其实每日的灵修除有宗教价值外,也可唤起全体员生团队的精神。^② 吴贻芳注意到了创始人对学校淡化宗教教育和实行自由选择的不满,因此后来一些西方教师开展一些以宗教内容为主题的讨论,教师们讨论不同教学领域的宗教暗示,以及一些教师希望通过礼拜服务、查经班等活动来影响学生,吴贻芳并没有加以限制。但是,效果不如从前。因此,金陵女大便招来批评,“说金陵不是帮助学生在基督教生活中成长,没有增强学生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一个学生不能开放思想,不能利用学校所提供的机会使自己在基督教的思想 and 经验方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②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92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面日趋成熟”^①。吴贻芳便把宗教教育重任放在了外籍教师师以法身上。师以法先生是英国伦敦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毕业于牛津的桑玛威学院。同时,让德本康夫人以兼职宗教课程的身份协助师以法先生开展宗教教育。但她们开设的不少宗教课程如耶稣生平及宗教心理学、基督教与近代思想、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教会史等,并没有引起学生的更多兴趣。在外籍教师看来,学生对宗教知识了解甚少和兴趣不大,是注册立案带来的后果。但吴贻芳严格遵守注册立案的要求,同时在一些针对学生的演讲中,增加了以基督精神、基督人格要求的内容,强调学生要涵养基督的道德精神、牺牲精神,为社会服务,以此调整宗教教育改革之后金女大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吴贻芳整体上很艺术地抚慰了学校创始人、外籍教师以及教会组织对削弱宗教教育的不满,而对学校继续给予支持。

三、协调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关系

近代特殊的环境,使教会学校在向政府注册立案前就自成系统。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为协调在华的基督教教育事业,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st Books Series committee)。在此基础上,20世纪初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目的是对全国的基督教教育事业进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页。



行统筹,并鼓励教会学校间的协作与合作。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学教育组、宗教教育组、推广与成人教育组组成。其中高等教育组(又称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最早,开展活动影响很大。金陵女子大学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1921年,德本康夫人作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0位成员之一参与北美基督教差会派遣来华进行基督教教育状况调查的巴敦调查团的调查工作。这表明金女大创立之后,即注意与教会教育组织的联络,也注意与其他教会学校的联系。吴贻芳继任金女大校长后,更加注意与其他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的联系。如1933年4月,她即前往九江 Rulison 学校参加该校建立16周年庆祝活动,因该校给金女大选送了大批学生。

吴贻芳注重与其他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的关系,使得金女大在战争环境里得到上海、武昌、四川等地的教会大学的真诚帮助,而得以继续办学,保持独立,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在此尤要介绍的是金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关系。

金陵大学是近代国内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她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乾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设文、医、神3科,分别称为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另设中学部,称为成美馆。首任院长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的福开森。稍后,美国基督教会中的基督会和长老会分别于1891年和1894年在南京的鼓楼和户部街创办了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1906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4年后即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以



大学建制成立金陵大学堂,推原汇文书院院长包文为校长。金陵大学初建时,仅设文科,有外文、国文、宗教、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系。1912年增设师范科。1914年创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1916年合并为农林科。1921年改文科为文理科。理科含化学、数理两系。到1926年,金陵大学的文理、农林两科共设13个系、3个专修科,在校学生达500多人,成为一所完备的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通告收回教育主权,金陵大学遂成立新的校董会,推选文理科科长陈裕光为校长。此后,金陵大学行政权为中国人执掌,并开始招收女生。由于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在古城南京位置邻近,步行10余分钟即可到达对方校园,加上学校创设者都为美国基督教教会组织,办学目的在宣教上相通,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教师互请,有时宗教活动共同进行,学生跨校选课,成绩互相承认。在这种紧密联系之中,金陵大学有着合并金陵女子大学的倾向,抗战胜利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建议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因此,吴贻芳作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在协调与其他教会学校尤其是金陵大学的关系时,还面临着如何保持金陵女子大学的独立性问题。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学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已被政府乃至社会所接受,甚至于一些男学生认为大学必须男女合校。因此,“在这个时代,金陵女子大学要维持它自身的独立性并不容易。压力主要来自金陵大学的男学生,从他们的校园走到金陵女大校园只需要12~15分钟。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合作要求,但总是要求女子教育向男子教育的





大纲靠拢。要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和他们一起娱乐,使他们的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① 金陵女大的教职工和学生在保存女子大学身份方面团结一致,不为外力所动,针对现实问题,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与金陵大学的交流。如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组成联合唱诗班,共同参与星期日教堂服务;成立一个相互沟通的安排高级课程的委员会,对两校学生互相听课进行合理调配等。因此,金陵女子大学在30年代乃至抗战期间保持了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立性与特色。

抗日战争胜利时,美国、英国等基督教教会组织考虑到战后基督教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Chines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就金女大的发展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建议金女大与金大合并,金女大成为金陵大学的行政单位,财政独立,仍提供与妇女教育有关的主修学科,如音乐、家政、体育及社会服务等。第二条,如果金女大与金陵大学不接受第一条建议,则金陵女子大学仍保持为一所文理学院,最多招收学生250人,只提供音乐、社会服务、家政、体育学科训练。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的建议在金女大教职员和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她们不主张与金陵大学合并,希望维持其女校特色。她们的主要观点是: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给与女子教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育的机会,提供相应的师资训练,提供适合女子入读的课程,但女子学校所具有的优势在男女合校中是不能完成的。首先,女子大学给予学生机会,带领学生活动,让女教师自行策划、推行及管理校务,能够增长女生的经验,有助训练出妇女领袖人才。其次,现时的男女合校实质上不能提供平等机会给予女性。因男生人数总比女生为多,教职员方面也是男性多于女性,尽管男女合校也希望增添女教职员,但很少有妇女符合在大学任教的学历。因此,最理想的是集中这些女教师在一所大学里,以发挥其特长和影响力。第三,男女合校现时还不能做到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与女子人格的塑造。她们认为,女子教育工作必须由女教师承担,男女合校之女生人数甚少,学校不能给予密切之师生接触,就算是男校,规模完备的大学亦很少使用导师制,即每一学生有一导师带领。她们认为,即使有这种制度,也很难使用在女生身上。金女大每一学生编入一个12~15人的小组,由教师任顾问,影响力能达于每一个人。^①金女大教师也反对合并,如宗教主任师以法先生认为,如果合并,金女大在行政决策上就会受金大的控制,因为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男性服从妇女的领导,日后各系主任必然由男性出任;师以法先生还认为,合并后学生人数上升,就会使基督徒师生的影响下降。

面对合并的建议及其争论,吴贻芳态度明确,即反对合

^① 参见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73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并。她认为,一所大规模的大学与一所小型的学院合并,小单位必然要跟随大单位的作风办事。因此,吴贻芳在《战后金女大的发展》建议书上列出了金女大的要求——保持为一所独立自主的机构。在课程方面,可与金陵大学合作,这样减少仪器使用及聘用职员支出。建议书中还提及在两校校舍之间兴建新的教学楼或提供巴士服务,以方便学生上课。^① 吴贻芳的立场得到了教职员、校友的支持。金女大董事会则明确表示容许金女大与金陵大学紧密联系,但金女大的特色要保持不变。德本康夫人在谈到与金陵大学合并的建议时认为:“建议如果得以实施,将在事实上把作为女子大学的金陵淘汰掉,或者将极大地改变它的性质特征。但在最后的计划里,金陵独立贡献的价值得到承认,它的地位得以维持,这给金陵同它的邻居学校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新的希望。”^② 教职员反对,吴贻芳不赞成,校董事会的态度以及金陵女子大学办学的业绩与特色等因素,使金陵女大保持了独立。

解放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决定将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接管,改为公立金陵大学。华东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5月3日批准金大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筹委会委员名单,稍后,华东教育部批准两校合并筹委会关于系科调整及招生计划。两校合并后,仍设文、理、农三院共23

^① 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48:金女大校董会发起人会议纪录。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个系、6个专修科、2个部。9月15日,华东教育部批准新的公立金陵大学由李方训、吴贻芳、戈福鼎、樊庆笙、陈中凡、陈纳逊、高觉敷以及其他教师学生代表共13人组成校务委员会。李方训、吴贻芳为正副主任委员。公立金陵大学至1952年6月院系调整后结束。

关于高校的合分,我国近代高校产生之后即有之。从学校管理者尤其是校长的角度分析,除非不可抗拒的特殊因素,如政治力量的影响,战争因素的影响,财政因素的影响等,校长都是期望自己所办所管理的学校能够独立维持与发展的。吴贻芳作为金女大第二任校长,面临财政的压力,面临战争的压力,面临教会的压力,而使金女大维持独立并得到发展,充分显示了才能与智慧。

四、协调与校友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末吴贻芳主管学校行政之后,金女大开始重视和关注毕业生:一方面给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校友以帮助指导;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加强与校友的联络,互通信息,了解情况;第三,发挥校友在学校管理、支持学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从第一个方面说,由于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少,因而金女大学生就业情况很好,但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学校并没有采取“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的态度,而是继续真诚地给予关注、支持。1932年从金女大毕业的学生黄续汉回忆吴贻芳的事迹时写道:“即使离开了学校,您仍注视着我們,关怀着我們。1932年,我从金女大毕业后,



到上海一所学校教英语。一天上午,我走进教室上课,意外地看到母校教育学教师华群女士坐在最后一排,她认真地听了我的课。事后才知道是您让她来听我的课,让她来考查一下我是否胜任教学。我感动极了,校长,您这样关心我,几十年来每当我走进课堂,总觉得您就坐在教堂里听我的课,我竭力把课教好,不辜负您的期望。”^① 吴贻芳关注、关心校友的事情还有很多,她经常利用出访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了解毕业校友的情况,使金女大的教育继续延伸。

从第二个方面说,为了加强与校友的联络,金女大于1924年6月创办了《金陵学刊》(Ginling College Magazine),每季度一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介绍毕业同学的去向、变化。金女大在向国民政府注册后,于1933年出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刊》,半月或一月一期,刊登校园新闻、师生文章、社团信息、校友消息等。这些刊物成为校友了解学校、情系学校、眷恋学校的纽带。随着毕业生的增加,一些毕业生相对集中的地区组织起了金女大校友会,这些校友会在宣传金女大,联络校友,增进母校情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金女大与校友之间的联系有了组织网络上的保证。

就第三个方面说,金女大真正视自己的毕业生为学校发展的宝贵财富。董事会主席徐亦蓁即为校友,校长吴贻芳亦为校友,她们协掌学校,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这两位是金女大特殊的校友,那么,一些从金女大毕业的没有在金女大工作的校友,她们对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完

^① 黄续汉:《校长啊,您慢慢走……》,《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全出自对母校培养之恩的报答,而没有任何的私心。其中在办学经费上校友们尽可能给予捐赠,成为金女大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将详细加以介绍。金女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成都,经宝鸡、西安、洛阳、徐州迁返南京复校过程中得到校友相助之事,也是值得记述的。当时主要由陆路坐汽车运载行李和女生,沿途公路坑洼不平,兵荒马乱,行车安全、人身安全难有保障,返校之艰难可想而知。但最终她们安全迁返南京,其间沿途校友相助起了重要作用。到达宝鸡时,校友联络宝鸡纺织厂腾出空房,安置车队人马。启程去西安时,学校给陕西省主席——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的父亲写信,希望他提供帮助。在西安休整等候火车时,得到车站站长的关照,金女大一行人获准占用一节一等客车车厢。这位站长的女儿,是金女大1946届毕业生。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得在《金陵女子大学》一书“艰难的归途”部分将校友给予的帮助予以记载,其中蕴含着感激之情。

金女大重视校友之间的联络,重视对毕业学生的继续关注,重视发挥校友在管理学校、发展学校中的作用,而又实实在在地使校友发挥了作用,是值得深思的。尽管当时毕业生较少,联络相对容易,但若没有把校友当做学校宝贵财富而加以开发的思想,若没有将金陵女大的教育通过校友继续延伸的思想,是很难做到的。吴贻芳重视与校友的联络和发挥校友的作用,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联络上,而是从精神上、情感上,从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上加以沟通,这才是金陵女大对校友保持向心力、凝聚力的原因,也



才是吴贻芳在校友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社会活动

吴贻芳作为金女大校长,参与的社会活动主要包括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等,活动范围涉及国内国际,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界、宗教界,也包括政治领域、社会服务等其他领域。

吴贻芳刚任校长时,主要精力放在校务工作上,忙于协调与学校创办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注册等,忙于专业调整、课程调整,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推荐学生深造,参加基督教大学及基督教的有关会议,宣传金女大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贻芳由关注金女大的命运而关注中国的命运,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

1938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2届国民参政会议主席团成员。1941年3月,第2届国民参政会议第1次会议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决定,国民参政会实行主席团制,并选举出第一任主席团成员即5人主席团,吴贻芳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他有蒋介石、张伯苓、左舜生、张君勱。吴贻芳为惟一女性。“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由一位知识界的妇女担当这样的高职,是很罕见的。这不仅使中国妇女界感到振奋,也使国际社会开始注意吴贻芳的政治活动能力。”^① 据朱学波在《吴贻芳》中记载,吴贻芳出任主席团成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89页。



员后,新闻界不少人对吴贻芳作为一位学者或一名教育家的才干不予怀疑并大加赞赏,而对于她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却持保留态度。但吴贻芳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好主席”的声誉。在当时的会议上,由于各派意见不同,加上少数党阀的所作所为,往往引起多数参政员的义愤。因此,每次会议都是气氛紧张,不仅爆发出激烈的辩论,还有相互间的辱骂,会议往往难以进行下去。遇到这种情况,往往由吴贻芳出面主持。吴贻芳身着淡雅的旗袍,高高地坐在主席台正中,态度庄严而稳重,用富有条理的语言,将大家引导到关键议题,使会议得以继续进行。“在那段时间里,‘陪都’重庆的大小报纸都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夸吴贻芳是位‘好主席’,对于她作为一名政治人物的风采大为赞叹,就连那些平日最瞧不起妇女的男子,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吴贻芳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中国妇女的骄傲。”^① 1942年7月,第3届国民参政会议期间,吴贻芳再次担任参政员并当选主席团成员,5人分别为蒋介石、张伯苓、莫德惠、李璜、吴贻芳。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吴贻芳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选进主席团。

受邀加入“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赴美做抗战宣传。1943年5月,吴贻芳参加由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成的“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又称“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6位教授是利用他们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国民资格去美国宣传抗战的。当时,教育部给金女大校董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90页。



事会发有指令：“吴因公赴美，向本校校董会请假6个月（自5月份起至10月份止）。出国期间，院务由院务会议议决。”^①由此可见，“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实是政府选派赴美进行民间外交，宣传抗日，以敦促美国赶快开辟第二战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由于吴贻芳等6位教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大影响，选择他们赴美做抗日宣传是很适合的。在美国期间，“六人教授团”到了许多地方发表讲演，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除了参与集体活动外，吴贻芳还应邀出席了美国长老会全国大会、圣公会妇女部大会，列席了一些重要会议。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为了表示对吴贻芳的特别欢迎，专门召集了临时特别会议，邀请吴贻芳发言。吴贻芳以其切身经历和体会，介绍了抗战中的中国妇女和金女大，使与会者了解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尤其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也看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重建家园的意志与决心。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英、苏3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并签订《雅尔塔协定》（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对日作战，并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1945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了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

^① 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28。



名单,以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璜(中国青年党代表)、张君勱(中国国家社会党代表)、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代表)、胡适、吴贻芳、胡霖(无党派人士代表)等9人为正式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中国代表团中,吴贻芳是惟一的女性,作为教育家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这在世界各国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代表中是少有的。赴美前夕,陪都重庆妇女界在外交协会礼堂隆重集会,欢送吴贻芳,吴贻芳作了即兴演讲。她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国际联盟太重理,此第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则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目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肉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不可忽略的,不再使用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永久的和平。”^①4月15日,吴贻芳离开重庆飞往美国。4月25日,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旧金山隆重开幕,各国代表团分组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和宪章范围内的问题。美、英、中、苏四大国分在第4组,讨论非常热烈,成为与会记者关注的中心。吴贻芳走上主席台发言,充分表达中国代表团的意见,阐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吴贻芳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不少代表和工作人员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席位上,向吴贻芳表示祝贺。6月25日,《联合国宪章》在全体大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在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宪章》签署仪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94页。



式上,联合国会议指导委员会考虑到中国是最先受到侵略也是最先起来抗击侵略、捍卫世界和平的国家,因而特别推荐中国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国家。6月26日中午12时整,50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聚集在旧金山的战事纪念歌剧院,举行庄重的签署《联合国宪章》典礼。由于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宋子文因事回国(5月31日中国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推选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代表胡适因公事赴美国东部,中国代表团就由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率先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接着,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勱、董必武、胡霖依次签字。吴贻芳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代表。

作为一名妇女,吴贻芳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不仅使中国妇女感到自豪和骄傲,而且吴贻芳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中表现良好,更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政界人士频频与吴贻芳接触,讨论一些国际问题,教育界与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请吴贻芳座谈。在美国各妇女团体联合大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旧金山市长立坎夫人,特地邀请吴贻芳作为嘉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吴贻芳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和丰富的演讲内容博得了一致好评。之后,她还在加利福尼亚的圣约翰长老会教堂发表演讲,参加美国侨胞向祖国捐献飞机的命名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和国内民众向侨胞表示深深的谢意。联合国制宪大会闭幕后,由于许多事务要处理,加上健康原因,吴贻芳没有随中国代表团一起回国,而是于1946年1月才返回国内。



参与新生活运动和抗日服务活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发起“新生活运动”。接着,在短短4个月内,蒋介石连篇累牍发表讲演,还主持颁发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文件,详细说明新生活运动的意义、目的、内容和方法。当时教育部秉承蒋介石之意,在学校中开展“新生活运动”,并由此推行于社会各界,涉及全国,持续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在蒋介石看来,中国社会的所有颓风败俗,都是由于“固有道德”沦丧,礼义廉耻不张之故,因此“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努力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以“礼义廉耻为基准”。“新生活”是以国民生活的“生产化、军事化、合理化”为最终目标。所谓生产化,就是“一切设施要注重经济建设,要有裨于实际民生”;军事化,就是“实行军事化的教育和训练,将中国古时以六艺设教为主旨的精神恢复起来”;合理化,就是“合乎科学”,“具备常识,合乎常理”,“运用科学方法来处理一切事物”,做到事半功倍。由此可见,“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使国民生活合乎礼义廉耻的精神,进而达到国民生活“生产化、军事化、合理化”的目标。它以“新”卫旧,打着“新生活”的旗号,规约社会风习,以求维持和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①新生活运动发展到1936年,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领导。从基督教服务社

^① 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会的角度出发,也由于教育部的推行及与宋美龄的关系等多种因素,吴贻芳不仅在金陵女子大学推行新生活运动,而且参加了由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出任执行委员。吴贻芳推动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1934年4月,她在一次周会中对学生谈及新生活运动时讲,新生活即衣食住行须整齐、朴素、简单、清洁,并务求合乎礼义廉耻,次言中国人民生活须军事化,即迅速而有纪律,未言吾人实行新生活,务求切实,以身作则,切忌唱高调。^①这一年,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邀请金女大成为团体会员,金女大当即表示愿意。1934年6月,金女大校刊刊载《新生活运动之大检查》,提出新生活运动“不但讲求外表之新生活,且须根本内心实行新生活,努力人格之修养,完成国民之天职,庶不致失新生活之本旨”^②。为了进一步推进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吴贻芳于1935年在金女大组织了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并出席第一次会议,讨论新生活要做到:外观,包括个人的起居及服饰,宿舍、图书馆之秩序,须整齐安静;内心,无论思想言语,皆以诚为本。经过努力,吴贻芳在金女大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譬如学校周围的清洁卫生得到了改善等。但吴贻芳在新生活运动上所花费的精力,引起了金女大西方教师的不满。一些西方人士对新生活运动中注重外表、形式的做法表示怀疑,她们认为内在的修养更重要。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指出:“她花了大量

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2期。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5期。



时间去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地区性工作。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生活运动所缺乏的恰恰是生活。它的纲领仅仅涉及到了生活的外在标识。除非其内在精神十分充实,否则,人们是否穿好制服,扣好外衣上的纽扣,这些外在表现其实无关紧要。”^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贻芳积极投身抗战服务活动中。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妇女界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唐国桢出任总干事,吴贻芳则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宋美龄在庐山举行妇女领袖会议,商讨抗战时期中国妇女工作,吴贻芳应邀参加。由何香凝、邓颖超等国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吴贻芳出任常务理事。保育会负责收容遭受战火灾难,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吴贻芳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战时期,吴贻芳还参加了四川省新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并当选常务委员。吴贻芳参加新生活运动和抗战服务活动,对金女大的学生影响很大,带动了金女大学生对新生活运动的关注和为抗日服务的热情。

吴贻芳还参与了一些教育行政决策咨询性会议,在学校、学生与政府之间出现矛盾时进行协调。“由于政府经常因为其对外政策而受到学生的批评,政府专门安排了一次有学生和教师参加的会议,解释其对外政策。会议于1936年1月15日在南京召开。有89位大学和学院的校长、78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位中学校长出席了会议。吴校长代表金陵出席了会议。她上到主席台上,紧挨着蒋介石将军就座。……后来教育部也召开了一次大学校长和中学校长参加的会议,讨论在民族危机的时刻,学校面临的行政问题。这些会议为促进教育家 and 政治领袖之间的理解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①

吴贻芳作为金女大校长参与社会活动,在金女大尽管有少数教师有想法,认为吴贻芳处理校务的时间少了,但绝大多数都是赞同的。她们认为,吴贻芳参与社会活动,宣传了金女大,随着吴贻芳社会影响的扩大,金女大也广为人知。如1933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为期1周的与世界事务相关的国际妇女会议,会前吴贻芳考虑到离开学校会给校务工作带来困难,有些犹豫,“但是教师们一致认为,她应该接受这一邀请。在出席了这次有许多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后,吴博士又赶到班夫,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会议。在这两次大会上,她发表了大量的讲话,这把她带进了与金陵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的圈子中,使她能够通过这些联系,加深这些人对金陵的兴趣……1934年5月,吴校长再次离开学校外出访问。这次出访的目的地是南海及其附近地区,包括厦门、香港、广州、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旧称——笔者注)和马尼拉。在所有这些地区,她都受到了金陵女儿的热烈欢迎,她们非常高兴能见到自己母校的校长,并非常自豪地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在这些地区,她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发表了一些讲话,接受了大量的宣传采访,从而使金陵女子大学更加广为人知。”^①

吴贻芳参与社会活动,主持和出席重要的会议,对金女大的学生有着极大的鼓舞,使她们增添了在金女大学习、做吴贻芳学生的自豪感;吴贻芳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当时政界关键人物如宋美龄、蒋介石等的联系,也使在动乱岁月里求学的女子增添了一些安全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3期记载了吴贻芳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之后,金女大学生盼望她归来的心情:

吴校长已于1月初由美飞返祖国,先抵上海,17日到京视察原校校舍,与在京教职员会商修复大计划,即飞渝,在渝仅作2日之停留,遂于2月12日搭莫大使之专机到蓉。在校师生原以为校长可能于11日搭中航机抵蓉,故该日全校皆在兴奋中等待,两边宿舍皆贴满欢迎标语,并准备爆竹2挂,直至下午4时犹未见至,乃以电话询中航公司,得知校长未乘此班飞机。不意翌日正午忽翩然而至第二宿舍之门前,正在用膳之教职员闻讯,一齐放下碗筷,咸以先睹校长之仪容为快。校长于爆竹声中,与各欢迎者握手寒暄,笑容可掬。消息传至第一宿舍,同学亦辍膳结队而至,校长得讯即亲出与同学见面,同学先致以热烈掌声,掌声甫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停,歌声又起,欢迎歌之辞曲皆为同学自撰者。歌毕,记者为校长介绍本届厚生团团团长陈诒女士与四年级级长王安珍女士,校长一一与之握手致意,又向全体欢迎同学略致谢词,队伍始散。^①

吴贻芳参与社会活动所赢得的声誉、地位,为金女大获得多方面的经费支持创造了条件。如宋美龄三姊妹向金女大捐建了一幢新的实验中学宿舍,“这是中国捐赠人送给金陵的最大礼物”^②。这一义举使60~72名学生有了住房,一所三年制高级中学也因此得以发展起来。由于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作为教室,这就使实验中学成为教育系培训教师的样板。吴贻芳的影响及与民国政治关键人物的联系,使金女大注册立案之后向政府各级机构争取专项经费与补助较为主动。事实上,吴贻芳接任校长后向政府各级机构争取了不少的专项资金和补助,使金女大的经费来源扩大。

吴贻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影响日益突出时,逐渐减少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如为了集中精力于学校重建和复课工作,吴贻芳辞掉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其他一些兼职。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原国民参政会全体参政员都转为国民大会正式代表,原参政会执行主席是国民大会主席团的当然候选人,但吴贻芳主动宣布不参加主席团,并两次拒任教育

① 《吴校长由美归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3期。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部长之职,开始疏离政治。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在重庆与宋美龄相见,宋美龄说:“司徒雷登先生建议由你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吴贻芳以如此重任我担当不起和金女大不允许我兼任为由婉言拒绝。第二次是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何应钦重新组阁。在讨论内阁成员人选时,张治中向何应钦建议,由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张治中对何应钦讲,吴贻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又是教育专家,治理金女大20余年,成绩斐然;她又是基督徒,没有党派背景,在这多事之秋,由她出任极为难当而又非常敏感的教育部长一职,是最合适不过的。何应钦很为赞同,并与张治中一同前往金女大,请吴贻芳出山。吴贻芳再一次以离不开金女大为由,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国民党政政府撤离大陆到台湾时,蒋介石夫妇将买好的机票委托随副官亲自送给吴贻芳,吴贻芳以“我离不开金女大,离不开金女大的学生”为由,将机票还给了副官,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吴贻芳在抗战之后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金女大事业中,与她逐渐认清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对官场腐败的厌恶有关,也与二姨夫陈叔通的影响有关。陈叔通在当时已成为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积极从事反独裁、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社会活动。吴贻芳住在南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抽空去上海看望二姨夫一家。据陈叔通先生之子陈循善回忆,吴贻芳不入官场,渐渐远离当权者而专注于教育事业的做法,多少有点儿受了陈叔通先生的影响。陈叔通先生一贯赞赏和积极支持吴贻芳从事教育事业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和妇女儿童福利工作,随着吴贻芳在国内外声望的提高,一再关照她在政治上要谨慎从事,并将国民政府的一些内部情况 and 政治丑闻告诉吴贻芳,分析国民党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以及老百姓在抗战胜利之后继续遭受的苦难。他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吴贻芳,在官场是斗不过那些官僚政客、军阀党棍的,充其量只能给人家当摆设,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自己的事。陈叔通的观点很合吴贻芳的想法。^①从吴贻芳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关系看,她走了一条由不了解到参与,由参与到了解,然后疏远脱离的路,这表明了吴贻芳作为一位爱国者、一位大学校长的洞察力和坚定人格。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① 参阅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05~106页。



第

四

章

专业设置与教学管理

一、学科设置与调整

金女大初创时期只有文理两科,课程设置主要有中文、英国文学、修辞学、宗教、基督生活、卫生学和绘画等。文科又被称为哲学组,以学习哲学、英国历史为主;理科则被称为科学组,以学习化学和数学为主。学生们进校后可以在哲学和科学两个小组之间自由选择一个。但在1915年招生开学之后的几年里,金女大的教学计划要求覆盖全部课程,没有选择。最初几年所谓的生物系、历史系、宗教系等,主要是学校聘请有关教师开设一门或几门相关课程,



不同于科学的系科与专业设置。金女大之分系主要在1922年之后,当时学校分有国文、英语、宗教、历史、教育、化学、数理、生物、音乐、体育等系。1925年,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体育师范学校并入金陵女子大学。1925年之后有主修、辅修学科,即学生于大学一年级修毕规定的课程后,自第二年开始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辅修的科目有教育、地理、卫生、心理等课程。此外,还设有天文学、法文、德文等课程。主辅修系科的设置一直实行到1939年。

针对当时高等院校学系设置名称不一、课程设置随意和标准不一的情况,1938年秋季,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会议同意教育部提出的《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整理办法草案》。该文件对学校的系科调整与课程设置提出了基本要求,其中规定学校进行课程整理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是: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课程整理的具体内容有:1. 必修及选修课程,由教育部规定范围;2. 第一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3. 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4. 仍采用学分制;5. 上课讲习与自习讨论及习作实验并重;6. 教师规定自习书目与参考资料,学生按时阅读作札记;7. 教师按时批阅学生习作及实验报告;8. 指导高年级学生学科论文;9. 毕业考试包括4年中重要科目。^① 193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同时还公布了《大学及独立

^① 中央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399页。



学院各学系名称》，规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等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系，农学院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蚕桑、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农业经济等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电气工程、矿冶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建筑工程等系，商学院设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学等系，文学院亦可设商学系，医学院不分系，教育学院仍依《大学规程》分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等系。^① 教育部关于学系及课程设置的有关规定，对已向政府注册立案的金陵女大有直接影响。这一年，金女大遵循教育部的要求，取消了辅修系，只有主修系。文科主修系为中文、外语、历史、社会学、音乐、体育、哲学等，理科主修系为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地理、家政、医预科和护预科等。在这些系科中，学生报考选择最多的是社会学系，次多的有生物、化学、历史、家政、体育、音乐系等。学校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将课程分为3类：一为公共必修科目，二为主系必修科目，三为主系选修科目。原作为辅修系的教育学，改为全校学生都要学的必修科目，适应毕业生大多数在教育界工作的需要，也体现学校为教育界培养教师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金女大的体育系、医预科与护预科是与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页。



其他高校合作办学的结果。体育系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由女青年会提供体育教育经费。除四年制的体育系外,还有二年制的体育专修科,为培养小学体育教师,还举办了一年制的简易进修班。“医预科和护预科是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设立的。主修医预科的学生必须读完协和医学院所规定的预科课程,同时顾到金女大必修的课程。读完3年的学生考入协和医学院,毕业时获医学博士和金女大学士学位。在金女大读完2年半预科的学生,考入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后如再回金女大读完大学的必修课程,可以获得本校的学士学位。”^①

1940年,在四川省教育厅建议下,吴贻芳同意创办了家政系。家政系分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3个组,并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在系科的设置与发展过程中,金女大曾有过“因人设课”的现象^②,如1933—1935年曾设政治系,毕业生仅有3人。后因人员变化及抗日战争环境的影响,到1945年时,文科政治系、经济系、哲学系停止招生,理科数理系也暂停招生。

金陵女子大学的系科设置与调整,首先受学校教师所学专业状况的影响。最初的系科设置与最早加盟金女大的来华女传教士所受学校训练及其办学目的密切相关,因而先设的自然是宗教系及相应的宗教课程,然后方逐渐扩充,考虑到学生就业的需要和中国社会的某些需要。其次,就

^{①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第107页。



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系科设置,对受欢迎的加以强化,对社会需求有局限和学生选择不多的进行限制或停办。第三,系科设置考虑到女生的特点。当时中国女性从政或参与理工类工作的为数不多,面临着要做贤妻良母的压力。因此,金女大在系科设置中比较重视社会学系、医预科、护预科以及家政系和辅修系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吴贻芳对系科设置的态度主要是根据其办学目标强调为社会服务和适应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她就任校长之后,将宗教系取消,淡化宗教课程,逐渐将政治系、哲学系停办。同时,她特别强调学生对系科选择的自由,尽管选择某一系科的学生很少,但只要学生需要,就坚持办下去。如音乐、历史、英语、生物、化学、数理、地理等系科,每届选择的学生都不超过10人,有时甚至只有1~2人。吴贻芳认为对这些学生进行训练,将来都能为国所用。

二、特色系科及发展

金陵女子大学在最初几年的办学过程中,还没有形成有特色或者有影响的系科。吴贻芳就任校长后,注重系科建设,使金女大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较有影响的特色系科。如文科的音乐系、社会学系,理科的生物系、化学系、家政系以及体育专业等。其中影响很大、成绩突出的,主要是文科的社会学系和理科的家政系。

(一) 社会学系及其影响

金女大的社会学系设立较早,吴贻芳就任校长后将培



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作为重要的办学目标,因而对社会学系的发展很重视,聘请穆斯曼小姐(Mereb·E·Mossman)任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技巧,为了把科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也由于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难民问题、儿童问题、农村问题等等,吴贻芳对社会学系的发展更加关注。同时,选修社会学系的人数越来越多,也使得吴贻芳要思考社会学系的发展。抗战爆发后,吴贻芳聘请留学美国,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龙冠海先生为金女大社会学系主任。^①同时,吴贻芳有意识地培养社会学方面的教师。1941年秋,吴贻芳送朱觉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临行时,嘱咐她“最好找机会研究人口调查的技术问题”。朱觉方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同时受聘于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她住在金女大,为金女大开设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并与另一个社会学博士合作在金陵大学创办培养硕士级社会服务人才的社会福利学院。社会学系于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在农村社会工作及调查服务、儿童社会工作及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培养了很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才,而且给学校带来了很好的声誉。

金女大社会学系在办学之初即注意培养社会工作专门人才,所授课程着重于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及社会调查,偏

^① 龙冠海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曾赴美国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9年移民台湾,先后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省立法商学院。1960年创建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台湾中国社会学社理事长多年。所著《社会学》一书多次印刷,影响很大。



重于实用方面。这种办学思想与当时学校强调通过社会服务来输出学校拥有的所谓基督精神,树立学校良好形象有重要关系。德本康夫人认为:“社会服务是学校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输出方式。学校基督教女青年会替居住在校园附近的农民的孩子办了一所模范乡村小学,为这所有 54 个孩子的学校输送了一位全日制教师。在需要的时候,学院的学生还在教学上提供帮助。学校还为附近的妇女儿童建立了一个诊所。不仅每个星期日下午在学校为妇女儿童从事医疗服务,就是定期的礼拜日到邻居家去的上门服务也坚持了下来。”^① 吴贻芳任校长后进一步强调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其自身也投入为社会服务的活动中,这对社会学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为适应战时需要,金女大在西迁成都办学之后,很快组建了一个乡村服务处。乡村服务处位于四川仁寿县,距离成都约 150 千米,服务站的工作开展很顺利,赢得了农村社会的热情支持。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体,分成若干小组,利用寒暑假帮助开展各种专门的活动。这些小组主要是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鸡种改良组。

妇婴组的活动主要由成都进益产科提供医药器械,借用有经验助产士 1 名,在当地招收初中程度女青年为助手,每天上午开展门诊,定期检查孕妇的情况,治疗婴幼儿疾病,还根据季节变化给儿童打防疫针、种牛痘等。对产妇,只要来请,不论远近,日夜出诊。这些服务收费低廉,贫苦

^① 德本康本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8 页。



农民无钱就免费。接生后还要做家访,直至婴儿脐带脱落。妇婴组还不时召集母亲会,宣传育儿知识。

幼儿教育组的主要活动是在农忙季节,组织免费上学的幼儿班,由金女大学生到农村挨户招生,再按年龄程度分班次,对这些孩子进行教育。幼儿教育组还请成都迁仁寿的协和师生担任过教学工作。

挑花组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当地妇女,挑绣桌布、床单、窗帘、餐巾等,由学校运往国外换取外汇。

鸡种改良组的活动以生物系学生为主,对仁寿县的鸡种进行改良,以提高当地鸡的产蛋率和抗疫力。

金女大设在仁寿县的服务处,还是金女大学生的实习场所,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来此实习,开展社会调查。由于成都至仁寿交通不便,金女大最终决定将仁寿服务站迁至离成都较近的华阳县,在当地开设了幼儿园,每期收幼儿60名;设妇女班,教妇女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珠算等。“由于在这些中心出色地开展了诸如办幼儿园、开家长会议以及家庭访问之类的工作,美国的妇女普救者协会(Asociation of universalist Women)在1944年承担了支持服务站的工作……”^①

还要指出的是,金女大参与了经教育部批准的一项边区服务计划(Border sevice project)。1941—1942年连续两个夏天,地理系教师刘恩兰博士带领若干组学生进入西藏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边境地区,应地方政府要求,调查了当地铁矿、玉石以及煤矿的储藏情况,然后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教师协会。刘恩兰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海洋学家。

1946年金女大迁返南京,继续保持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在江宁县淳化镇成立乡村服务站。选择淳化,因其为一个农村市镇,距离南京大约20千米,乘车十分方便。这个小镇在5千米半径范围内,约有50个村庄,镇上有一座教堂、一座公共阅览室,是南京神学院学生的实习中心和中央政府的农业推广站。金女大在淳化成立了乡村服务站后,主要开展妇女儿童工作,社会学系四年级学生都要去进行数周社会实践。服务站指导农村妇女从事手工艺品如刺绣、儿童玩具制作,并代为联系出口,以改善当地农村经济。同时进行妇幼保健知识、技能的传授,如为年幼妇女办的训练班,主要开设阅读、书写、编织、卫生、家庭经济、唱歌以及公民课程等。服务站还创办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减轻农村妇女的劳动负担。服务站同时是社会学系学生的实习实验基地,学生通过服务站实习,在进入社会服务以前就能了解农村社会,锻炼实际能力,拓宽和深化理论的学习,“使这批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在厚生精神的指引下,在为农村和村民服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为祖国和人民而无私奉献的品质”^①。

金女大社会学系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不仅

^① 王世军:《金大金女大社会工作专业沿革》,《社会学》月刊,2002年第1期。



为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而且培养输送了许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金女大社会学系所取得的成就,与吴贻芳主管金女大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训练的严格要求是不可分的,这容后述;同时,与完整的课程设置和拥有一批热爱社会工作、有奉献精神的高水平教师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修社会学系的学生除要学习属于普通的即公共必修科目外,必须修习的课程有:(1)社会学原理(3学分),通过学习社会学原理,了解社会学的性质、起源、范围、社会生活因素、社会过程、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以及社会学原理之应用等方面的知识。(2)社会问题(3学分),通过学习社会问题这门课程,使学生了解社会问题之性质,中国社会问题发生之背景,以及中国人口、贫穷、农村、劳工、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思考和寻求解决的方法。(3)中国社会史(4~6学分),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说明中国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变迁。(4)民族学(6学分),主要讨论民族学之范围与研究方法,其中对我国民族之起源、演化、发展、组合与成绩等问题给予特别注意。(5)人口问题(3学分),主要讨论关于人口的学理,人口的分布、组合,人口的数量与品质以及人口政策等。(6)社会统计学(6学分),该课程主要讨论统计学的性质与范围,统计材料的搜集与统计图表的制法,以及普通统计学原理在社会学中的应用等内容。(7)社会制度(3学分),这门课程讨论各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范围、功用、起源、发展与演化等内容。(8)家庭(3学分),这门课程讨论家庭与婚姻制度的起源与变迁,家庭的



功用、家庭及解组等问题。(9) 都市社会学(3 学分), 讨论都市社会之起源与发展, 都市社会之各种问题, 都市对于人类之影响与都市设计等。(10) 农村社会学(3 学分), 讨论农村社会组织之特征, 农村之人口、家庭、生活程度、教育、娱乐、自治与建设等问题。(11) 社会思想史(6 学分), 这门课程主要是从现代社会学观点讨论世界各国自古以来主要思想家之社会思想, 考究其背景、发展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贡献。社会思想史分中国社会思想史与西洋社会思想史两部分讲授。(12) 社会教育学(3 学分), 这门课主要是依据现代社会学的观点, 讨论教育的制度、功用、内容与设计等内容。(13) 宗教社会学(3 学分), 依社会学之立场, 讨论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比较各种宗教制度之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宗教对于个人行为及群众心理的影响。(14) 经济社会学(3 学分), 主要研究经济因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讨论各种经济制度的起源、发展、变迁与对于社会人生的影响。(15) 社会变迁(3 学分), 这门课程主要讨论社会变迁的原因、影响与趋势, 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给予特别注意。(16) 西洋社会思想史(4 学分), 有时是放在社会思想史中讲授的。要求学生学习此课程之前选读西洋通史。(17) 社区组织(3 学分), 主要讨论社区组织之原理、方法及其应用, 并检讨社区组织运动的趋势。(18) 儿童福利(3 学分), 本课程主要讨论儿童之卫生、训练、教育及职业等问题, 以及与儿童有关的社会关系。同时注意儿童的寄养及低能儿童的管理方法, 考究现代各国所采用之儿童福利政策。(19) 社会心理学(3 学分), 该课程主要讲授心理学的



内容。(20) 社会研究方法(3 学分), 这门课程讨论科学研究的技术与步骤, 论文的写法, 以及主要的社会研究方法, 如观察法、实验法、历史法与个案法等等。(21) 社会调查(3 学分), 主要学习社会调查的方法, 除授课外, 要指导学生做实地调查工作。(22) 个案工作(3 学分), 这门课主要讨论个案工作的原理、方法及其应用, 同时注重实地工作。(23) 集团工作(3 学分), 讨论集团工作的原理、方法及其应用, 注重实地工作。(24) 社会事业与行政(3~6 学分), 这门课程讨论社会事业的性质、范围、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设施。(25) 近代社会运动(3 学分), 讨论近代各国各种主要社会运动的起源、因素、发展、影响与趋势。(26) 社会病理学(或社会改造原理, 3 学分), 这门课程主要讨论各种社会病态的原因与影响, 并考究救济与预防的方法。(27) 贫穷与救济(3 学分), 讨论贫穷的原因、影响与救济方法。(28) 社会机关行政(3 学分), 本课程主要研究社会机关的组织、行政、管理、设计与工作人员的训练等。(29) 合作经济(3 学分), 主要研究各种合作之组织、功用、管理等问题。(30) 乡村教育(3 学分), 研究乡村教育的内容, 乡村学校的管理, 注重以教育方法改良乡村之环境与农民生活的状况。(31) 劳工问题(3 学分), 讨论工人工资、工作时间、住宅、工厂卫生、失业、罢工、劳工运动与工人福利等问题。(32) 近代社会学原理(3 学分), 研究近代社会学家的学说, 比较其内容与方法。(33) 犯罪学(3 学分), 讨论犯罪的原因、影响与预防。(34) 社会立法(3 学分), 研究社会立法之范围, 比较各国社会立法之趋势, 特别注重关于劳工、住宅、公共卫



生等方面的立法。(35) 精神病理社会工作(3 学分), 以个案方法研究精神病之原因、影响与预防, 特别注意社会背景与因素。除修习完上述课程, 还有必须完成的课程内容: 实习(4 学分)与论文(2~4 学分)。金女大规定主修社会学学生在第四学年须作论文 1 篇, 通过论文的撰写使学生得到独立研究精神的训练并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

社会学系的上述课程设置是非常完备的, 纵使与当代一些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相比, 也不逊色。它体现了课程设置的完整性与个性(对所关注热点问题的研究)的结合, 体现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国内与国外的结合, 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能力训练的结合。因此, 经过上述课程的学习, 社会实践的锻炼与论文写作的训练, 从社会学系毕业走入社会的学生受到欢迎, 也就是自然的了。在抗日战争期间, 金女大社会学系的教师还尽可能开展学术研究, 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如龙冠海先生著《美苏少年组织》, 高君哲先生著《社会学的生物学派》, 张世文先生著《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生命统计方法》等。在此要说明的是金女大社会学系所开设的这些课程, 有一些是依托金陵大学开设的。由于同是教会大学及地域邻近, 金陵女子大学与金陵大学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其中学生可互相选修课程, 互认学分。因此, 这两所大学的 sociology 形成了各有特色而又相互合作的局面。对此,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军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金大、金女大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历经几十年, 为我国打开了一条传播西方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的通道, 成为



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于我国的重要场所,在普及和发展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社会工作的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把西方社会工作的个案、群体、社区工作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推进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金大、金女大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其特定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农村。至于抗战期间,为战时后方所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更是超越了20年代和抗战前为教会及其慈善机构服务的狭窄范围,体现了为时代、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特点。”^①

(二) 家政系及其影响

家政系在金女大是创设很晚的一个系,却发展得很有特色。抗战胜利后不久,即1945年9月编印的《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中对将“家政系”列于理科作了这样的解释:“至家政系之性质,文理两科兼有,惟本校所办,偏于理科方面,是以列入理科学系内。”家政系所设课程,有儿童发展、儿童健康、托儿所管理、普通心理学、营养学、膳食与疾病、烹饪学、应用艺术、生理学等。儿童福利、营养、应用艺术3个组都必须选修的专业课程有:家政学原理、食物学、营养学原理、烹饪学、膳食与疾病、家庭管理,毕业论文与家庭管理实习。然后,学生根据所选择的小组,再学习相应的课程。最初,家政系强调的主要学科是营养学,主修营

^① 王世军:《金大金女大社会工作专业沿革》,《社会学》月刊,2002年第1期。



养学方向的学生还要求选修诸如化学这样的基础课程。家政系创办后的第二年,曾举办了一次展览,“以展示如何保持膳食中的营养平衡,以及如何在廉价的产品中寻求有价值的食物资源。这一展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物价陡涨,许多食物的销售价格已经为教师和学生不敢问津。一项展览展示各种各样的黄豆制成品,另一项展览展示富含铁和钙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各种食物。另外,还有一项针线活展览,展示了用当地材料所能制成的各种吸引人的物品。”^①但在战争年代里,一般老百姓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哪还顾得上讲究营养,因此,家政系的工作重心逐渐与社会学系相结合,开始注重儿童福利工作,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争孤儿和难童越来越多,一些人士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急需救助的儿童的努力,常常因缺乏训练而遭受挫折。因此,金女大主要依托家政系、社会学系主办了儿童福利实验所。家政系和社会学系开设了与儿童福利密切相关的课程。吴贻芳在推动家政系关注儿童福利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一个由吴贻芳博士担任主席,由14人组成的儿童福利委员会根据这些不同的课程,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包括儿童的发展、儿童心理、儿童健康、儿童营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等内容”^②。儿童福利实验所建成之后,主要招收邻近的学龄及失学儿童,半天上语

^{①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第122页。





文、数学课,半天参加各种有教育意义的集团活动。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儿童及其家庭的个案工作。儿童福利实验所附设有托儿室,招收邻近的贫苦幼儿,免费日托,供家政系儿童福利组实习。但当时的教育部拘泥于部分课程要求,对将儿童福利列为主修课不予支持,而是要求选修儿童福利组的学生完成家政系的全部课程。

在抗战胜利、金女大迁回南京之后,家政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继续设儿童行为指导所,参与社会服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3个方面:一是每周分配一个工作日去华东南京神经病防治院,参加病案讨论和儿童行为指导门诊工作。在门诊病童中,挑选有典型异常行为的儿童,进行心理的与环境的个案追踪研究与治疗。二是每周分配半个工作日去中央医院儿童保健门诊,向家长解答有关儿童心理与教育的问题。挑选有异常行为倾向的儿童,进行心理和环境的个案追踪研究。三是每周分配半个工作日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与有关班主任共同研讨该班有异常行为的儿童的问题,并挑选其中问题较大的,进行心理和社会的个案追踪研究与治疗。1948年因战争紧张,儿童行为指导所工作暂停,1949年恢复,直到1951年9月。

抗战后的一段时期,家政系的发展得益于教师队伍建设。抗战后不久,家政系有专职教师6人,兼职教师1人,与外语系、社会学系教师人数一样,如果把儿童福利实验所的6人加上,其教师队伍数量能够满足教学与实验实践的需要。指导儿童发展工作的孙增敏先生,曾在美国某所学



校及 Oregon 州大学研究儿童工作,教授儿童发展、儿童心理、托儿所教授法等课程。另外,还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尔奈奥斯本博士(Dr. Ernest Osbrne)讲授父母教育。1946—1947 年,从金女大毕业并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营养学博士学位的鲁桂珍加盟家政系,义教 1 年,玛丽·费朗西思·利得(Mary Frances Reed)博士也来到家政系任教。金女大家政系的教学力量进一步增强,能够开出一些独有的课程,如家政教授法。该门课程让同学们学习如何计划、组织及介绍教学材料,因为当时有些女中开设了家政课程。

三、教学指导思想

金女大素以教学质量高,毕业生素质好著称。第 1 届学生毕业时,美国纽约州大学委员会便认为金女大学生成绩优良,程度与各大学相符,核准立案,并同意给金女大毕业生授予学位。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攻读硕士学位。金女大的教学质量高,主要反映在学生的身心素质和品行能力等方面。1931 年金女大曾对毕业生的情况进行统计,188 名毕业生中,有 106 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 15 人担任女子学校校长,8 人担任教务长或校务监督;31 人在国内或国外的学校攻读研究生;已有 30 人获得文学硕士,5 人获医学博士,3 人获哲学或科学博士。1931 年 10 月,社会各界到金女大招聘 87 人,但只有 36 名毕业生。



金女大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来自于几个因素：一是教师队伍水平较高，对待教学认真负责；二是吴贻芳的办学思想，尤其是教学指导思想正确；三是对学生严格管理与训练；四是学生刻苦努力，注重锻炼修养。

吴贻芳在教学上对教师和学生要求明确：其一，主张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广博的知识训练。主修文科必须选读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主修理科必须选读1门社会科学。吴贻芳曾讲：“金女大在学业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面广。文科学生一定要选读一定学分的理科课程。一年级课程全部是必修的。4年大学的必修课程除主修、辅修者外，还有中文、英文、中国历史、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概论等，使学生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知识。”^①

其次，重视基础知识，以有利于继续深造。从一些系科和专业的课程设置看，课程设置的完备性，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的全面性，都为金女大学生今后的深造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医预科和护预科学生报考协和医学院和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没有不被录取的。

其三，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和问题研讨式。吴贻芳大力提倡教师用启发式、问题研讨式进行教学，要求教师不要只用单一的教科书，要出专题并列出具若干参考书目，由学生课外在图书馆阅读，取各家之长，加以比较，得出结论，由此训练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自学的习惯。吴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贻芳还经常提醒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其四,强调社会实践和实验环节,锻炼培养学生能力。重视社会实践是金女大培养人才的一大特色,也是吴贻芳培养为社会服务之人才办学思想的反映。吴贻芳在回忆办学实践时说:金女大在学业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学习中重视实践,如社会系重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常常举行社会调查,就某些专题做分析研究。理科的报告与论文须根据实验写出。当时有些中学没有理科实验,学生缺乏理科实验的基础知识,所以,理科教师如蔡路得博士,从新生开始上实验课就系统地、有顺序地训练学生独立操作能力。她对实验操作要求十分严格,以培养学生严格对待科学的态度”^①。

其五,重视外语教学。在吴贻芳的心目中,受过良好的英语训练,就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深造,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然后回国服务。这是当时中国需要的。因此,吴贻芳要求:“一二年级必修英语,在二年级读完后举行一次英语概括考试,测验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测验及格才准升入三年级,除主修或辅修英语者外,免试英语。如果测试不及格,必须在三年级补读1年英语,再参加概括考试,如果仍不及格,就须自动退学。”^②在金女大普通的英语课中,每学期必须读若干本英语名著。英语系四年级学生的

^{①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8页,第107页。



作文,教师批改后还要做个别辅导,十分认真。学生平时读、写、听、说英语的机会较多。除中文外,教师讲课多用英语,参考书也以英语为多。记笔记,答考题,写报告,也多用英语。每学期都有英语演讲会、辩论会。所以,金女大毕业生,不论主修哪一个系,都有一定的英语水平。

其六,重视体育训练,组织开展多种体育活动,使学生养成健康的身体,有服务社会的体魄(详见第六章“学生活动与学生管理”)。

其七,举办学术报告,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生视野。吴贻芳就任校长后,注重对外联系,尤其是注重对外学术交流,不断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学校演讲、作报告。如1933年秋到1936年,受邀来金女大作报告、演讲的主要有:1933年10月,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博士演讲《外交与情报》,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王文山博士演讲《安内的基本问题》;11月,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博士到校致词,希望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求“创作”,贡献于社会;12月,外交部参事林东海博士演讲《新疆概论》,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副处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士廉博士演讲《华北农村组织》。1934年4月,陈立夫应邀演讲,题为《信仰与力量》,金陵大学农学院副院长章之汶先生演讲《从吾国农村的危机说到吾辈青年的责任》;6月,财政部赋税司司长高秉坊先生演讲《捐税与农村》;10月,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石衡青演讲《到乡村去》,实业部矿业司司长、钢铁专家黄金涛先生演讲《钢铁对于建设事业之功效》,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先生演讲《游欧之经历》,全国



经济委员会专员、曾任金女大政治系主任的徐国懋博士演讲《全国经济委员会之组织及事业》。1935年3月,陈黼云先生演讲《中国现代化》,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吴南轩教授演讲《心理卫生》,该月还有美国政治学名教授霍尔康博士,波兰公使魏登涛夫人来校演讲。11月,金女大毕业生郝映青回校演讲《实地农村服务经验》。1936年2月,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季高博士演讲《国际局势与中国地位》,美国密执安大学天文学教授罗佛司演讲,并放映天文知识影片,行政院秘书吴景超先生演讲《妇女运动之过去及其将来》。报告、演讲者有政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名流,有国内知名人士,也有国际知名学者,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时势,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以及学科前沿知识等。显然,这对金女大学生有着很好的教育作用,对于她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关注时势,关注热点与前沿知识,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提供了金女大学生在校园内很难获得的新信息,利于培养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来金女大作报告和演讲的名流有些是吴贻芳亲自出面邀请、并亲自予以接待的。还要指出的是,这些校外人士的报告演讲与校内教师的报告是相辅相成的,金女大的许多教师也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报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社会经历。由此可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女大学学术交流之活跃。抗战爆发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金女大邀请校外人士来校进行学术交流报告的人数有所减少,抗战胜利后又有许多知名人士,如名作家姚雪垠先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英国牛津女子学院院长葛丽雅女士等,先后到金女大发表演



讲。

教学指导思想明确,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以满足社会所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贻芳对教学的一些要求,如文理兼修的要求,加强基础知识,扩大知识面的要求,提倡启发式和问题研讨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重通过实践实验环节培养学生的能力,注重英语教学等,不仅在当时促进了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而且反映了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些基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四、教学管理

金女大能够培养高素质的为社会所需的人才,如前面所述,与严格而有特色的教学管理有直接关系。在几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尤其是吴贻芳担任校长期间,很注意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注重按章办事。

(一) 严格的考试招生规定

金女大在招生上,最初比较灵活,如吴贻芳便是经过推荐作为特别生进金女大读书半年后,经测试转为正式生的。随着办学声誉的提高和教会女中以及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报考金女大的人数逐渐增多,但生源主要还是信教家庭的子女和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而这些生源又多数来自当时的地主、资本家、政府官吏和一些自由职业者家庭,其经济状况一般都比较富裕。吴贻芳认为这种生源太单一狭窄,不利于挑选优秀的学生,同时也会被社会误解,她主张



逐步增加面向普通公立、私立中学毕业生招生的人数,以改变生源结构。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的生源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录取的学生中,毕业于普通中学的比例增加,而教会中学毕业生的比例则明显下降。如1933年秋报考金女大的学生有219人,实际录取68人;1934年报考金女大的考生有226人,实际录取75人,其中还有美国学生3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女大坚持招生办学,并招收转学生,主要是面向那些因战争原因而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即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相同之专修科)正式肄业一学期以上的学生。194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成都和重庆两处招生,招生章程基本内容如下:

报名期:重庆为7月2~5日,成都为7月3~5日(每日上午8~11时,下午2~4时)。

考期:成渝两处均为7月9~10日。

资格:凡报考一年级者,须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经会考及格,或准予升学。转学生以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正式肄业学生为限(最高转入三年级上学期)。

报名手续:甲、至报名处索取报名表2份,详细填写。乙、呈验证件(验讫即发还,又转学生并须缴存成绩单)。丙、缴报名费300元(外埠须加缴邮费200元),相片2张(相片及报名费,无论应考或录取与否,概不退还)。

考试科目:大学本科考国文、英文、数学(三角、高等代数,文科考平面几何,理科考解析几



何)、公民、史地、理化、生物。考体育系者加考术科,考音乐系者加考音乐常识。

体育专修科规定2年毕业,可收同等学力学生1/5,考试科目分国文、英文、公民、史地、体育、卫生常识、数理化生物常识及术科。

转学生经审查合格后,文科各系须参加国文、英文、数学、史地试验,理科各系,须考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如成绩及格,再受主修科目试验。

关于招生事宜有接洽或询问者,可经函本校招生委员会。^①

金女大也招收特别生和旁听生。特别生为“凡不欲为本校正式学生及得学位而仅欲选修数项学程者”,但“必须经过本校入学考试,所选课程得照给学分”^②。旁听生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学生选修其他课程,另一类是非金女大之学生“欲申请为旁听生者”,但这类旁听生要具有高中毕业资格,经学校教务会议核准。后者不得在学校住宿,只能随班旁听功课,不得向教员发问和请改课卷,不给予学分。旁听生要缴费用,纳费标准“以旁听课程之时间计算,例如每周旁听课2小时则半年纳费2元,如中途辍听,所缴之费不得退还”^③。

从招生环节上把好生源关,对提高办学质量有重要作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1945年9月编印,第19~20页。

^{②③}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年9月编印,第13~14页,第14页。



用。合格且优秀的学生有很多优点,如主动性强,有较远大的理想志向等,这些都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础性条件。同时,力所能及地招收特别生和旁听生,扩大教育服务范围,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满足了这些学生的需要,也为国家培养了更多的人才。

(二) 采用主辅修制

金女大创办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从1925年到1939年实行主辅修制。吴贻芳曾说,在金女大,“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1939年,才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取消辅修系,只有主修系”^①。由于金女大的学生大部分在教育界谋职就业,因此学校把教育学作为必修课,同时又将教育系作为辅修系。吴贻芳在解释将教育系只作为辅修系的原因时说:“教育系只做辅修系,不做主修系,因为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知识。”^②为了训练学生将来从教的能力,金女大附设了一所实验中学,作为学生毕业前的教学实验场所。吴贻芳认为,金女大将教育学列为必修课,并附设实验中学以训练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做法,体现了金女大的师范学院性质,使金女大具备师范学院的条件。金女大实行主辅修制是扩大学生知识面,对学生进行多方面训练,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积极举措。后来教育部将其取消,强调

^{①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第106~107页。



学科的高度专业化,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从发展看是缺乏远见的。随着社会变化的加剧和发展的加速,尤其是科技的迅速发展及职业的此消彼长,要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学生,采用主辅修制不失为有效的办法。

(三) 实行积点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

金女大学生入校后,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规定修完一定的学分,方能毕业。注册立案后,则依照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修满 132 学分方可申请学士学位,但 132 学分中不包括党义、体育、军事看护等内容。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金女大规定在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之外,还增加英语 6 学分。学分计算的标准是:在一、二年级时,每一学分系指每星期上课 1 小时,及课外预备 1 小时半而言;在三、四年级时,每星期上课 1 小时,及课外预备 2 小时而言;每星期实验 3 小时作 1 学分计。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办学质量,吴贻芳将学分制与积点制合并使用。吴贻芳回忆办学经历时说:“金女大对学生成绩实行学分制。在 30 年代有一段时间还执行积点制(point system),就是说某门课程得 60 分算及格,但得不到积点。积点的标准是根据各门课的学分多少和考试分数多少而定,学生毕业时除学分达到规定数目外,积点也必须达到要求。这个规定说明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是较严格的。”^① 积点制的实行,实际是将获得学分的标准提高,即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7 页。



每门课程成绩的考试要超过 60 分以上,按一些课程的实际如要达到 70 分方可获得积点,这就提高了学习的标准,增加了考试的难度。用现在的话讲,吴贻芳想通过积点制的实行来杜绝以考 60 分为满足的现象。

金女大实行的学分制具有弹性学制特点。“学分制还允许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读了一个阶段后,离校工作一个时期,积一些钱,再来读满所要求的学分,不会因离校而失去学籍。成绩优良者在读好必修课程之余,还可以选读其他课程。许多毕业生毕业时学分总数往往超过规定。”^① 这种学分制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因健康等原因造成学习暂时困难的学生身上,学校规定:“学生如因健康或他种关系,宜少读学分者,校方可减少其功课,准许于 4 年以上修毕大学课程。”^②

金女大学分制具有的弹性,没有可提前毕业的特性,学生提前修满规定的学分,还不能毕业,可加修学分,以进一步充实自己。学分制与年级制相结合,下要保底而上不封顶。这虽有一定的不足,但在当时应是很进步的,符合实际的,体现了以生为本之精神。

(四) 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

金女大制定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在学生注册、转学、休学、缺席、旷课、作息、毕业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明确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7 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印,第 5 页。



而详细的规定。^① 学生必须遵照执行,教学管理人员包括教师要贯彻落实。

1. 关于注册之规定。金女大要求学生须在开学前 1 日到校,到校后即至训导处报到,并询所派宿舍号数,以凭住宿。注册手续,在开学日上午 8 时半起始办理,各生应于注册后即行缴费。学校在注册前 2 日,开始供给膳食,学生如欲早日到校,须先得校方许可。金女大开创了一个“预期注册”办法,即在学期结束前,举行预期注册,预选下期课程。二、三、四年级学生先到主修顾问处商量所选课程,取得黄色课程单后再到各级课程指导员处注册。开学注册时,持预期注册单在各级课程指导员处注册,然后,持注册单至注册组填写上课证(必须填写详尽)及缴费单,再到会计室缴费。一年级新生则直接到本级课程指导员处注册,注册后到注册组填写上课证及缴费单,再到会计室缴费。

从注册制度看,除一般学校都有的缴费登记等情形外,金女大于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定课程,并发给所选课程凭证,根据学生课程选修情况排定教师与教室,则体现了根据学生需要安排教师的精神。这与根据教师设课情况强求学生选修不一样,反映出在课程安排上的民主精神。金女大规定,学生如果选定课程之后又想更改,则“须先得主修学系顾问之签字许可,取得学程更改单,再至课程指导员处得其签字许可后交至注册组,始能实行更改”。但注册 10

^① 学籍管理制度所涉及有关规定,主要引自《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印。



天后,除非得到课程委员会许可,不得更改课程。注册时所获得的上课证即为听课的凭证,学生于第一次上课时,则将上课证交给教员,不提交听课证者不能听课。这里,学生所获得的“上课证”,即为正式注册的课程。金女大规定,“凡未经正式注册之课程,不得随意听讲”,“凡不能按时入校注册上课之学生,每课课程第一堂缺席做双倍缺席计算,其余缺席照常计算,缺席至3星期之久者,须少读若干学分”。

2. 关于转学、休学之规定。金女大学籍管理制度方面所涉及“转学”,是对欲转入金女大就读的其他公私立大学之学生所做的资格考试规定,而没有对金女大学生欲转入其他大学的规定。金女大学生“因事自请休学者,须由家长或保证人来函陈请校长室核准,所缴学膳等费一概不退还。若因疾病经校医诊断须休学者,则得退还膳费之一部。凡休学学生欲回校继续学业,须于开学前2个月,备函向本校教务处申请,经核准后,方得续学”。

3. 关于缺席、旷课之规定。金女大对缺席有两种规定,即允许的或许可的缺席与不允许或不许可的缺席。未经许可的缺席即为旷课。规定:“学生除因下列事故外,概不得缺席:(1) 疾病;(2) 正式代表学校出席(如参加比赛等);(3) 进行教职员指定工作。”此3种情况即属于许可的缺席。对这种缺席,金女大做了具体的规定与要求:因疾病许可的缺席,学生“须先得校医许可,病愈后,须领得校医准假证,缴注册组。否则,以旷课论”。住在城内的学生想回家就医养病,“必须先向训导处请假,校中得随时请护士前往诊视。不遵照此种手续办理者,概作旷课论(校外医师证



明无效)”。因正式代表学校出席比赛等原因的缺席,“学生必须先得校务执行委员会或课程指导委员会之许可,报告训导处,然后可以缺席”。因进行教职员指定的工作的缺席,“学生必须请求教职员先将理由、工作情形及缺席何课报告课程指导委员会,经该会同意后,始得缺席”。对于缺席所贻误的课程,学生“不得请求教师代补。平日试验或写作等,概不得事后请求补行”。

对于旷课,金女大规定,“假期前后两日之缺席一律双倍计算,旷课缺席皆从每学期开课第一天起计算”。考虑到一学期时间内学生可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做了一些灵活规定:“学生于每一学期内遇必要时,得自由缺席若干次,其次数为每1学分之学程,于每一学期内可缺席1次,每2学分之学程可缺席2次,余类推;逾限则每缺席1~5次者,扣半学分;11~15次者,扣减1学分,余类推。”“学生缺席至3星期之多者,必须少读4学分;缺席至4星期之多者,必须少读6学分;若缺席至5星期之多者,则该学期所读各学程概不给予学分。学生之总平均若在70分以下,课程指导委员会得令其少读若干学分。”

金女大在缺席、旷课方面的规定,体现了严格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从严格性上说,即使经许可的缺席也要由自己努力补上功课,同时也要计算在缺席扣减学分之范畴内;同时,许可缺席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如果缺席严重,则影响一个学期内所允许选修的学分数。规定:一年级与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修18学分为限,在特别情形下可修19学分。三年级与四年级学生可读16学分,得特别许可,可读17学



分。缺席超过规定许可范围,要求少读学分,或不给予学分,则意味着下学期或下年级必须选读更多的学分,但要经过审查,或意味着将在4年之内不能修满学分而要增加修业年限。此外,特别强调期末与开学初的考勤,对于期末、开学初的缺席给予双倍的处罚。从灵活性上说,既考虑到学生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也照顾到学生尤其是女生的生理特点,如“凡例假、病假、因公缺席,每学期不得超过40%,否则,不给予学分”。金女大还把上课迟到、早退纳入缺席范畴内,规定:“学生上课或集会等3次迟到或3次早退,作一次缺席论。”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对于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起着很好的作用。从金女大毕业之学生的回忆和关于金女大一些档案资料可以看出,金女大的管理者和教师严格贯彻执行了这些制度规定,学生在及时了解这些制度规定之后也能够自觉遵循。故形成了金女大在教学管理上以严格著称的声誉。

4. 关于毕业与毕业论文之规定。吴贻芳掌校之后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于1935年开始规定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学生读满应读的学分,成绩总平均达70分,才能在本主修系论文指导教师指导下,在四年级第一学期选定题目,通过专题研究,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写出毕业论文。论文必须是个人自己的创作,不得抄袭他人的论著。到第二学期的第二星期交初稿,第八星期交正式稿,经系主任签字通过,认为已达到毕业要求,才能获得毕业文凭,接受学士学位。”^①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五) 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

金女大为督促学生学好课程,取得优异成绩,还对考试及评分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90~100分为超等。80~89分为优等。70~79分为中等。60~69分为劣等。不满60者为不及格。”^①对于不及格的学生能否补考,由授课教员决定。对于50分以下的学生,“非重读不给学分”。每门课程计算总成绩,由平日成绩及期考成绩两部分构成,“期考成绩占1/3,平日成绩占2/3”。还规定:学生除疾病原因外,凡不参加期考者,其平均成绩概作2/3计算,照此计算后,其成绩在60分以上者,可得该课程的学分,否则无学分。“凡学生成绩低劣,不能达到毕业标准,或操行成绩不合本校训导标准者,本校得于任何学期终了时,予以警告或转学、休学、退学等处分。受警告之学生,在第二学期中即令为试读生,试读1学期,以观其有无显著之进步,有则仍改为正式生,否则,须受更严厉之处分。”^②

金女大的这种评分标准有其较鲜明的特色,将课程成绩分为平时与考试两部分,平时的权重大于期考,此其一;将学生成绩分为超等、优等、中等、劣等、不及格与50分以下重修6个等级,并把60~69分称为劣等,此其二;毕业成绩由课程学习成绩与操行成绩两部分组成,此其三;将学习成绩低劣者称为试读生,试读合格再转为正式生,此其四;50~59分之不及格学生的补考,由任课教师决定,此其五。上述5点特

①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年9月印,第5~6页,第7页。



色表明吴贻芳对学生的评价注重平时考察,考试只是督促学生学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表明吴贻芳在学业与操行上强调的是德才兼备,而没有偏废,也表明作为教育家的吴贻芳对成绩操行低劣之学生的转化充满希望,不是简单地将这类学生推出校门,而是给她们改过迁善,继续努力的机会。

为了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和真才实学,金女大对学生的考试作了严格规定,尽管期考成绩只占总成绩的 1/3。兹将“考场规则”录存如下:

甲、纸张、笔记本、书籍等,一概不得携入试场。

乙、参加同样考试之学生,必须分开座位。

丙、学生如有舞弊嫌疑及事实,本处得提交训导处按照情形分别惩办。

丁、学生有被人抄袭无法制止者,须立即报告监考员,否则,施受双方同等处罚。

戊、平日考试舞弊,照期考考场办理。^①

考场规则虽只有 5 条,但要求是严格的。此外,学生在四年级下学期即毕业学期要参加“主修系之概括考试”。所谓概括考试,目的“在使学生对其主修系有一种正确与整个的概念”^②,如果主修学系概括考试不能及格,则要在下年度再参加该项考试。另,学生在毕业之际还要接受教育部规定的毕业考试。因此,不刻苦学习,而要从金女大顺利毕业,是不可能的。

①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印,第 18 页,第 12 页。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第

五

章

学校组织与教师管理

一、学校组织管理的演进

(一) 吴贻芳就任校长前的学校组织管理

金陵女子大学内部的组织建制,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是由参与创办金女大的教会各选出3名成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选举德本康夫人为首任校长。后来,学校创始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改成学校董事会,即形成了由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金女大在创设过程中还设想了一个“托管人”,这也是当时一些教会大学一般的做法。这种“托管人”实际是一些教会大学在海外的代理人或



委托人,负责国内教会大学与国外创始人、教会组织、捐资组织及个人的联系,负责教会学校与国外相关学校之间的联系,并托管国外的捐款等事宜。金女大最初在海外并没有独立的“托管人”,而是由金陵大学的托事部代管的。据德本康夫人说:“金陵实现托管人正常功能的机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华托事部是一个老机构,承担了1914年制定的章程所规定的某种权利和义务,这对于推进学校的工作是必要的。章程也假定了托管人的存在,尽管它在当时还纯粹属于子虚乌有。有幸的是,金陵女子大学能够与金陵大学的托事部一道,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后者在1911年从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那里得到一份办学执照。这些托管人,加上在金陵合作的5个妇女,代表了在金陵合作的5个组织。她们共同组成了金陵学院委员会,负责处理与金陵有关的一切问题。金陵大学的托管部为金陵女子大学托管了它的全部财产、捐款,并将这些资金和其他礼物转交给董事部。董事部负责管理这些来自托管人和其他基金团体的基金,照看所有财产,收集学费,任命校长和教员,确定所有助手的薪水,采纳学习课程,决定入学申请,准备年度预算并呈交给托管人。”^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金陵女大创办之初校长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董事会与托管人扮演着重要角色。金女大有独立的托管人,是吴贻芳出任校长之后1935年的事。这一年,金陵女子大学从纽约州董事部那里获得了执照,从金陵大学的托事部中分离出来,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有了自己的托管人。

由于创办之初学生不多,金陵女大内部事务管理基本上为教师兼任,内部组织建制简单。后来陆续建立起了诸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唱团等学校最早的组织,当学校有一位内科医生时,便增设了一个小诊所。“经教员建议,成立了一个学生自治会。该组织发展成学生监督实施一切必要的规章制度的机构。给予学生以这样的权利和责任的特许证,通常是在第4年。少数学生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权利和自由意识,但是,教员都没有过多的规章制度的限制。加强对纪律认同的责任,被感觉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① 这表明金女大在最初的几年里,内部管理的重心放在对学生的组织制度建设与要求上,对教师的管理还没有相应的组织建制与规范要求,而教师也对纪律约束给予排斥。

随着学校的发展,尤其是1923年建成新校园之后,学校内部的组织建制逐渐增加,诸如有关学系、教务处、图书馆、办公室以及学生宿舍管理机构等陆续增设。当校长德本康夫人外出考察和参与其他社会活动以及返回美国处理有关事务时,学校有了一位代理校长华群小姐(Miss Minnie Vautrin),她于1919年来到金陵女子大学任教务主任并讲授教育学。华群小姐于1920年初承担了1年半的代理校长职务。曾承担了一些学校行政事务的音乐系教师布朗小姐写道:“华群小姐在10月的第二周末到南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承担了越来越重的责任。她在学校开学仅仅1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个月便来到学校,下车伊始,不仅肩负起调整各种关系的责任,而且承担起就学校教学楼建筑计划提出咨询,解决学生罢课等一系列问题的责任。这些问题在头一个春天她还没有任何准备,但是,由于有着较好的职业训练,宛如轻车熟路,她很快适应了这一困难的任务。看见她承担了如此繁重的任务,并且如此出色地推进了学校的工作,我们都由衷感到佩服。”^① 华群女士在代理校长期间的出色工作得益于她组织了一个组织完善的办公室,而不必亲自扮演注册主任、会计以及办公室主任的角色来处理琐碎的事务。华群女士在金女大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留守南京金陵女大校园,在对中国难民的保护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此容后述。总的来看,金女大在1928年吴贻芳出任校长之前,即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之前,组织建设还不完善,机构设置也不稳定,除日常教学、行政事务外,处于随人而变的状况中。组织管理的稳定及相应制度逐渐健全,是在吴贻芳出任校长之后的事。

(二) 吴贻芳出任校长之后的学校组织管理

由于教会大学在注册之前为中国教育行政当局管理之外的独立的教育体系,故其内部的组织设置与管理制度有一定的随意性、特殊性和不规范性。其实,关于大学的组织建设,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即很注重。中华民国教育部最初公布的《大学令》,不仅对大学的性质、学科设置、学生毕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大学内部的组织管理提出了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明确的要求。如规定大学设校长 1 人,总辖全校事务。各
科设学长 1 人,主持本科事务。大学应设评议会,以各科学
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为议长,可随时
召开评议会,审议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讲座种类、大学内
部规则等。大学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
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学科课程、学生实验等
事项。^①稍后,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私立大学规
程》等,以图加强对大学的管理和对大学的内部组织管理制
度进行规划。但由于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动荡等原因,
这些关于大学的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袁世凯死
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按《大学令》的有关精神
就学校内部组织建设与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予以贯彻落实。
1917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
规程》,其中有关学校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的内容有:国立
大学职员包括校长、学长、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
教、讲师、外国教员、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校医、事务员;
校长由大总统任命,学长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任用,其余人
员由校长聘用,并呈报教育总长。^②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大
学的法规,虽主要是针对国立大学的,国内所办私立大学也
要向其看齐,其中做得很好的是 1919 年成立的私立南开大
学。1921 年南开制定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
的学校组织管理原则,成立了由教职员及学生组成的“师生
校务研究会”,稍后又成立了大学部评议会,校长、各科主任

^{①②} 参阅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81~282 页,第 290 页。



及教授代表负责评议本校的大政方针,规划校内组织,支配学校进款及各科预算等等。可见,金陵女大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相对于同期的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是滞后的。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在忙于向政府注册立案的过程中,自然要注意学校内部的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

吴贻芳就任校长后,极力使学校的行政组织结构符合教育部的规定。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各学院和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并附设专修科。大学设校长1人,总理校务。各系设主任1人,办理该系教务。独立学院设院长1人,总理校务。各科设主任1人,总理该科教务。大学设校务会议,以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的代表若干人,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组成,以校长为主席。校务会议可由校长邀请专家列席,但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人数的1/3。校务会议负责审议预算、学院学系之设立与废止、课程、内部规则,关于学生试验事项,关于学生训育事项及校长交议事项。大学各学院设院务会议,由院长、系主任及事务主任充任,院长为主席,计划学术设备事项,审议本院一切事宜。各学系设系务会议,以系主任和本系教授、副教授、讲师组织之,系主任为主席。计划本系学术设备事项。^①同年8月,教育部依《大学组织法》精神公布了《大学规程》,对大学或独立学院的系科设置、必修课程等作了进一步规定。这些规定表明教育部对于大学组织的认识

^① 参阅宋荐戈:《中化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进一步深化,较之民国初年关于大学的有关规定,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其中,从大学组织管理的角度看,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校长负责制或院长负责制,大学各学院的院长负责制,各学系的系主任负责制进一步明确,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肯定下来。同时,这种校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又是与校务会议、院务会议、系务会议相配套的,即校长或院长或系主任负责是建立在教授参与、集体审议基础上的,并非校长或院长或系主任一人说了算,体现了教授参与管理的精神。对于学校内部的这种组织建设,吴贻芳是认同的,她在忙于注册立案的过程中逐渐地使金女大的组织建设符合教育部有关规定的精神。

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新的形势公布《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和《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的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对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的内部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名称、人员配备、职权范围与工作方法作了统一规定,较之此前关于大学组织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细致,也使高等院校的行政组织和人员配置趋于一致,避免了各校自行拟定名称带来的混乱。其有关精神如下:

一、大学设教务、训导、总务3个处。教务处置教务长1人,由教授担任,秉承校长主持全校教务。下设注册组、出版组及图书馆,各设主任1人,组员或馆员若干人。训导处置训导长1人,负责训育工作。下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体育卫生组,各设主任1人,训导员、军事教官、医生、护士、体育指导员若干人。总务处置总务长1人,秉承校长主持全校总务。下设文书组、庶务组等,各设主任1人及组员若干人。

二、大学设会计室,置会计长1人,佐理员和雇员若干



人。会计长由国民政府主任处任命,并受校长指导,办理大学的审计及会计事宜。大学农学院附设农场、林场,工学院附设工厂,医学院附设医院,各设主任 1 人,由教授或副教授兼任,秉承院长掌管事务。下设技术员、护士等若干人。

三、大学设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导会议、总务会议及图书出版委员会和其他各种委员会,由有关负责人集体讨论有关重要事宜。

四、独立学院设院长 1 人,总理校务,由教育部聘任。各科各系均设主任 1 人,由院长聘任。

五、独立学院亦设教育、训导、总务 3 个处,其主管人员称主任。

六、专科学校设校长 1 人,总理校务,由教育部任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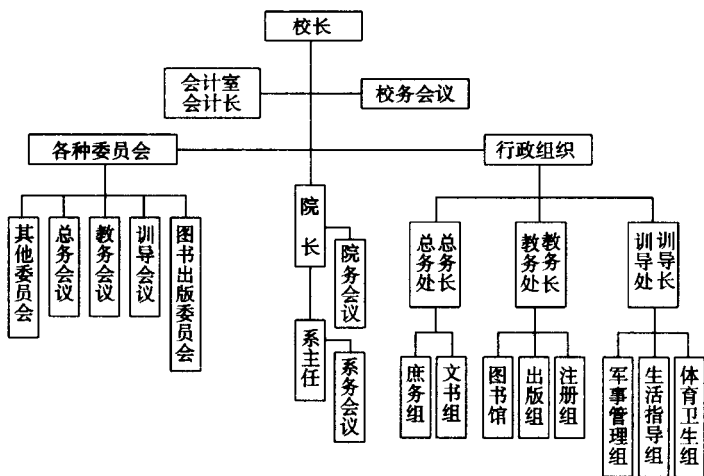


图 1 抗战时期大学组织机构设置图

^① 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27~328 页。



根据教育部规定,金女大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在吴贻芳主持下形成了完整的形式,克服了前期的不规范与随意性。金女大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如下:

由校董事会聘请院长 1 人,负全校行政责任。院长室设秘书 1 人,襄助院长办理一切。此外,有教务、训导、总务 3 个处,各处设主任 1 人,由教授兼任,分掌该处事项。另有会计室,主办会计事项。

教务处设注册组及图书馆,各设主任 1 人,组员及馆员 2~3 人。出版事宜,如学术刊物,另设委员会办理。至讲义等,则暂由注册组兼管。

训导处设学生生活指导、课外活动、体育卫生等 3 组,各设主任 1 人,组员及医师、护士等 1~2 人。此外,请讲师以上专任并住校之女教员担任导师。

总务处设文书与事务 2 组,各设主任 1 人,组员 1~2 人。至出纳组,为办事便利,暂归会计室办理。

会计室设主任 1 人,会计 1 人,办理审计及出纳事项。至统计则暂不设专人,由各处室自行办理。

各学系科,则有系科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

另,金女大设有乡村服务处、儿童实验所等附设服务机构。^①

与此同时,吴贻芳还对学校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则进行

^① 参见《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1945 年编印,第 5 页。



了厘定。在上述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学校还设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事务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议事机构,由吴贻芳选聘有关人员主持。为了集思广益,金女大组织大纲规定:“本校设校务会议为商讨校务最高机关,由校长及各处馆室系科主任与生活指导委员会、事务委员会之负责人及教授代表2人,讲助教代表2人,学生代表2人组织之,每月开会1次,校长为主席。会议中讨论有关附属机关事项时,附属机关之主管人可以临时列席。”^①规定校务会议下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主任、秘书、生活指导及事务两委员会之负责人及校务会议推选的2位教授代表(文理各1人),讲助教代表1人,学生代表1人组成,校长为主席。校务会议之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校务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如下:

1. 关于院系学科之设立、废止及变更之建议事项。
2. 对预决算作初步审议。
3. 关于建筑及重要设备之建议事项。
4. 章则之制定、修正或废止。
5. 决议校长交议事项。
6. 决议校内各部门请议事项。
7. 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项。^②

此外,金女大还设有“全体教职员会议”。全体教职员会议由校长召集,主要任务是报告校务或征询意见。各系科事项的商讨则召开系科会议,由系科主任任主席。

①② 《金陵女子大学组织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23。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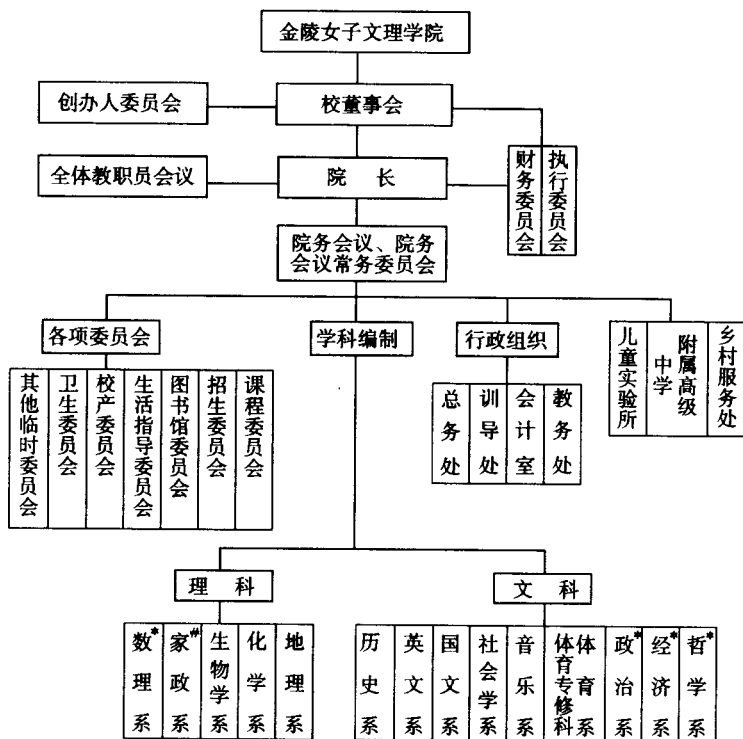


图2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组织机构设置图

金女大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管理,最突出的特色是体现了民主参与管理,即学校各级别的教师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用制度规定下来。这种管理能够把学校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使师生关心学校的事务,关注学校的命运,有学校主人翁的感觉,也就有了责任心和事业心。事实上,吴贻芳执掌金陵女

注:图2“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组织机构设置图”中,有*字符号的系科,因各种原因,先后停止招生。有#字符号的系科为抗战期间创办。



子大学 20 余年,就是靠教职员的积极支持,靠这种民主管
理培育的“金陵精神”或曰“金陵情结”,来促使学校克服困
难、向前发展的。这种民主管理,凡大事由院务会议审议的
制度,保证了吴贻芳决策的正确性。

金女大在组织管理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体现了法治
化。由于组织机构设置的逐渐完善,各项议事规则的逐渐建
立,以及办事程序的相继确立,使得金女大在校长吴贻芳离
开学校参与社会活动时,能够正常运转。比如 1943 年 5 月吴
贻芳因公出国宣传抗日达半年之久,学校工作并未受到影响。

金女大在组织管理上的再一个特色,是董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这与国立大学有区别,而与国内一些私立大学
及其他教会大学是一致的。这种制度能够调动董事会成员
参与办学、支持办学的积极性。事实上,吴贻芳作为校长很
好地处理了与董事会的关系,一是及时向董事会汇报办学情
况,二是积极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三是耐心与董事会进行沟
通,以求得对院长工作的理解。这样吴贻芳才能代表董事
会管理金女大 20 余年,否则,金女大董事会不会把学校交
给吴贻芳执掌如此长的时间。当然,吴贻芳倡导学校的民
主管理,在做到向董事会负责的同时,也做到了向全体教职
员和学生负责,这也是吴贻芳能够长时间主持金女大的重
要原因。

金女大在组织管理上的第四个特色,是管理人员精干,
管理成本低。吴贻芳说:“学校行政管理人員向来人数少,
费用节约。校内工作人员重视工作效率。”^① 譬如在成都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
版,第 113 页。



办学时,院长室只有2个工作人员,1位英文秘书和由总务主任闵侠卿先生兼的中文秘书;会计处只有2人,注册处只有1人,农村妇女服务处只有3人。许多教师身兼数职,如蔡路得博士既是教务主任,又兼化学系主任,张芴兰博士原是训导主任,又兼授教育学课程。全校伙食只有1个人管。全校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十几人。这种管理特色固然与战争环境和学校规模较小有关系,但是,充分发挥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不能不说是指导思想明确的结果。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注意节约管理成本的做法,值得今天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的大学深思。

二、现任校长与前任校长

金女大从初办招生到解放初期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前后35年时间,校长只有两任,即德本康夫人与吴贻芳。一般来讲,学校的发展等重要事务,前任校长或只是参与意见或不予过问,但吴贻芳作为现任校长与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有着复杂的关系要处理:一则德本康夫人虽辞职,仍是学校的顾问;二则德本康夫人为学校创办人,与学校海外董事会关系密切;三则德本康夫人仍是学校的教师;四则德本康夫人还是吴贻芳的老师,与吴贻芳有师生关系。因此,吴贻芳作为现任校长,如何协调好与前任校长的关系,求得前任校长的积极支持而不是不满或反对,对于她能否胜任校长之职,尽快获得董事会和西方教师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



德本康夫人 1896 年毕业于美国霍利奥克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00—1902 年,在中部土耳其女子学院任教。1902 年,与尼纶得·劳伦斯·瑟斯顿(Reverend Lawrence Thurston)结婚,婚后与丈夫一道来北京学习中文,并在中国雅礼传教会(Yale-in-China-Mission)工作。1903 年,因丈夫生病回到美国;1904 年,丈夫病逝。此后,德本康夫人一心扑在教育与传教事业上。1904—1906 年,担任了外国差会学生志愿运动秘书,进而有了熟悉密西西比河以东 14 个州 40 多个学院的经历,同时,认识了教会协作委员会秘书和美国其他基督教领袖。这是她日后被选任金女大第一任校长的重要原因。1906—1911 年,德本康夫人在长沙雅礼差会儿童学校教书并协助医院工作,5 年的教育经历使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1913 年,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遣来到南京,也就是这一年被选为金陵女子大学首任校长,一直工作到 1928 年辞职。金女大从决定创办到 1915 年正式招生,德本康夫人从制订学校计划到租借校舍,选聘教师,做了大量实际而艰苦的工作。同时,为了增加对中国教育和学校的了解,德本康夫人到北京和上海参观了一些学校,以获得在中国办学的经验。德本康夫人在《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去长江流域开始我们的工作之前,去看看北京的学校怎样办学是十分必要的。在北京,自 1905 年以后,她们便一直赢得高中以上的学生的信任。我得以有机会去学习那里的工作。参观很有价值。我试图既学习她们的学院工作,也学习她们高中的工作,而且我也在



考虑校园建筑问题。”^① 经过努力,金女大招到了 11 个学生,于 1915 年秋季正式开学。吴贻芳便是开学一学期之后作为特别生来金女大就读,在二年级时转为正式生,从而成为金女大首批毕业生的。吴贻芳在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经常获得德本康夫人的表扬。德本康夫人在校长任内为金女大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争取捐款,建筑了永久校园。

1919 年暑期,德本康夫人回国休假,利用在美国的机会争取捐助,以便为金女大建筑永久性校舍。经过近 2 年时间的奔走,在皮波迪夫人发起的一场支持亚洲 7 所女子大学的运动中获得了 60 万美元捐款。“在这场‘运动’中,德本康夫人表现异常积极,她花了大量时间代表金陵对许多城市和院校的团体组织发表谈话。通过她个人的努力,金陵又获得了一笔 10 万美元的捐款作为教学楼建筑基金。”^② 经过规划设计,“在 160 多亩的校址上建成了第一批新校舍,有 3 栋教学楼,就是接待厅和室内运动场(是史密斯女子大学捐款 5 万美元建造的)、自然科学楼、教室兼行政楼;还有 3 栋宿舍楼。1924 年又建成 1 栋宿舍楼。……这些大楼以广阔草坪为中心,都是大屋顶宫殿式,各栋之间还有朱红漆走廊相连接,具有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③

^{①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9 页,第 30 页。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3 页。



1921年7月,德本康夫人与建筑商签署了施工合同。“在工作刚刚开始的头6个月里,人们不时感到,全部任务中需要最早完成的莫过于募集经费。尽管1920年筹集经费的努力险些搁浅,财政短缺几乎将我们压得伸不直腰。7月,经济飓风真的刮起来了;8月,工作被迫拖延。我敢肯定,在美国修建楼房一定比我们在这儿简单得多。南京在城墙以内拥有广阔的用做建造坟墓的闲置空地方面堪称无与伦比。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地价暴跌,土地所有者情愿将上好的土地当做坟地变卖。家里死了人,就近埋葬,十分方便;人们都乐于为之,而政府又没有法律就此作出限制。几乎所有适合于我们建校的土地都是坟地。搬迁这些坟墓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建筑6幢楼房的土地在10月10日之前已经清理完毕,搬迁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各种流言蜚语由此产生了,学校不得不为此支付大小不等的各种酬金。我们由此而学会了如何利用和了解中国人,这也算所获得的一笔财富。华群小姐自1919年以来肩负了这副重担最沉重的一头,而将需要率直处理的与建筑师、合同承包人打交道的任务留给了我。”^①金女大从租借校舍办学,到征地建筑校舍,拥有自己永久的校址,这一从无到有的过程,德本康夫人起了关键作用,因而赢得金女大教师、学生的拥戴,也在教会教育领域和教会团体中赢得了声誉。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中国20年代爆发收回教育权运动,德本康夫人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会继续担任金女大校长之职,其辞职致词中表明了她的不情愿。同时要指出的是,德本康夫人虽辞职但并未离开金女大。因此,吴贻芳出任校长要面对的是一位在金女大发展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和在师生中有威望的校长,如果与德本康夫人关系处理不好,吴贻芳的工作肯定会变得不顺利。事实证明,吴贻芳作为校长,很好地处理了与前任校长,也是学校顾问、学校教师和自己老师德本康夫人的关系。

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对德本康夫人非常尊重,在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向政府注册,宗教课程,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校园的维护,以及海外募捐等方面,继续倚重德本康夫人。而吴贻芳本人出色的工作和学校发展也赢得了德本康夫人的信任和赞誉。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记述了德本康夫人对金女大的贡献,认为“她为学校创建募集经费和买地施工费了许多精力”,“1928年她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后,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校舍建筑,如大礼堂、图书馆和女教师宿舍等,兼任教师,始终勤勤恳恳,不再插手校务。”^①由此可见,吴贻芳能够处理好与前任校长的关系,还得益于德本康夫人的品质,她迅速地转变了角色,并没有留念过去,对校长之职难以释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1942年,德本康夫人担任了金陵校园内各种妇女及儿童活动的会计。珍珠港事件后,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她的活动受到日本占领军的限制,1943 年被日本人遣送到格里普梭(Gripsholm),不久回到美国。1958 年逝世。

三、校长与下属

吴贻芳出任金女大校长后,遇到的一个实际情况是,没有副校长来分担工作。因此,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以及院务会议成员和有关委员会负责人便成了吴贻芳的下属。她对这些下属充分信任,在她们主管的事务上很少过问插手,由她们自己处置。这样她就腾出了许多时间来谋划学校发展的大事,协调处理学校与外部的关系。从金女大的发展看,除了系科的开设与废止等重大问题,吴贻芳主持院务会议或院务会议常务会议进行商议外,对各科系的具体业务管理工作一般不过问,而是放手让系主任发挥作用。如有特色的系科生物系、地理系、社会学系等,都是在其系主任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做出成绩的。其中,吴贻芳对生物学系主任黎富思、地理学系主任刘恩兰等尤难忘怀,称她们是给大家留下良好印象的教师,是有影响的教学人员。

吴贻芳称赞道:“生物学教师黎富思博士教学善用启发式,用具体实验来说明科学原理。她曾教导学生说,许多人同去参观,有的人看得多,有的人看得少,有的人什么也看不到,所以,年轻人要刻苦钻研专业,用心观察事物,使自己有锐利的目光,灵敏的耳朵,丰富的感情,去观察,去听,去感受,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听到别人听不懂的,感受到别人



感受不到的。”^① 吴贻芳这样评价创办金女大地理系的刘恩兰博士：“她在教学中重视实践，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考察，采集标本，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深受学生爱戴。”^② 吴贻芳很少提及这些系主任的系务工作，而是看重她们的教学业务。显然，在吴贻芳的眼里，系主任应该是教学的带头人，不仅要把系务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教学搞好，做学生的导师，为学生所佩服。对外籍教员华群女士，吴贻芳不仅非常信任，而且特别钦佩。

华群是其中国名，英文名为 Minnie Vautrin，中译名为明妮·魏特琳，1886年9月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华群女士大学毕业后于民国6年（1917年）来华从教，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在德本康夫人休假期间常代理校长之职，为金女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她的主持下，学校将教育学列为全校必修课，并设实验中学，使金女大具有了师范性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华群女士担任了学校课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军迫近南京时，华群女士自愿留守校园，吴贻芳委以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职务，交给的任务是保护学校财产、设备，并在紧急时刻为邻居们服务。华群女士在日军攻陷南京，进行大屠杀、大奸淫的时刻，与其他在华传教士组成国际安全委员会，建立了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为中心的安全

^{①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第113页。



区,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孺,而她自己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病中还在为自己没有能力为苦难者做更多的工作而苦恼。1940年5月回到美国治疗,次年5月14日不愿受精神错乱之苦而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如果有两个生命,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华群女士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金女大本部后,全体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所有熟识她的人,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都把她的死视为一种巨大的损失。……她的无私奉献精神既使人自觉渺小,又鼓舞人奋发上进。”^①在吴贻芳亲自主持下,成都金女大师生于5月18日举行了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悼念仪式。第二天,吴贻芳就如何纪念华群女士与校友们交换意见,并谈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各地校友来信希望寄一些纪念品,以便举行纪念活动,并称如果我们打算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她们愿意捐款。我现在还没有进行认真思考,但有两点想法:一是我们设法搜集魏特琳的信件,看看能否将它附在纪念册中编辑出版;二是我们也许可以使用纪念基金来建一个像家一样的建筑来充做校友之家。对大家来说,魏特琳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她还活着,我想她也一定会同意的。当然,这些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久我将提议校行政会议开会讨论这一件事,届时我将把会议的建议通知给你们及上海。……比纪念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加倍努力工作,这样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才会使魏特琳的精神永垂不朽。”^① 5月29日,在成都金女大校董执行委员会议上,讨论了纪念华群女士活动的有关议程,会议决定将魏特琳去世的消息通知所有校友,并且要将魏特琳的事迹上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吴贻芳还就纪念魏特琳的事提出两点建议:1. 建立一个邻里中心或社区的社会服务基金,该基金可以在今后采取农村服务的形式。2. 在校园建立一个金女大校友会堂。会议最后决定建立“悼念华群社区基金”,用于资助人们从事社会服务事业。

在金女大迁返南京复校之后,吴贻芳于1946年11月、1947年5月分别主持了纪念华群女士的追思会和报告会,缅怀华群女士的业绩,激发师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在1947年5月举行的纪念报告会上,吴贻芳作了主题报告,简要介绍了华群女士的事迹,特别强调了她的人格精神,还谈到了华群女士对作为校长角色的吴贻芳的帮助。吴贻芳在报告中说:

华群女士籍就美邦,公元1886年生于伊利诺州,髫龄就学,颖悟过人,秉性慈淑,见义勇为。初毕业于伊利诺州师范学校,任教员数年,获有积蓄,始入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民国6年来华,任安徽合肥三青女子中学校长。年满返回休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

民国8年秋,女士应本校之聘,任教育学系主

^①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任兼教导主任,精心策划,建树既多,执训启迪,同学尤深爱戴。前校长德本康夫人倚之为左右手,遇休假之年,辄请其代校长务;女士以学校为己任,不辞劳瘁,苟有暇晷,则拜访附近邻居,询其疾苦,为解除计,在学校附近创设乐群社,懿师家政学校,领导学生,于课余前往服务。

女士于休假之年,非入研究院研究,即赴欧洲各国考察教育,对丹麦之民众学校,尤感兴趣。渠对教育既有深湛之研究,又积多年之经验,故力主大学毕业生如欲往中学任教员者,必选一中学课程为主修,再学教育原理,教学法,及实习教学等,以此创设附属实验中学。附中一切,均由女士规划,学生实习,亦必躬亲指导,其负责如是。后教育部曾定大学生有志任教员者,须习教育学课程12学分,与女士主张,完全符合。国联教育考察团曾来校与女士长谈,对女士的教育主张,极为赞佩。

民国26年冬,日军侵华,首都被兵,女士毅然为本校留守,目击城中女孺惶惶不可终日,遂就本校设收容所。时倭军纪律荡然,敌将且作有计划之大屠杀,以此罪恶行为,罄竹难书,独留本校收容所之妇孺万余人,赖女士奋不顾身之维护,得获保全,遂有“万家生佛”之称。然以昕夕从事,冒险犯难,心力交瘁矣。后首都秩序渐有进步,妇孺可以回家居住,惟无家可归者又成问题,因设职业



科,授以生活技能,使能自保生活;更设实验科,即附中之暗中复活,以教育陷区之女青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观,卒以体力不支持而抱病,经朋友之敦劝,始于民国29年5月返美调治,延至翌年5月14日,康复乏术,竟与世长逝。噩耗陡来,闻者莫不震悼。中枢轸惜良深,于次年6月10日,由国府明令褒扬,以资矜式。

复员以来,万端待理,缅怀前修,益增劳念。溯貽芳于民国17年秋继长校务,时德前校长既返回休假,而女士亦辞教导主任,仅任课程委员会主席,然对学校一切计划,仍悉心借箸代筹,既不居名,又不强人采用,貽芳得其襄助至夥,对其人格,尤为钦佩。盖女士深得基督之博爱精神,待人接物,无不具有爱心,故能舍己为群,乐善不倦,其感人之深,如铭入心脾,永远不能使人遗忘。兹值女士逝世6周年纪念,敬以所知,据实略陈。^①

四、教师管理

(一) 教师的聘任

一所大学的创办与发展,关键是要有合格的教师。金女大的创办者在办学过程中,为聘任合格教师花费了许多

^① 吴貽芳:《华群女士事略》,《吴貽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心力。最初的教师是由金女大创办人管理委员会任命的。据德本康夫人回忆,1914年管理委员会为开办金女大先后任命了伊丽莎白·埃·高切尔小姐、弗雷德里克·阿·米德小姐、诺玛利小姐,但“教师不是有经验的大学教授,不得不以学生做实验,以找到最佳途径和最好的办法”^①。金女大开学之后,不仅现有教师水平不够,而且教师人数也不够,不能满足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与音乐教育。德本康夫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没有什么比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更重要了。……我们要求我们的教师有业余时间提高自身素质,多与学生接触”^②。金女大招生开学2年以后即1917年,教师的情况有所好转,譬如蔡路得小姐(在史密斯学院获博士学位)、利蒂亚·B·希朗小姐、黎富思小姐(在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薛浦来小姐(布林摩尔学院毕业)等先后来校从教,但同时有两个美国教师离去,这使得校长提心吊胆。20年代之后,教师队伍状况有了好转,譬如1920—1921学年,已有教师16人,并有5人为中国人。这些教师的学科结构包含了生物学、教育学、历史学、数学、英语、物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使金女大对学生进行较全面的学科训练成为可能。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1923年搬进新校园后,从美国请来了一批“访问教授”,利用这些访问教授的影响,对金女大进行指导,同时也解决金女大在发展过程中教师队伍不足

^{①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第16页。



和整体水平还不高的问题。这些访问教授一般对某一学科或在某一方面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当他们在美国享有数月或半年、1年假期时,金女大将他们聘来,从事教学或其他工作。据记载,这些访问教授在金女大工作期间都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史密斯学院化学系的埃伦·P·库克(Ellen P. Cook)小姐来到金陵,最初只准备待1个学期,结果差不多工作了2个学期,在建立新实验室方面给蔡路得很大的帮助,极富感染力的教学唤起了学生的热情。来自史密斯学院的艾尔文·F·乌德(Irving F. Wood)教授开设比较宗教学课程,吸引了很多听众。

吴贻芳出任金女大校长后,根据社会实际,如教育部对大学教师资格的要求,以及教会学校教师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受到冲击,不少教师离校回国,从国外聘请教师来华教学困难等情况,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教师队伍问题。

一是着手解决中外教师比例失调问题,实现了由外籍教师为主向以中国籍教师为主的转变。如1930年金女大有教职员工47人,其中中国籍30人,美国籍14人,英国籍1人,法国籍1人,德国籍1人。此后陆续聘请的教师中以中国籍为主,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

二是聘请南京其他高校教师做兼职教师。如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师来校兼课,与金陵大学实现相关课程互修,学分互认。这不仅使金女大所开课程范围更广,而且使教师队伍在动乱环境中不规则流动影响授课的现象得到缓解。

三是邀请外国学者、教授、名人来华度假、访问兼讲学。如1931年就有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一大批客人来访,他



们中有拉德克列夫学院校长阿达·L·孔斯多克(Adal. Comstock),夏威夷大学克劳弗女士,《太平洋事务》编辑伊丽莎白·格林小姐,明尼苏达大学奎格尼(Quigley)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亚当斯(W. G. S. Adams)教授,澳大利亚工业部顾问陶尼(R. H. Tawney)教授,总理大臣顾问吉普先生等。这些客人给金陵女子大学带来了新信息,活跃了学术气氛,同时扩大了金女大的影响,也给金女大的师生,尤其是学生以鼓舞。德本康夫人说:“在金陵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经验之一是款待客人。”^①

四是发动在职教师推荐教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金女大的案卷中,有一张“各学科部聘请教授候选人名单”,表中列有“被推荐人姓名”及“荐举理由”2个栏目,该表发给在职教授并由其填写。在填表注意事项中要求:“荐举人得于本名单外另列荐举其他合乎原办法第二条规定各条件(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10年以上者;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之人选,惟须详细注明其任国立各院校教授起始年月及著作名称。”^②同时,教育部给金女大发布训令,指示如需聘用临时助教等,要报教育部核办。这一方面可使金女大聘任教师的水准提高,并在聘任时得到教育行政当局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受到削弱。譬如,教育部要求金女大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② 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37。



对教师异党思想和倾向进行调查,然后决定续聘或解聘。

五是举行教职员就职宣誓典礼,形成同舟共济之心。在动荡的岁月里要稳定教师队伍,尤其是稳定优秀教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贻芳采取的多项措施中有一项是举行教职员宣誓典礼,通过宣誓,使新教师明了学校的办学理念,进而进行自觉的约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交职典礼程序》较详细地介绍了举行交职典礼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7个方面:1. 导乐:全体起立,旧职员入席。2. 交职:新旧职员。3. 宣誓:新职员宣誓誓词为:吾等誓以至诚戮力同心,共谋增进同学之自治能力,及智、德、体、群之充分发展,严守会章,执行决议,为同学们服务,不辞劳怨。如违誓言,愿受全体大会之制裁。谨誓。4. 演讲。5. 报告。6. 介绍新职员。7. 唱校歌。通过这种慎重、庄严的宣誓典礼,加入金女大教职员队伍者必定增强责任感,体会到为学生服务的神圣。

经过努力,吴贻芳基本上解决了教师队伍不足和变动过速影响教学的问题,教师的学历层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1936年,专职教员34人,兼任10人,其中博士8人,硕士16人,本科毕业生20人。值得指出的是,吴贻芳在聘任教师时,非常重视人格因素。她在1930年发表的《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一文中指出,教会学校必须慎选教员,“因为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是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① 吴贻芳认为,“教师的素质

^①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1930年)。



直接影响学校的学术水平及健康的风气”^①。同时,为了协调与教会的关系,以及体现教会学校的特点,吴贻芳在聘请教师时也要考察受聘者是否愿意依循教会大学的办学思想,是否明了教育所包含基督的爱和服务的精神。

(二) 教师的使用

吴贻芳对于教师的使用,概而言之,就是不仅要求她们授课,还要她们参与管理育人。

对于教师,吴贻芳可谓充分挖掘其潜能,除了授课教学外,还让她们兼任学校管理工作,更重要的是让她们做学生的导师,对学生的生活、心理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这便是导师制。吴贻芳出任校长前,金女大即实行了这种制度,但还不完善;吴贻芳就任校长后采用这种制度,并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逐步加以健全,进而充分发挥了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作用。

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同时发出《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训令。《纲要》提出,为矫正现行教育“偏于知识传授,忽略德育指导”的状况,参照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办法而制定。《纲要》规定,中等以上各校应将学生分为小组,每组以5~15人为度,设导师1人,由校长指定专任教师充任。导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摄卫等,均应体察个性,施以严密之训导。训导方式除个别谈话外,导师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68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应充分利用课余及例假时间集合本组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会、远足会等,做团体生活的训导。导师对于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身体状况各项,应依照格式详细记载,每月报告学校及家长1次。各级导师要每月举行训导会议1次,汇报各组训导实施情况,并研究关于训导的共同问题。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练时,可以请求校长准予退训。经两位导师退训的学生,即由学校除名。在学生毕业时,导师应出具训导证书。这种证书在学生升学就业时,其关系方面得随时调阅。为了将导师制度彻底落实,《实施导师制度应注意之各点》指出,导师制在我国教育史上属首创,它能否成功,大部分系于校长。因此,校长应慎选导师,并应对于导师之施行训导随时加以协助和指导。要求导师实施训导时,最应注意之点是以身作则。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要保持师道尊严。导师训导学生,除对国家、社会负责以外,对于学生家长,尤应负直接责任。教育部训令要求导师与家长要及时沟通,处理好关系,以为学校训育开一个新纪元,为社会道德立一新基础。^①

1940年,金女大对导师职责进行了如下规定:导师应排定时间与本组学生做个别谈话,做个别指导;应当集合学生举行讨论会、谈话会等,做团体生活之训导;导师应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络;导师应熟悉学生所修课程,并向教务处接收学生的成绩报告;导师应知学生健康状况及加强身体、诊

^① 参阅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治疾病等问题,并注意其思想及行为;学生毕业时,导师应准备训导证书,此项证书为取得学位必要证件之一。^① 这种导师制,在金女大有时亦称为顾问制度,分为班级顾问与学生个人顾问两种,后来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将学生个人顾问改称为导师,班级顾问因事关一个班级的活动,故仍予保留。后来,金女大明确规定:导师“即讲师以上专任女教员之住校者担任”^②。每位导师指导学生7~15名不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有一份金女大就学生学习、思想、体格等情况征求教员意见表。^③ 该表一方面反映了学校管理部门对学生的关注,对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反映了教师对学生的了解要做到全面细致,不仅要明了学生的不足,而且要知晓导致不足的原因,并能提出改进的建议,给学生以恰当正确的指导。

教员意见表

学生姓名_____	
(一) 学生方面之困难或短缺	(二) 补救办法之建议
1. 基本训练不足	1.
2. 成绩过劣	2.
3. 天资鲁钝	3.
4. 运用英文能力不足	4.
5. 数学程度不够	5.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年9月印,第19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1945年编印,第11页。

③ 《教员意见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32。



续上表

学生姓名_____	
6. 运用国文能力不够	6.
7. 不专心向学	7.
8. 课外或校外工作太多	8.
9. 所修课程嫌多不能胜任	9.
10. 体格不健全	10.
11. 缺席或迟到过多	11.
12. 有意规避或不按时完成 教员指定工作	12.
13. 不守教室规则	13.
14. 其他	14.
学生号码_____	教员签名_____

吴贻芳认为,“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联系”^①。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育“家庭精神”,营造学校如家的气氛。“本校素来主张学校家庭化,学生在校不啻在家庭中,一切训导以此为目标,故有金陵大家庭之称。”^②为配合导师制,营造金女大的家庭气氛,吴贻芳推行了姐妹班制度。这些措施使学生对教师和同学不仅有师生之情、同窗之情,还有了亲情之感,毕业后仍然对母校有着浓浓的眷恋之情,不管走到哪里,都视自己为“金陵女儿”。应该说,金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②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1945年编印,第11页。



女大通过导师制,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生学业、生活、心理、就业等方面的指导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实施导师制的过程中,吴贻芳还以身垂范,担任班级顾问。据1932年毕业的黄续汉回忆,当年吴贻芳不仅是校长,还兼任她们班级的顾问,经常与她们谈心,具体指导她们的学习和生活,了解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及家庭状况。

(三) 教师的待遇

如前所述,金女大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稳定教师队伍。这除了其教会学校性质,一些教师来自国外,流动变数增加,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师的待遇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在德本康夫人时期,教师以外籍为主,她们的工资由支助创办学校的差会提供,并且是参照国外标准。这些教师能否坚持在金女大为师,主要取决于其对金女大事业的关爱程度,像德本康夫人、黎富思、蔡路得、华群、师以法等能够长期坚持在金女大为师,主要原因是她们对金女大事业的热爱。但吴贻芳为校长之后,教师队伍发生了由外籍教师为主向中籍教师为主的转化,解决好教师队伍的待遇,使她们安心教职就变得很重要。吴贻芳就任校长以后,主持了南京宁海路教职员住宅楼2栋、校内南山教职员宿舍楼2栋的兴建,并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生活、医疗服务等设施,保证了教师安居的环境。同时,吴贻芳积极争取捐款和教育部的补贴,保证教师的薪金、津贴等应有的待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1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员待遇记录,时间不详,从有关内容看可能是抗战前实行的待遇标准,具体内容是:



本院教员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4等，其待遇如下：

- 一、助教 100~180 元；
- 二、讲师 160~260 元；
- 三、副教授 240~360 元；
- 四、教授自 320~500 元。

以上为专任教员的正薪，至于津贴有下列各种：

一、生活津贴：每人每月 200 元。

二、薪贴：助教每月 20~30 元，讲师每月 30~40 元，副教授每月 40~50 元，教授每月 50~80 元。

三、专任教员之指数津贴：按每月物价指数及薪额各贴 20%。例如 10 月份此项津贴为正薪之 6 倍半，则月薪 100 元者可得津贴 650 元。

四、米贴：除教员本人 1 双市斗外，直系眷属之无职业者亦照教员本人贴付。惟不满 10 岁之子女则贴 5 双市升。此项米贴每双市斗均须扣基本米价 10 元。

五、日用品津贴：教员本人全年为 800 元，其无职业之配偶同子女则为 300 元，均一次发给。

六、房贴：凡不住本校宿舍者，月贴房租 30 元，有眷属者加倍。兼任教员以授课时间计算，讲师每小时 30 元，副教授每小时 40 元，教授每小时 50 元。^①

^① 《金女大教师福利和教师待遇》，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案卷号 39。



抗战前国立高校教师的薪俸基本沿用 1927 年由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即教授 400~600 元,副教授 260~400 元,讲师 160~260 元,助教 100~160 元。抗战爆发后,由于经费支绌和物价等因素影响,以及此前对大学教员薪水没有严格级别划分带来的困难,1940 年 8 月,教育部制定并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①,详细规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的月薪标准,具体将高校教师中的助教、讲师、副教授的薪俸分为 7 级,教授的薪俸分为 9 级:

第一级:助教 160 元,讲师 260 元,副教授 360 元,教授 600 元;

第二级:助教 140 元,讲师 240 元,副教授 340 元,教授 560 元;

第三级:助教 120 元,讲师 220 元,副教授 320 元,教授 520 元;

第四级:助教 110 元,讲师 200 元,副教授 300 元,教授 480 元;

第五级:助教 100 元,讲师 180 元,副教授 280 元,教授 440 元;

第六级:助教 90 元,讲师 160 元,副教授 260 元,教授 400 元;

第七级:助教 80 元,讲师 140 元,副教授 240 元,教授 370 元;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5 编,第 1 章,第 28 页。



第八级:教授 340 元;

第九级:教授 320 元。

相比而言,金女大教师的待遇高于国立大学。教师的配偶及其子女也享有一定的补贴,这在国立学校是少有的。值得一提的是,金女大特别关注教师职员的眷属,过一段时间要对教职员的眷属进行了解,以便掌握情况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了吴贻芳的人道、关爱精神。吴贻芳还很尊重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节日,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日组织教职员进行联谊,如在圣诞、春节设宴款待教职员,以加强联络,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因此,在吴贻芳校长任内,教职员队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在战乱中保持着凝聚力,做到继续艰苦办学。

吴贻芳带领金女大教师坚韧办学的事迹,赢得了社会的赞誉。教育部在 1941 年对大专院校专任教员颁发奖状、给予奖励时,金女大有 11 位教授获奖: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黎富思、华群获一等奖,师以法、惠迪穆获二等奖,吴贻芳、苏爱兰、刘恩兰、顾天琢、黄丽明获三等奖。1943 年,国民政府认识到教育事业不仅培植人才,而且关系到国家文化的整体发展,故须教育界服务人士能够持续不断的努力。行政院拨出 200 万元,分别奖励专科以上学校有突出成绩的教员。金女大获奖的教师有 10 位,她们是:蔡路得、陈觉玄各获 3000 元,吴贻芳、余竹平、师以法、苏爱兰、黄丽明、闵侠卿、张少微各获 1500 元。

(四) 教师的培养

吴贻芳任校长期间,不仅在教师聘任、使用及改善待遇



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注重培养,提高教师水平,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突出的有3个方面:

一是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尤其是选派自己的毕业生出国留学,攻读学位。像创办地理系的刘恩兰博士,抗战胜利后回母校工作的鲁桂珍博士,在社会学系工作并在儿童行为指导方面成绩突出的汤铭新教授,教授社会学课程的朱觉方博士等,都是从金女大毕业,并由金女大安排出国留学,然后返回母校工作的。这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而且这些优秀毕业生返回母校任教,带来最新的科学信息和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也有着一种激励,有了可以效仿的榜样。

第二个方面是举行教师进修会。这种进修会,教职员于每学期开始时都要举行一次,目的在于促进灵性的修养,检讨工作的得失,研究改善的措施与方法。如1935年9月教职员举行的进修会,主题是“全心全意热爱上帝”,强调奉献仁爱之心,要求教师的工作与基督教的宇宙观联系起来。一些教师提交了论文,讨论不同学科教学中的宗教暗示,如师以法小姐提交的论文讨论的是“自然、人以及上帝”的问题,德本康夫人则提交了讨论“天文学与宗教”问题的论文。第二年3月举行的进修会,则集中讨论基督教大学的宗教生活问题。从这两次进修会的主题看,学校关注宗教教育问题,主要是吴贻芳任校长后淡化宗教教育的做法受到了来自创办人及教会团体的批评,说金女大没有增强学生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以后的进修会有不同的主题,如1945年4月金女大教职员举行讨论会,主题是中英美三国教育制



度研究;1946年9月举行的进修会,由吴贻芳主讲“对金陵的展望和能力的来源”。教职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养成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态度,如何培养合作互助精神,怎样发扬金陵固有的美德,如何了解和引导学生的思想等方面。学校定期举行教师进修会,研讨一些重要问题,以求引发思考,互相学习,彼此借鉴,这对于促进教师教学业务水平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支持教师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和报告本人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交流,推进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如1933年10月,金女大国文教授龙铁元先生向学生演讲《文学与哲学》;11月,数理系李国鼎先生演讲《从时间说到超人的宇宙》,介绍爱因斯坦的时间观。1937年2月,社会学系主任龙冠海教授、穆思曼教授出席中国社会学第6届年会,并带去《中国各大学社会学课程调查》、《介绍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之训练》的论文。教师的学术文章,不只是在校园里、在国内,也参加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如地理系刘恩兰博士曾到美国讲学,家政系鲁桂珍博士曾出席第17届国际生理学会。但从整体来看,金女大教师的学术水平还不突出,除少数高水平的教师有一些著述和独到的研究外,一般教师的学术研究开展得不够。吴贻芳评价道:“金女大对科学研究工作开展不够,科学仪器设备不够完善。由于教师不足,专业教学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学校对通过独立探索写得颇好的论文没有进行表扬鼓励。学校没有办过专门的学术性刊物,所以,有些教授的著作只得在校外各类刊物上发表。教师中的特殊贡献,或者说他们学术上的



成就,也没有提出来让大家了解研究。”^① 客观地讲,吴贻芳对金女大教师学术水平的估计或对自己主持校政后科研工作的估计是中肯的。金女大属于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而非研究型大学,或者说金女大还称不上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大学,因此,尽管吴贻芳重视教师的培养,但其关注的还是教学业务素质的提高,而非学术研究素质的提高。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第

六

章

学生活动与学生管理

一、对学生活动的态度

吴贻芳在金女大求学期间,最初参加活动较少,后来逐渐成为学生活动积极分子,并担任了金女大学生自治会会长,在组织学生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她担任校长后,对学生活动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金女大学生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从活动的内容看,有日常的学习活动,以课堂为主;有学术活动,即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聆听学术报告,撰写论文等;有体育活动,即参加体育比赛和身体锻炼;有文娱活动,参加各种文



娱活动;有宗教活动,即参加礼拜等。从活动的组织看,有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活动,有女青年会组织的活动,还有其他学生团体组织的活动以及学校、班级组织的活动等。从活动的范围看,有宿舍活动,校园活动,服务社区邻里的活动,参加全国范围的诸如竞赛活动等。从活动的性质看,有纯粹的学术活动、宗教活动、社会服务活动,还有政治活动,即学生爱国运动等。从时间看,有课内活动、课余活动和假期活动。从活动的参与者看,有师生共同参与、班级参与的集体活动,也有个体活动。吴贻芳对待上述多种活动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参加与学业活动有关的各种活动积极支持,并形成制度,加以引导和规范;对学生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则给予鼓励支持;对学生参与宗教活动则随其自然,不予要求;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尤其是爱国运动采取不提倡但默许的开明态度,表现出复杂局势下的复杂心态。但总体来讲,她做到了与时俱进,在实际行动上还是给予学生以支持和帮助的。

首先就金女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爱国运动的情况来分析。在当时,能够进金女大读书的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与教育背景。据黄洁珍女士统计,1936—1937年,金女大有学生259人,其中来自商界、政界、教育界、宗教界的学生计202人,而来自农业界的只有2人。学生受家庭影响,一般会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在这些女孩子身上表现为关门读书,不问世事。正如吴贻芳所指出的:“因受到教会以及家庭出身、社会环境的影响,学生一般都存在着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学校不能脱离政治,历次的



重大革命运动仍波及到学校。”^①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时，金女大学生参加了罢课示威游行。金女大学生能够加入五四运动，与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及西方外籍教师比较开明的态度有关系。据吴贻芳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了。当时校长德本康夫人与管理学校的其他外籍教师如蔡路得女士等，都属基督教中的社会福音派，比较开明，允许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强行制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当时学生会作出决议，参加罢课，她们也不得不使学生按她们的全体决议去办。”^② 金女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除参加示威游行外，还分别进行阅读近代史，编写壁报，写通俗讲稿，上街宣传，组织儿童来校识字，组织妇女识字班等活动，对附近的妇女儿童进行爱国宣传。“她们这种精神和行动，使教师们也受了感动，曾对学生进行慰问，晚间还表演了节目。”^③ 前任校长对待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爱国运动的这种态度，对吴贻芳无疑有重要影响。吴贻芳担任校长后，金女大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学生因吴贻芳强调服务社会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化，关注国家的命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事变，占据沈阳，开始控制整个东北地区。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催促政府向日本宣战。金女大响应北方大学生的号召，参加游行请愿，并且组织了一个全国抗日救援分会，师生分成若干小组到街道商店检查日货。

^{①②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第113～114页，第114页。



吴贻芳带头将自己的日货拿出来销毁。同时,吴贻芳支持地理系教师刘恩兰先生和选读她们课的同学举行了一次我国地理展览会,以我国地理各方面的材料来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思想,宣传抗日。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金女大学生中流传日本兵到了无锡,到了南京下关,使得气氛紧张,人心惶惶,并且有学生家长打电报要女儿赶快请假回家。吴贻芳了解情况后,马上召开校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定:一、学校立即向有关方面了解真实情况;二、如有家长来电要学生回去,学生可以走,但作无故旷课处理。后来经了解,证明传说为谣言。吴贻芳随即召开学生大会,对同学们说:“你们回想一下,前些时候你们上街检查日货,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何等的英勇!可现在敌人的影子还没有见到,听到几句谣言,就这样惊慌,想赶快逃回家去。你们的爱国行动就是上街喊几句口号吗?你们只想自己逃命,把国家都忘了,你们心里还有祖国吗?”^① 她告诫同学们:“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应该见诸行动。”^② 在吴贻芳的激励下,金女大学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的爱国行动。当时南京鼓楼医院的一些护士因害怕战火蔓延而回了家,金女大不少寒假留校的学生自动每日去医院做些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社会好评。

^① 张竞:《吴贻芳》,《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68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贻芳不仅自己主动参加抗日活动,而且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活动。金女大迁到成都与华西大学等联合办学后,对学生参加爱国活动态度明确,吴贻芳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大学生战时服务团”。当时有的学校限制学生的活动,强调读好书是学生惟一的职责,有的学校甚至把参加战时服务团的学生找去训话,警告他们不得越轨。“而在金女大,学生们则感到校长吴贻芳是与她们站在一起的。有的同学因参加救亡活动回宿舍较晚,学校也给予谅解(学校规定,熄灯前学生必须全部回宿舍);学生因参加义卖,集中在宿舍的两个房间里通宵缝制手工艺品或参加演出,排练抗日宣传剧,学校当局也不加过问。由于吴贻芳的支持,在华西坝各大学里,金女大学生的爱国活动特别活跃。”^①金女大学生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有宣传、义卖、募捐,慰劳去前方抗日的“壮丁”等,义卖所得全部上交为抗经费。后来,日本侵略军经常派飞机轰炸重庆、成都和一些中小城市,给没有任何防空设备的平民百姓带来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金女大学生积极参加了空袭救护队。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记述:“特别是1939年6月11日晚,敌机疯狂轰炸成都,有些居民区几乎夷为平地,学校墙外的一家茶馆也被炸,市民伤亡惨重,救护队员不等空袭警报解除就争先冒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将他们抬到华西大学的礼堂,帮助华西医学院的师生抢救、护理,还煮稀饭喂伤员吃。被炸的地区有几处起火,为防备敌机看见火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85页。



光再来空袭,我和几位教师夜里不睡守夜。午饭以后还步行看望伤员,逐一问候,给大家很大鼓舞。”^①

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害怕学生救亡运动的牵连,成都华西坝地方行政当局开始公开限制学生们的活动,尤其是战时服务团的活动。暑假期间,战时服务团想利用假日去外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对此,华西坝当局进行了多方拦阻,先是要求学生不准打“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的旗子,后来同学们提出以“五大学学生暑假服务团”的名义,也未获准。学生们在气愤之时想起吴贻芳,认为她一定会支持战时服务团的活动。于是,金女大的团员们找到吴贻芳,说明了想法,并提出请校长帮助她们跟当局疏通。吴贻芳听了同学们的叙述,想了一会儿,说:“你们利用暑假时期,下乡宣传抗日,这是件好事,我同意。但我只能同意金女大同学下乡宣传,我不能代表华西大学和其他3所大学。”^②金女大学生在吴贻芳授意下,将吴校长的态度转告其他4所大学的团员,其他4所大学的校长听吴贻芳校长同意金女大同学暑期下乡宣传抗日,也只好仿照而行,华西坝当局也没有再加阻拦。于是,这年暑期一开始,学生战时服务团团员们就举着“华西坝华大齐大金大金女大中大暑期乡村服务团”大旗,奔赴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抗战胜利金女大迁返南京后,吴贻芳对学生参加政治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87页。



活动表现出复杂的心态。吴贻芳说：“1946年迁回南京以后，金女大的政治空气一度比较沉闷。1946年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和1947年‘五二〇’事件及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在狱中被杀事件，虽然有其他学校学生来联系，本校学生都没有走出学校去参加。”吴贻芳后来给蔡路得博士的信中也记述金女大没有参加南京的学生游行。1947年5月，由于国民党当局醉心于内战，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货物紧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南京大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大游行”，掀起了抗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场反饥饿争取全国公费的活动，很快波及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除对南京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与支持外，又进一步提出了反迫害、反内战等口号。沪、宁、杭三地学生组成联合请愿团，在南京向行政院、教育部、参政会请愿。5月20日，沪、宁、杭三地学生在南京组织联合大游行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当时被打伤50余人，重伤3人，失踪40余人。金女大学生没有参加这次学生活动，具体原因不详，但可以推断的是，吴贻芳与当局的关系而对学生参加运动不予提倡，以及经过抗战的颠沛流离，女学生们想静下心来读书，是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之后，吴贻芳关心学生的爱国行动时，同时对学生提出告诫，要求学生“三思而后行”。这种对学生“三思而后行”的要求，依然影响吴贻芳对待1947年及此后学生参加运动的态度。

但另一些文献记载，吴贻芳在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表现出了同情、支持的态度。丁光训在吴贻芳的追思礼



拜上提及,当时吴贻芳对这次学生运动给予同情,并就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的暴行,当面向蒋介石表示了义愤与抗议。另一篇《平凡人生丰盛生命》的文章指出,遭到当局严厉镇压,南京一些大学的校长们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保护,开会向当局请愿,吴贻芳率先出来讲话,说:“学生要爱国,我们是不能压制的。”施葆真在一篇《我们为什么这样热爱吴校长》一文中叙述这一行动不只是简单地从一个为人师者对学生的爱护出发,更表现了吴校长大义凛然的气概。^① 朱学波在其所著《吴贻芳》中记述了吴贻芳在“五二〇”事件发生后当面责问蒋介石的事。《吴贻芳纪念集》记载:“就在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在蒋介石邀请参政员出席的午餐上,吴贻芳和蒋介石坐在一桌。在交谈中,吴贻芳提出,应该将南京市的警察局长调走,蒋介石反问何故,吴贻芳说:那些警察名曰维持秩序,实际上却对学生大打出手,有的学生已经逃进了水果店,警察还是紧追不放,追进去揪出来殴打,这难道不是警察局长的责任吗?谁知这席话却大大触怒了蒋介石。”^② 蒋介石很不高兴地对吴贻芳讲:“警察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嘛!近来一些学生也闹得太不像话了,一个国家的首都总不能没有正常的生活秩序嘛!”蒋介石进而说:“这些学生都是被共产党利用的,不把共产党分子从学校赶出去,学校是没法办下去的,

^① 参阅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68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项士毕业论文,1996年。

^② 《吴贻芳传略》,《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学生们也没法好好学习。”^①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作为校长和教育家的吴贻芳有鲜明的表现,并开始对当局表示不满。对此,黄洁珍女士是这样分析评价的:“其实,这些对国民党政府猛烈抨击的言辞在吴贻芳的历史档案资料未曾寻见。后期有关吴贻芳的文章就带点政府色彩了。”^②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很少有大学校长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公开表示支持的,多是默许或加劝阻,当学生运动遭到当局镇压时,又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学生。吴贻芳便是如此。1947年下半年,金女大的学生成分发生了变化,有了进步学生的积极活动,“学生中进步力量有了发展”^③。1948年4月底,部分学生开始走出校门,有组织地参加南京大中学生联合举行的五四纪念会和中山陵音乐台“革命歌曲大合唱”等活动。“面对即将兴起的学生运动,吴贻芳感到很为难。她认为学生的许多活动是有理的,有积极意义,但作为校长和基督徒,又总觉得这与抗战时期不同。作为学生,最好不要过多地去问政治,重要的是将功课学好,国家大事由政治家去解决。”^④ 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她以较为严厉的口气要求同学们不要过问时局,不要介入政治运动。

①④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07页,第109页。

②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68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以往大家出于对吴校长的尊敬,无论她讲什么话,也无论她讲些什么,师生们总是认真地听,并报以掌声,而这一次,她还没讲完,同学们就开始了议论,一些同学认为校长讲得不对,怎么能不关心政治呢?外面在打内战,我们能安心读书吗?有一位姓王的同学还破天荒地顶了吴贻芳几句。吴贻芳很冷静,没有发脾气,也没再多说便宣布散会。1948年5月1日,校训导执行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个人参加组织自不干涉,但决不可借用学校、学生会名义参加任何校外组织。这表明学校做了妥协。到5月中旬,南京市大中学生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以纪念“五二〇”惨案1周年。“5月19日晚间周会上,出于对学生们安全的担忧,吴贻芳再次委婉地劝告大家,不要离校参加南京市的示威游行。还说,你们的父母兄长把你们交给了我,我有责任保护你们。如今外面的情况很复杂,你们出了事,对你们自己,对学校都不好。尽管她这样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①5月21日,金女大学生参加了南京市大中学生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5·20”惨案1周年,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国民党当局害怕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抗,便出动了大批军警,沿路阻拦游行队伍,并强行抓走了4名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一下更激起了全市学生的愤慨。金女大学生于次日举行了全体学生紧急会议,通过了罢课决议,又组织起游行队伍,高举“还我人来”的横幅,汇入兄弟学校游行队伍的行列,前往国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10页。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请愿,强烈要求释放被迫害学生。经过谈判与斗争,到傍晚,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金女大上街游行的学生曾担心吴校长会派管学生的老师来阻止,也担心吴贻芳会亲自出面阻拦。如果这样,学生们就很是为难了,她们不愿与自己尊敬的校长发生冲突。但在整个游行示威期间,吴贻芳没有出面加以责难和干涉,也没有派人进行阻拦和限制。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军警特务知道公开镇压学生运动不行,便采取了秘密抓捕的办法,一些进步学生或白天在大街小巷失踪,或夜晚被闯进校园的军警特务秘密抓走。一时间,南京城笼罩着白色恐怖。吴贻芳听到金女大的学生也有被列上黑名单的,有可能被抓走的消息,便立即前往教育部,约见次长杭立武,严正声明:“金女大作为一所国际知名的女子大学,从大革命以来,军警就没进入过学校。为了高等学校的尊严,也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宪特不得进入我金陵女大,不得在校内秘密捕人。”^①对此,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金女大学生洪范写道:“回想当时学生运动的那些岁月里,南京各大学都常有学生被捕、坐牢,我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一样有党的地下组织,有进步学生运动,市里各种民主学生运动,我们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但军、警、宪、特没有进校捉拿过一个人,没有一位同学坐过牢,我们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②这应该归功于吴贻芳的保护。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11页。

^② 洪范:《校长和我》,《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面对动荡不安的环境,由吴贻芳校长建议,金女大训导委员会改为生活辅导委员会,下设生活辅导处,代替原有的训导处,以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管理,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课外活动规则》,以求把学生的课外活动纳入有章可循的轨道。吴贻芳还决定将学校对待学生活动的一些主张与学生家长沟通,以求得家长支持。学校将列出3个原则的函件寄给家长细阅,如果家长同意,再由子女阅看,然后将家长与子女签署的同意书寄给学校,不同意者不用签署,但该生需转校。这是1948年临近暑期作出的决定。金女大列出的3个原则是:

1. 我们同意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目标,并对学校的施教充满信心。
2. 所有学生团体必须向学校注册及得学校承认,所有活动需在学校条例的范围内。
3. 若学生所参加的活动不受大学承认,大学并不负责。^①

金女大的决定显然是要让家长知道,接纳3个原则的学生,校方愿意与她们合作。很多家长回复函件表示支持校方的决定,每个学生都交了签署同意书的回条。但到这年的8月份,留在学校过暑假的学生收到匿名函件,认为学校的3个原则是控制和压抑学生的活动。

“尽管吴贻芳竭尽全力想使学生们有一个安静、温馨的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70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学习环境,尽管她努力使外界对金女大的干扰减少到最低程度,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迅速溃败,首都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南京已处于解放军强大兵锋的威胁之下,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吴贻芳所主张的校园独有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气氛,终于被彻底打破。”^①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离开南京北上,金女大学生决定去欢送,要求真和平。吴贻芳听到国民党散布共产党要在这一天捣乱的信息,担心学生被军警殴打,就设法劝阻,但未奏效。果然,这天下午发生了血案,吴贻芳亲自去鼓楼医院慰问受伤者。“金女大的校长的到来,使学生感到突然,接着是深深的感动,在她亲切的目光中,人们理解了她。”^②

二、学生社团建设

学校作为培养人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通过学生社团建设,开展有组织的、健康的活动,对于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有重要作用。金女大的学生社团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由学校认可组建的学生自治会和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另一类是由有关系科组建的学会、研究会等。从两任校长的比较来看,德本康夫人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13页。

^② 《吴贻芳传略》,《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时期尽管组建了学生自治会和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但这时的学生社团处于运作不规范阶段,至于系科下学生组建的社团基本没有。吴贻芳在校长任内,很重视学生社团的建设,并注重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实现了学生社团的规范化、制度化以及组织的多样化。金女大学生在参与学生社团及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了锻炼。

(一) 学生自治会(厚生团)

金女大学生自治会于1919年3月经学校批准成立。学生自治会有责任治理学生的行为,为学生建立更健康、愉快的学校生活,加强学生学术上的成就等。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在增进学生自治的同时关注社会的变化,很快便组织学生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中。吴贻芳说,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以及“学生不愿被当时的舍监像管中学生似地管她们,要证明自己能够管理自己”^①,是促成学校批准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原因。

这一时期金女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学校要求学生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并关注学生宿舍管理问题。“每晚熄灯后,由负责这一宿舍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将宿舍大门锁好,查看同学是否都已安静休息。学生各自打扫自己的房间,轮流整理宿舍的交谊室。宿舍里有洗衣设备,学生可以自己洗衣,养成节俭和生活自理的习惯。学生出入学校要在学生自治会的出入签名簿上签名。晚上要在10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时前回校。如因故过了时间才回来,第二天早上要向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说明。”^① 学生自治会进行的这些工作致使学生自治会与原来管理宿舍的舍监及其手下的勤杂人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并且使一些西方教师认为学生自治会如同“学生政府”,以致出现学生和教工或行政人员对于社团生活的责任界限难以划清。德本康夫人写道:“学生们为所欲为,全然忘记了她们是在一所美国式的学校念书。她们随意指使工友做这做那,她们安排看门人将来访者的纸条直接交给学生领袖,而不交给学校行政当局安排来管理勤杂员工并负责接待来访客人的女舍监。她们将女舍监从学校家庭中家长的位置上弄下来。在吃饭之前,自己说几句祝词,作为学生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这就使本来应该居于工头位置的舍监处于学生的监督之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些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学生会如此越权行事的职员发现舍监已经被‘降职’为止。”^② 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召开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会议,对自治会与舍监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但调整的结果是学生与女舍监之间产生更进一步的冲突。学生们指出了女舍监的一系列过失,对她管理下的各种现状表示不满,呼吁撤换舍监。学校当局在答复学生时,认为女舍监工作繁难,对学校工作尽职尽责,责任不全在女舍监一边,希望学生自治会给予理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解与支持。许多教职员参与做学生的工作。但女舍监已很难获得理解与支持,结果是女舍监被迫辞职,学生宿舍管理做了新的安排。

吴贻芳继任校长后,注意对学生自治会进行引导和建设,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主要围绕服务、生活、艺术、康乐 4 个方面展开。以 1933 年金女大学生自治会的内部组织为例,自治会下设研究、游艺、平民教育、国货、出版、文书、庶务兼会计等股。其中,研究股下设有政治、社会、学术等研究会及演讲会,游艺股下设有戏剧、音乐等会,平民教育股主要办理工人夜校,利用晚上教国语、珠算、算术、公民等科。随着战事的发展,1938 年吴贻芳根据校训“厚生”之意将学生自治会改名为“厚生团”,并亲自出任顾问。厚生团的组织机构:校长为顾问,全体大会下设提名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总务部、进德部、益智部、健体部、利群部,各自负责相应的工作。厚生团成立后,在参与校内事务管理,协助学校应对战争环境,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厚生团的作用,1940 年,经吴贻芳同意,厚生团确立了自己的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宗旨、组织、职责,要开展的工作与应遵循的规范。

厚生团章程^①

第一章

第一条 本团定名为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厚生团,简称金陵厚生团。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0 年 9 月。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条 本团以促进智德体群之充分发展俾得实现,丰富生命之理想及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为宗旨。

第三章 团员

第三条 凡本校同学皆为本团团员。

第四章 组织

第四条 本团最高机关为全体大会。

第五条 提名委员会由委员7人组织之(每班1人,团长为当然委员)。

第六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由团长1人、文书1人、会计1人、庶务1人及进德、益智、健体、利群4正部长各1人组成之(本校校长及训导主任为本执行委员会当然顾问)。

第七条 本团监察委员会由委员6人组织之(每班1人)。

第八条 本团分进德、益智、健体、利群4部,分工合作,以完成本团宗旨。

第九条 各部组织

1. 进德部——由正副部长各1人及部员若干人组织之。

2. 益智部——由正副部长各1人及部员若干人组织之。

3. 健体部——由正副部长各1人及部员若干人组织之。



4. 利群部——由舍长2人、排长数人组织之。

第十条 提名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之。

第五章 选举

第十一条 团长、会计、文书、庶务及各部长由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大会表决之。

第十二条 监察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大会选举之。

第十三条 职员改选，于每学期终了举行之。

第六章 任期

第十四条 本团各职员任期均为1学年，不得连任。

第十五条 提名委员任期均为1学年，连举得连任之。

第七章 权利

第十六条 凡本团团员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十七条 凡本团团员皆有享受本团一切福利之权。

第八章 义务

第十八条 凡本团团员皆有缴纳团费之义务。

第十九条 凡本团团员皆有参加本团工作之义务。

第二十条 本团团员皆须遵守本团章程及一切决议案。



第九章 职权

第二十一条 各部职权如下：

1. 总务部：a. 团长 总理本团一切对内对外之事务，并督促团务进行事宜。b. 文书 管理记录文书事宜。c. 会计 处理银钱出纳事宜。d. 庶务 管理一切庶务事宜。

2. 监察委员会：监察本团团员之进行，并弹劾各职员工作事宜。

3. 各部职权：a. 进德部 担任社会服务及主持关于宗教生活等事宜。b. 益智部 担任学术研究及各会宣传等事宜。c. 利群部 管理宿舍秩序整洁及卫生等事宜。d. 健体部 提倡正常娱乐及团体个人之健康。

第十章 会期

第二十二条 本团于每学期之初末，举行全体大会2次；遇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第二十三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每月开常会1次，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第二十四条 各部会议，由各部自由规定。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经全体大会通过即生效力。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大会2/3人数通过修改之。

第二十七条 各部费用超过预算，得由执行



委员会通过之。

第二十八条 本团团费规定每人国币伍角。

从厚生团章程可以看出,厚生团的组织建制,体现了民主精神,遵循了内部分工负责又有监督管理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通过厚生团在德、智、体、群等方面的活动,促进学生多方面的发展,体现了吴贻芳主张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厚生团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教育行政当局对学校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宗旨,保留“厚生”之旨意,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如1943年,厚生团在其规则中列出了根据三民主义培养学生法治精神并促进其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的内容。1945年,厚生团提出以自治治事为目标,要求通过学生活动来实践“厚生”之道,即所谓“学校为养成其自动组织与管理之技能,并实习民权之使用起见,特指导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名为厚生团。该团即以实现丰富生命之思想,及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为宗旨”^①。吴贻芳作为厚生团顾问,对其影响是深刻的,因而厚生团也很自然地依循吴贻芳的办学方向走,去实践吴贻芳培养人格完全的学生去服务社会的理想。1947年,厚生团首次改选,考虑到与外界交流的便利,又更名为学生自治会,并对内部组织进行调整,将原来厚生团下设的进德部、益智部、利群部、健体部改为服务部、生活部、学术部、康乐部。服务部主管社会服务及合作社等事宜,生活部主管同学福利及宿舍事宜,学术

^① 《金女大战时训导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195。



部则主管学术研究及出版,康乐部主管娱乐及交际事宜。此后,金女大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因政局动荡和内战及学生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受到学校的控制,学校委派辅导处主任及课外活动组主任做学生自治会的顾问,要求顾问在自治会召开全体大会或执行委员会时都要出席指导,同时明确指出:“学生自治会本是实施团体教育公民训练之一种方式,其宪章原为校方所批准,如有误解,或活动越出范围,以致发生违反本校教育宗旨及教育原理之情态时,本校得随时撤消之。”^① 这表明学校担心自治会的活动越出范围,而成为组织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机构。

(二) 学生女青年会

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是早于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学校社团组织,在金女大创办第二年就建立了。但其发展和开展的众多活动主要是在 20 年代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章程草案》记载,学生女青年会的宗旨是以发挥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其具体目标如下^②:

- (1) 研究基督教信仰之基础;
- (2) 崇奉并传扬基督之福音;
- (3) 促进全校丰满团契生活;
- (4) 实行个人与团体之生活锻炼;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 7 页,1948 年秋。

^② 《金女大基督教青年会章程之草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案卷号 197。



(5) 团结立志献身社会之同志。

该章程草案还对会员提出了明确要求：

- (1) 必有灵性修养；
- (2) 实行俭朴生活；
- (3) 言行真诚；
- (4) 严守时刻；
- (5) 养成合作精神；
- (6) 养成正义感及责任感。

可以看出，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组织侧重于基督精神的修炼，侧重于校内信奉基督的教徒的联谊，同时通过提倡社会服务来实践基督精神。因此，学生女青年会实际起着促进宗教教育发展的作用。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还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下属机构，“暑假期间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领导，在风景优美地区举办大学生夏令营，为期约1周，请教会名人演讲，举行座谈，开展文娱活动”^①。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活动的重点是“社会服务”，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也积极开展了社会服务活动。吴贻芳在其所著《金女大四十年》中，对学生女青年会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作了记载：“学生女青年会办有培幼小学，让附近失学儿童来校识字读书，由学生轮流上课，经费也由学生女青年会筹募管理。以后人数逐年增加，由学生女青年会捐款在学校对面建了平房，成立了邻里服务处，将这个小学由半日制改为全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日制,聘请了专职教师。还设了妇女浴室,又请校医每周去半天为附近的妇女儿童治病。这些为邻里服务的项目,经费都是由全校师生募集的。”^①事实上,女青年会所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是符合吴贻芳办学思想的。吴贻芳认为,“社会服务是一种满足人需要的工作,并且提供人生每一阶段的成长方法”,“金女大学生的社会参与就是要与邻舍分享从学校得来的‘厚生’之道”^②。女青年会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教育儿童,训练与帮助贫苦妇女,提倡卫生,防治疾病,开展平民教育,传播基督教教义等。

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的活动有的是与系科联合开展的,譬如与社会学系联合组织了乐群社,开展以救国自强为主要目的的工作。1936年3月出版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41期刊载《乐群社民国24年秋季工作》,该文指出:“中华民族衰落之四大病症,为愚贫私弱。如欲救亡图存,惟有去除愚昧,启发民智,施以文艺教育,以培养智识力;增加生产,提高生活程度,施以生计教育,以培养‘生产力’;锻炼健全身体,减低死亡率,施以卫生教育,以培养团结力。”金女大学生将自己的服务提升到提高民族素质,挽救民族危机的高度。这种认识显然受到20~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代表人物如晏阳初以及胡适等的思想影响。1937年乐群社开展的工作有:(1)教育方面,举办平民夜校,设立手工班,为青年男女们组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②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100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织四维团(具体内容为:3月教以园艺;4月教以养鸡法,举行足球比赛)等。(2)卫生方面,与南京卫生事务所合作,组织每月一次的母亲会,开展检查体格服务,免费布种牛痘与进行防疫注射,开放浴室。(3)娱乐方面,放映电影,四维团戏剧公演等。学生女青年会在开展这些活动时,推进基督信仰,促进学校宗教生活也没有忽略。

吴贻芳在接任校长后不久的一次工作报告中记述:“1928年女青年会的活动有祈祷会,逢星期四进行,星期日的晚祷会出席的人数令人满意。此外,设有自由参加的查经班,由教职员带领。”^① 30年代初,金女大学生女青年会曾有布道部长、宗教委员长、主日学部委员的设立,并邀请主讲宗教类课程的师以法先生担任顾问。这表明,女青年会的一项工作是重视宗教教义的传播。通过女青年会下设的德育部开展的诸如宗教研究方面、宣布布道方面的活动主要有:聘请校外人士演讲及校内外音乐家演奏,分组讨论及表演德育故事,举行祈祷会,基督徒学生向邻家妇女解说基督教的真义,讲述家庭管理与卫生常识等。对于金女大信教教师和学生女青年会开展的有关宗教活动,吴贻芳曾在《金女大四十年》中从校长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其中讲到由于受教会学校教育的影响,想不到改革,只是执行旧的传统,宗教性质活动照样进行。这带有自我批评性质,但作为一位由国外基督教组织支助创办的教会学校的校长,其受

^①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工作报告》(19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案卷号 1。



教会学校传统的影响是自然的,而她作为一位开明的基督徒,允许学校中的宗教活动也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教会学校尤其是女青年会组织开展的宗教活动是渗透在社会服务之中的,在吴贻芳看来,于社会服务之中开展一些宗教宣传也是正常的,或者在她的心目中,女青年会做到了社会服务为主,宗教宣传为辅,就值得肯定。在此要指出的是,教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仅有外籍的,也包括一些中籍校长和教师,诸如吴贻芳,金陵大学的陈裕光,以及近代教育史上知名人物如张伯苓、马相伯等,都谈到基督教教义对人有教育价值,尤其是对德育有价值。宗教与教育分离,这是基本原则,但宗教影响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又对人起着作用,不惟对信教的人,而且对信教之人周围的人有着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在强调宗教与教育分离,教育不得传播宗教教义的前提下,研究宗教是如何影响人,人又是如何受宗教影响的,这对社会、对教育本身都是有价值的。

金女大女青年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到成都后,其工作并入厚生团的进德部,其活动多为乡村服务、邻舍服务等。女青年会组织在金女大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学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这样来评价女青年会:该组织的活动是体现金女大教会学校性质的主要依据之一,尤其是在金女大向政府注册,淡化宗教课程之后。

三、学生活动特色

由于吴贻芳注重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注重学生





完全人格的养成,因此,她鼓励支持学生组织开展多种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感受到金女大的家庭气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得到锻炼,涵养能力。金女大的学生活动可谓丰富多彩,许多活动都组织得有声有色,具有创意和特点。尤其体现在女子教育方面,堪称针对性突出,特色鲜明,即所谓“学生生活,因本校系统纯粹女子高等教育机关,故一切以适合女子为主,而发挥其特长”^①。

(一) 新生入学周

吴贻芳说,金女大“每学年秋季开学之初有一个‘新生入学周’,对新生进行训练。教务处、总务处、校长室、学生组织等在这几天里分别介绍情况和规则,带新生参观图书室,游览校园,帮助她们了解如何利用图书资料,熟悉环境。”^②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教育,对新生适应环境,迅速地开始大学生活,是有价值的。由高中考进大学,从学生的许多方面讲都是一个转折,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在学习方式上,在人际关系上,在生活环境上,都意味着面临许多新的要求。因此,能否尽快地适应大学生活,也就决定其在大学有多少收获,进而有可能决定其将来的命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女孩子一般都在家庭附近就读中小学,而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则意味着离开了家庭,离开了父母与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第11页,1945年。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熟悉的环境,因而必定感到人地生疏。针对这种状况,金女大每年秋季于正式开课之前,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以帮助她们尽快熟悉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种种要求,做好正式投入大学生活的准备。以1934年9月的新生入学周为例,其开展的内容主要有:介绍金女大的办学目的和学校的发展历史,介绍学校的组织机构及其分管事项,介绍学校的课程安排,介绍学校的学生组织,介绍学校毕业生的就职情况,参观女青年会举办的培幼小学与社会活动中心,观看反映金陵生活的电影等。可见,金女大对新生的入学教育是丰富的。这种入学教育有时由吴贻芳或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亲自主持、主讲。

新生入学周于1938年改为“新生月”。在“新生月”第1周听国内、国际形势报告;第2周、第3周,则分成小组到成都及周围地区的教育机构参观访问,到农村住宿,考察农村家庭和学校,让城市姑娘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以求引发她们对农村工作的兴趣;第4周即“新生月”的最后一周,进行讨论、总结,写体会报告。通过“新生月”活动,新同学不仅了解了学校环境,对社会也有了初步的认识,获得了初步的经验。在活动中同学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对组织活动的教师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对新生的教育由“新生周”活动发展到“新生月”活动,使新生教育更充实,更有收获。这种对新生的教育,在当时的国立大学是少见的,重要的是在金女大形成了惯例。1942年秋对新生的教育,主要内容除了体育及体格检查外,由教职员分别讲金陵校史,金陵的读书生活,金陵的家庭生活,金陵的贷金与资金,三民主义厚生团,



世界形势,如何利用图书馆,五大学及其他学生活动等,最后由学生写出对新生教育的印象。1945年的新生入学教育,不仅有学校历史与办学目的的介绍,更有图书馆使用方法、读书生活的介绍,还有三民主义的演讲,校歌练习,踏访古迹与短途旅行等,可谓多姿多彩。1947年的新生教育,除了教职员欢迎新生的仪式外,校长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学生自治会(厚生团)等都要向新生做相应的报告。由上可见,金女大对新生的教育能够取得好效果,重要的是形成了制度与规范,形成了校内各方面力量都重视与配合的局面。

(二) 姊妹班(姐妹班)

为了增强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使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金女大安排一年级学生与三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与四年级学生结为姐妹班。这种制度规定,每人各有姊妹一二人,作为学业与精神上互相激励、帮助的伙伴。这种制度同时侧重于对新生的帮助,即新生宿舍里一定有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姐姐”同住,以便对新来的“妹妹”进行多方面的照顾、帮助。吴贻芳在评价这种制度的作用时认为,“姐妹班”制度“使这些新来乍到的‘妹妹’能很快习惯新的生活,也使当了‘姐姐’的高班学生学会关心照顾别人,培养了学生间互相友爱的精神”^①。从对学生的教育角度讲,金女大所创立的这一制度有重要价值。这一制度首先打通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了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隔阂,强调不同年级之间的开放、交流;其次,明确了高年级学生有照顾、帮助低年级学生,即师姐帮助师妹的责任;第三,使新生一入校就感受到亲情,而形成对学校的好感,增强了学校的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这种制度推行虽与金女大学生人数较少、较易实施有关,但其指导思想和蕴含的教育意义有着普遍的价值。我国古代教育著作《学记》中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如果同学之间能做到“相观而善”,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就能促进教育的成功。金女大“姐妹班”制度符合“相观而善”的教育教学原则,因而对于改进学生生活,改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生活教育,具有促进作用。

(三) 四年级同学退修会

如果说新生入学周与姊妹班制度,侧重在对新生进行教育的话,那么,四年级同学退修会则是金女大创立的对即将毕业的同学进行人生教育、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的学生活动形式。金女大规定,凡修满3年学程的学生,进入四年级阶段必须参加退修会。退修会一般由教师作主题报告或演讲,然后学生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如1929年的退修会,由师以法先生给四年级同学讲《生命的永恒价值》,学生围绕“如何把所追求的价值实现在金女大的学校生活里”来进行讨论。1934年的退修会则有数位先生主讲,其中,毕范宇先生演讲《如何发展健全人格》,穆思曼女士演讲《团结精神于个人及团体生活之重要》,马文焕博士演讲《大学生对于社会之关系》,吴贻芳校长则演讲《最后一年内如何达到我们的希望》。四年级同学在听完这些演讲、报告之后,围



绕“如何希望大学教育发展我之健全人生”的主题展开讨论。在这些报告引导下,通过讨论,进一步思考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也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握好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这种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对前3年教育进行总结基础上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前3年学科知识教育之后的一次较集中的做人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金女大更加注重对四年级学生的教育,在重视人生指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职业指导、生活指导。1937年,四年级学生退修会讨论的问题有:对于社会需要的认识及怎样应付需要,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离校前应有的准备,怎样支配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怎样服务才可表现金陵的精神等。1939年退修会讨论的题目则有:如何善用大学第4年,职业选择,四年级如何服侍学校,友谊与婚姻的关系。1945年退修会讨论的总题目为:大学妇女对完美之生活应具之正确认识与准备。在总题目之下要求四年级同学从学习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宗教生活、职业等5个方面深入讨论。这种与学生个体生活及生活幸福问题紧密结合的讨论,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进而确立生活的态度,注重人格训练,同时,在讨论中学生也进一步学到了处世做人之道和修身之道,不仅对第4年的学习、生活,而且对未来的生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如1947年的退修会,在对“我们对今日之社会及政治应采取何种态度或如何积极辅助”,“对学校我们应如何帮忙”问题进行讨论后,同学们形成了以下共识:(1)对学校应体贴谅解,也要敢做敢为,如有不良的个人行动或团体风气,要以舆论制裁。(2)



对求学方面,要抓住每一个学习机会,以至诚的态度追求真理。同学们还得出无论是求知或做人,都要有“活”的个人表现。^①

(四) 体育保健活动

吴贻芳说:“金女大十分重视体育,而且把注意力放在普遍提高学生体质这一点上。一、二年级每周有4节体育课,三、四年级每周有两节体育课。体育是必修课,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上体育课纪律很严,每个学生必须按教师的要求去做,内容包括各种体育训练,如徒手操,各种田径、球类活动等。体弱的学生可以不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另设一班,让她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活动。体育教师不仅教体育技术,对学生站立、走路、坐的姿势都很注意。学生的凹胸凸腹、弯腰驼背等不正确姿势,都需要纠正。课余体育活动很多。每学期都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民间舞蹈表演等活动。每年冬季来临前要举行一次全校运动会,每年春季要举行一次室内外体育表演。”^② 吴贻芳非常重视女生的身体素质训练,不仅有体育课作为必修的保证,而且体育课持续到整个大学教育过程,这对提高女生的体质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金女大顾及女生的生理特点和学生之间的差异,采取适合的方式对女生进行身体素质训练。其中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贻芳特别注意女生的形体训练。本

^① 《1947级退修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5期。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11页。



书著者在写作之前,曾于2002年7月10日到南京拜访了1932年毕业于金女大的黄续汉老师。黄老师已是93岁高龄,但精神清爽,提到吴贻芳,仍是激动不已,反复讲:吴校长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形体训练,要求我们走路要抬头、挺胸、收腹。有时她在楼上看我们训练,见动作不对就下来亲自示范,要求很严。一次,一位低年级学生发现吴校长的双肩不平,向校长指出,吴校长问旁边的人确实否,旁人告诉吴校长有一点点儿,吴校长当场表示“那就改”。过了一段时间,吴校长问学生改好了没有。

金女大的体育活动不仅有室外活动,还有室内活动。1936年春季,金女大举行户内运动会,项目有基本体操、国术、韵律运动、太极剑、舞蹈等。需要指出的是,金女大丰富的体育运动,与创办体育专修科和后来增设体育简易科,培养女子体育教育人才的带动有很大的关系。体育运动专门人才和体育运动积极分子是带动全体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力量。各种校内体育比赛活动、体育游艺活动也使体育活动富有趣味,具有吸引力。当时,大多数女子被迫裹足或足不出户,金女大则重视女子体育,采取多种多样的运动方式,提高女子的身体素质,这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金女大学生参加城市或区域运动比赛,往往取得很好的名次,不仅提高了金女大的声誉,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着中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

金女大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注重保健。“每年秋季开学时都要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新生检查体格后建立健康档案,由学校保存,定期复查。检查后,对有轻度骨骼



问题如平足等的学生,教一套体操来矫正。经检查属于体弱的学生还另加营养伙食,经济困难者由学校补助。”^① 对于学生的医疗保健,学校有专职护士,医生则每周来校一次,治疗一般的病痛。学生在金女大享有较好的健康保健条件,“学校十分重视膳食管理,学生的饭菜有必需的营养,并且在冬季注意保温,不让学生吃冷饭冷菜。餐具清洁卫生。开水供应充分。”^② 这种对学生健康、保健、饮食营养的重视,除了因为金女大有较好的办学条件和学生家庭状况较好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吴贻芳重视生命,珍惜生命,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学生生命丰满。

(五) 文娱活动

金女大学生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不仅有歌咏会、音乐会、辩论会、游艺会,还有话剧表演等。有特色的还在于这些文娱活动都有教师参与,甚至吴贻芳亲自上阵,与学生一起演出。吴贻芳在谈到金女大的课余活动时说:“学生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班级间的球类比赛、歌咏会、音乐会、辩论会等。也曾为救灾举行各种义演。还有话剧表演,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师生的关系比较亲密。老师常常参加学生的课余活动,有时与学生赛球,她们穿着老式的运动衣,动作迟缓,常常成为学生手下败将;有时还参加文艺节目或话剧演出。1940年校庆演过一出表现学校开办经过的话剧。我演第一届学生,在台上走出房门时忘了走规

^{①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第111页。



定的门,经台旁教师提醒,才慌忙走向原来的地方,再从规定的门走出,观众捧腹大笑。”^① 金女大学生、教师共同组织的文娱活动就像吴贻芳所言,密切了师生关系,更重要的是使学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而具有吸引力。金女大的文娱活动有时还向社会开放,对周边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如1935年金女大举办音乐会和菊花展,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这种向社会的开放,发挥了学校的教化作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金女大在南京不仅以一所教会大学而存在,还以周边地区的一个文体活动中心而存在,尤其是对妇女、儿童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文娱活动除了娱乐休闲性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选择关于学校发展历史,激发学生爱校精神、爱国精神的内容编排成歌剧、舞蹈剧等。1939年,学生根据中国古代著名的木兰从军的故事,排练了花木兰从军的舞蹈剧,连续上演3天,取得很好的效果,激发了抗日报国的热情。

(六) 校外竞赛活动

在金女大历史上,学生参加校外竞赛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一是演讲。

从体育看,金女大参加了南京市、四川省及全国性综合类、单项类比赛活动。1934年,女子体育运动队代表南京市出席了全国运动会,参加的项目有篮球、排球、垒球、田径。1937年春季,女子划船队参加由中国青年服务社在南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京玄武湖组织的大中学校划船比赛,获得大学女子组冠军。1943年,24名学生组成代表队,参加四川省大中学生会运动会,获女子组田径冠军,跳高、铅球、垒球、200米、80米低栏、200米接力、400米接力项目均获得第一名,200米、80米低栏、垒球项目打破成都市记录,200米接力打破全国记录,同时获得女子篮球冠军。1947年,南京市在公园路体育场举行第8届全运会,参加单位143个,运动员2100余人。金女大获得了女子组60米、200米、80米栏、跳远、铅球、铁饼、标枪、400米接力项目的第一名。

吴贻芳重视各种演讲比赛。1934年12月,为组队赴上海参加华东大学生演讲比赛,特在校内组织演讲选拔赛,演讲内容包括“科学精神”、“教育与民族”、“青年与民族复兴”等,吴贻芳亲自出任评判员。经选拔,金女大推荐2名学生参加华东演讲比赛,获得团体第二,个人第一、第六的好成绩。1947年11月,全国国货展览会举办大中小学演讲比赛,大学组演讲题目为《国货展览与生产建国》,金女大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个人第一、第二名。

金女大学生参加校外竞赛活动并取得好成绩,这对学生、对学校都有着很好的影响。就学生方面讲,通过参加竞赛活动,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就学校方面讲,在各种竞赛中,通过学生优异的表现,展示了金女大的办学成绩与教学质量,宣传了金女大,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社会声誉。

(七) 慈善救济活动

金女大学生的活动有不少具有慈善救济性质,或者说有些活动就是以慈善救济为目的而展开的。通过开展这类



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心、同情心。1931年,中国大运河以东发生水灾,金女大师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向灾民提供帮助,捐献钱物,设立了一项专门的金陵基金,以救助灾民。这次慈善救济活动是吴贻芳动员发起的。朱学波在《吴贻芳》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一天晚上,吴贻芳心事沉重地来到饭厅。原来很热闹的饭厅,由于吴校长的到来,变得安静下来。……吴贻芳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看饭厅的学生,然后用缓慢的声调告诉大家苏北灾民的困苦和首都街头的情况。饭厅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渐渐地,有几个学生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最后,吴贻芳要大家立即讨论一下,怎样能给受灾难民一些帮助,现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饭厅里的气氛又热烈了起来,有人提出捐钱捐衣,有人提出上街为灾民服务,还有人建议今年冬天不生炉子,将烤火费节约下来,全部捐献给灾民。……这一年的冬天,金女大同学就把自己的棉衣全部穿上了身,有的同学冷得受不了,还披上了毯子,但谁也没有对捐出烤火费有半句怨言。”^① 吴贻芳发起救济灾民活动,是要求学生用实际行动来实践为社会服务的爱国思想,而不是空谈爱国。金女大学生在吴贻芳倡导下开展了许多慈善救济活动,如免费为妇女儿童服务等。1935年举办音乐会、菊花展、游艺会,为灾民募捐。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生勇敢地参与救治伤员工作。1937年11月,在武昌的师生与武昌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维持一座急救站,救护伤员。排练花木兰从军舞蹈剧后,专门进行义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67页。



演,将门票收入作为士兵家属的救济金,后又多次为抗战前线战士、灾民捐衣捐钱。吴贻芳在《金陵精神》一文中说,金女大参与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胞互相合作,对单位忠诚,对国家热爱之精神。^①

金女大的学生活动,除有自己的特色外,也受当时教育部提倡的社会活动影响。如1942年,教育部确定这一年为学生社会服务年,目的是使全国学生各本所学,各尽所长,为社会服务,舍己利人,修身达人。当时确定学生在以下10项工作中,至少选择办理2种:

1. 民众学校或补习学校、暑期学校;
2. 民众书报阅览;
3. 壁报或书报;
4. 通俗演讲;
5. 民众生活指导;
6. 民众俱乐部,包括音乐、戏剧、电影、播音等;
7. 各项有关文化之展览会;
8. 各项社会调查;
9. 协助推进地方自治及民众组织;
10. 协助办理地方公共卫生。

教育部还要求每月举办一种中心社会活动:1月为改良风俗运动,2月为推行新生活运动,3月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4月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5月为推进地

^①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第88页,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毕业论文,1996年。



方自治运动,6月为提倡公共卫生运动,7月为推进国民兵役运动,8月为扫除文盲运动,9月为提倡国民体育运动,10月为推进国防科学运动,11月为扩大慰劳与救助运动或文化建设、社会教育扩大运动,12月为扩大劳动服务运动。金女大学生在吴贻芳支持下,积极参与上述各项活动,并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生实际,开展了一些具有创意性的活动,做出了贡献。

金女大学生活动适合女子特点,关注女子命运。无论是竞赛、慈善救济、文娱、体育,还是姊妹班等,均考虑到女子特点,而退修会等则关注女子人生与命运的思考。1935年,金女大学生总结了当时中国女子面临的几条出路:一是回家专管油盐杂务,不问社会,这像猪。一是不肯吃苦,没有确实的学问、经验,只好摆样做花瓶,这像哈巴狗。一是很能做事,但不运用思想,不看工作于社会有益与否,一味傻干,这像牛。一是勤苦地寻觅知识,锻炼人格,睁开眼,看清社会弱点,切切实实去干,这是真正的人。吴贻芳正是倡导和培育女子要做真正的人,采取各种措施,尤其是通过多种活动来改变中国女子的怯懦、胆小,多愁善感,局限于自我与家庭的性格,让她们在活动中展示自己,培养胆量,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关注社会与民族的命运,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作为的人,能够与男子一样享有真正平等权利的人。金女大1946级学生谱写的“级歌”反映了她们对人生的热爱与对真理的追求精神:“看我们这1946级,金陵大家庭的儿女们,我们信仰真理,潜心探讨,我们渴望光明,我们热爱的是人生,从实践中去体认,青年光阴难再得,同努力,



发扬我级训。”^①

还要指出的是,金女大学生养成了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热爱集体活动的精神。“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常常能获得顾大局、识大体、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教育。”^② 吴贻芳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厨房库房失火。库房就在学生宿舍晒台底下,如果火势蔓延,势必烧毁学生宿舍。全体师生奋力救火,立即组织起一条传水线,用各种盆桶传水灭火,终于将火扑灭。事后发现,没有一个学生回宿舍抢救个人的衣物。

四、学生管理

金女大组织、支持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与吴贻芳重视学生活动,尤其是从制度上对学生活动进行管理,使学生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组织化有密切关系。

(一) 关于操行评定标准

金女大非常重视学生的操行,除了在课程考试成绩评定中重视平日成绩外,还就学生平时的操行表现制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恪守校规,“养成健全人格及优良学风”^③。这些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① 《级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134期。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③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19页,1940年9月印。



学生不得有破坏学校秩序或妨碍校誉及其他不道德之言语行为；学生不自敦品励行，无论校章有无规定，均须就情节轻重，分别加以惩戒，分导师训诫、训导处警告、训导会议会询、开除学籍 4 种，并由本校通知该生家长或保证人。学生在寝室、教室、实验室内有违反规则者，其负责教职员得加以训诫，或交由训导处执行；学生所受惩罚，除由训导处通知有关各处外，并将事实存案备查。遇情节重大时，函知该生家长及保证人；凡曾受严重惩罚的学生，不得领取学校任何奖学金，毕业时，导师不得给以训导证书。学生操行成绩于每学期终了时，由各生导师及教师分别评定，交训导处登记，由训导会议通过后，通知教务处，载明成绩簿，呈报教育部。^①

为了操行评定公正，金女大确定 10 条标准，要求教师从 10 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查评定。

1. 举止仪容；
2. 银钱使用；
3. 消遣方法；
4. 言行诚实；
5. 工作认真不懈；
6. 爱护公共用物，尊重他人利益；
7. 慎言择行；
8. 合作精神；
9. 任事负责可靠；

^①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 19～21 页，1940 年 9 月印。



10. 富于同情,乐助他人。

上述评价学生操行的 10 个方面的内容,涉及为人处事、与他人关系、对工作态度等方面,其中考查学生如何支配金钱,是否尊重他人利益,能否与人合作,能否健康地消遣休闲等,为学生指明了做人的方向,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关于荣誉奖励规定

在吴贻芳主持校政期间,制定了对于表现优异学生的奖励规定,这种奖励规定直接与学生的平时表现挂钩。在 1940 年颁布的《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中,规定了“荣誉绩点制”,主要内容有:1. 荣誉绩点之给予,根据两种原则:职位责任之轻重,工作时间之多少。2. 学生课外活动,属于服务性质者,每学期每星期 1 小时得 4 分;非服务性质者,每星期 1 小时得 2 分。3. 凡课外活动取得学分者,不给予绩点。4. 凡课外活动,必须达到相当标准,始给绩点。合格与否,由各会各组负责人评定,厚生团高级职员,则由该团监察委员会评定。5. 任何课外组织,每月开会不过 1 次者,仅有职员可取绩点。将课外活动与学习成绩评定中的“绩点”挂钩,不仅对促进学生参与课外活动有好处,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绩点制,考察课外活动的质量,明确课外活动组织的责任,使课外活动有人负责,有责可查,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为课外活动的持续性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金女大奖励学生的规定根据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其中重要的是将奖励与惩罚直接挂钩,做到有奖有罚。1948 年制定的奖惩条例,主要内容有嘉奖、除名、记



过3个方面。对以下4个方面给予嘉奖:热心公益乐于服务者,代表学校有光校誉者,操行总均列入甲上者,能应急应变消除大众危险者。对有以下3个方面行为的,则给予除名的惩罚:一是偷窃、欺骗有确据者,二是违反校规,严戒不改者,三是行为不端者。对于以下两种情况则给予记过处分:违反校规者,按情节轻重,斟酌警告或记大小过;操行成绩评定时,有大过一次者减低1级,小过减低1/3级。^①这种有奖有罚的政策,符合管理的基本原则,对优秀者是激励,对表现欠缺者是警戒,有助于改正不足,继续前进。

(三) 关于参加社团及课外活动规则

吴贻芳支持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与课外活动,但对这种参与有一定的限制。1940年制定的《学生参加团体规则》中,把学生参加团体活动分为校外活动与校内活动两种,并给予相应的规定:凡学生参加校内团体,则该团负责人当报告训导处,并详细填写团体登记表,经训导会议核准。凡学生参加校外团体,无论为团体参加或个人参加,均须到训导处报告,由训导会议核准。学生团体集会,无论为常会或临时会议,均须先至训导处登记核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老百姓期盼甚久的和平遭到破坏,国统区的学生爆发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这从政治上讲是进步,但就学校而言,对教学秩序有较大的冲击,加上国民党的施压,一些学校包括教会学

^① 《奖惩条例》,《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16~17页,1948年。



校,采取了对学生活动加以限制的政策。金女大也不例外。1948年专门制定《课外活动规则》^①,就学生课外活动的原则,课外活动及各组织的登记办法,课外活动借用学校场所或用具,刊物与壁报,学生自治组织的活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确定的课外活动原则为:1. 有组织之课外活动,原为利用课余之暇,启发才能,陶冶兴趣,训练互助、合作,服务人群之责任心,以培养优良健全之人格。2. 凡学生各种课外活动之组织,因属学校范围内,故均须先得校方核准始可成立。凡涉及校方之行政议案,亦必经校方之认可。不合校规之任何组织,校方得随时解散之。3. 本校辅导处负责辅导学生个人或团体。凡学生个人或团体向学校有所申请时,应即提交辅导处代为转达。4. 凡学生团体组织或临时活动,得由本校辅导处之课外活动组主任及各宿舍生活指导,对各该团体之计划与组织,予以协助及指导。该《规则》还规定学校内的社团组织,组织或参加校外活动,还要经过社团多数会员讨论通过,并向辅导处申请,经核准后方可。学校社团组织与个人邀请校外团体或个人来校参加活动,也要经过辅导处与校务委员会许可。显然,这些规定是要对学生参加校外活动进行控制,防止学生参加当时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但事实的发展,不完全由一校之规定所转移,金女大学生在国民党日益腐朽的统治面前不断觉醒,一部分学生仍然勇敢地冲破学校的限制,加入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学生运动中。当然,这时的吴贻芳处于矛盾

^① 《课外活动规则》,《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1948年。



之中,好在她与时俱进,对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和“违规”行为没有进行过多的批评与限制。

(四) 关于宿舍及生活管理规则

宿舍是学生住宿、交流的重要场所,学生在宿舍里能否得到安静的休息,能否处理好与室友的关系,对其学习、成长都有着重要影响。吴贻芳从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出发,关注学生的宿舍生活,除了采用姊妹班制提高高年级学生在宿舍管理中的责任意识,强化对低年级或新生的宿舍管理外,同时制定了较详细的《宿舍规则》^①对学生进行规范。这些规则包括以下内容:

1. 本校正式生,缴纳宿费后,得在宿舍住宿;但已婚学生,非具特别理由,经本校核准者,不得寄宿。

2. 宿位每学年由本校分派一次,派好后不得任意更动。

3. 宿舍内须注意整洁,并不得高声喧哗,以免妨碍他人自修。

4. 在规定熄灯之后,不得私燃油灯或洋烛,以防意外。

5. 学生家属在成都者,可于星期六或其他例假回家住宿。但须于学期开始时,由家长正式来函说明。其有亲戚在成都者,亦得照此办理。

^① 《宿舍规则》,《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手册》,第22~25页,1940年。



6. 学生请假,须至训导处填写请假单,回校时至训导处销假。

7. 学生不得留客住宿。倘有亲友路过成都,一时无宿处者,遇学校宿位有空时,经训导处之允许,可留住数天。

8. 宿舍及饭厅内用具,应加爱护,不得擅自移动。倘因集会需借用者,应向训导处陈准,再向舍务员领取;倘有损坏,须照价赔偿。

9. 学生所带钱银,应存入银行或本校会计处。贵重饰品,不准携带。倘有遗失或被窃之事,本校只得酌量情形代为侦查。行李箱篋等等,须置三楼行李房内。

10. 学生用膳,须在规定时间内,过时不得补开。

11. 留客用膳,须于事前得舍务员之许可,并随缴膳费。

12. 学生不得走入厨房或使用工人。如有熟食需煮熟者或需购买物件,应交舍务员代办。

13. 茶炉上不得烹调食物。

14. 沐浴期间,自午后1时至8时,熨衣时间自午后1时至6时。星期日不得沐浴、熨衣。

15. 宿舍内设有病房,学生生病时得由医生之许可迁入暂住。

16. 学生团体如欲借宿舍内开会或张贴布告,均须先得训导处之许可。





17. 学生出校,除本规则第5条规定外,最迟应于下午10时前回校。

18. 学生会客,须在指定会客室(女客可在宿舍交谈室),寝室内不得会客或集会。

19. 会客时间,星期一至六,为下午1时至6时,星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8时。如有重要事故,得于无课时会客。

20. 会客人应先于门房签名,及签定所会客人之姓名,然后由门房通知。

21. 空袭时,学生无论避于田野或地下室或防空洞,均须邀本校教职员或同学2~3人同行。警报解除后,至多半小时内须返校内。

据校友回忆,金女大不仅《宿舍规则》明确,而且执行严格,有时吴贻芳亲自检查学生就寝情况。由于管理严格引起一些学生不满。尤其是在南京期间,金陵大学的学生想到金女大来找女生交谊不方便,反映到吴贻芳那里,吴贻芳便指示在女生宿舍里专门开设一个会客室,取名为“交谊室”,允许女生在此与来访男宾见面述谈。这样既解决了女生将男宾带进寝室会面影响他人,也使会客变得相对宽松和愉快。

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复校之后,重新对《宿舍规则》进行修改,就住宿、请假、会客等作出了规定,更为详细具体。对寝室、交谊室、饭厅、沐浴时间、洗衣间及厕所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关于寝室的要求有13条^①,具体如

^① 《宿舍规则》,《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手册》,第9~10页,1948年。



下:

1. 宿位派定后,不得任意更动。
2. 宿位上下铺,可于期中更换。
3. 同学等不得留客(非本宿舍同学在内)住宿。
4. 住室须每日9时前各自打扫清洁,字纸簍须放在室内。
5. 废物、污水不可由窗口抛掷、倾倒。
6. 各宿舍安静时间,同学等务须遵守,俾人人皆有充分之休息与睡眠。
7. 除每日下午5时到7时外,其他时间不得玩弄乐器。
8. 每晚熄灯后不得谈笑,以免扰及他人。
9. 不得在室内生火,烹煮食物或取暖,以防意外。
10. 室内电灯于不用时随时关闭,以免浪费。
11. 于冬令需要时,晨6时后可开电灯。
12. 寝室内除原有电灯外,不得加置任何其他电器设备。
13. 同学生病时,房长须立刻报告宿舍生活指导与护士,经诊断后可迁入医务室内住。

吴贻芳重视学生宿舍及其生活方面的管理,对于学生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学会协调关系,涵养生活能力都有着很好的作用。



金女大还很重视那些寒暑假期间留校的学生,专门制定《寒暑假住校简则》,对学生在寒暑假内的学习、生活、活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金女大还特别注意安全及防火,宿舍置有灭火器材等,定期对电线进行检查,并成立了有学生参加的安全组。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学生手册》明示《送信办法》、《缮印文件办法》、《购置用品办法》、《医务室就诊须知》等。经过严格又不失开明的管理,金女大的学生养成了很好的行为规范。吴贻芳说,校园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有水池花圃,景色如画,“学生从不攀折花木,毁坏草坪或乱抛果皮纸屑。图书馆十分安静,学生一进图书馆就自觉把动作放轻,也很少在里面说话,都埋头看书、记笔记、写报告。书架就在座位四周,没有人偷窃、撕毁、污损图书。看完的书都交给管理员,从不自己随意插入书架。”^①

吴贻芳还注意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和沟通,重视与家长的 合作。家长如果认同金女大的办学宗旨与有关管理办法,签署协议之后,学生则可入校就读,否则不能。如 1948 年《学生手册》向学生声明,入校之前已与学生家长签署同意学校有关规定的协议,因此,学校与学生家长都要遵照执行。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2 页。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第

七

章

办学经费与学校建设

一、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财政支持,学校发展的快慢与获得经费的多少有直接关系。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增招学生,招聘师资,校长们都把筹集资金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吴贻芳也不例外,花了许多精力,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金陵女子大学从1915年创办至1951年停办,36年中办学资金源源不断,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算是较富裕的。从以下历年财务决算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办学第1年:11 428.56元(国币);



第5年: 38 706.47 元(国币);

第10年: 79 122.18 元(国币);

第15年: 129 169.72 元(国币);

第20年: 160 676.17 元(国币);

第25年: 272 739.00 元(国币)(伙食未记入)。^①

校园面积随着事业发展逐渐扩大,1916年在南京陶谷购地27英亩(约164亩),1928年扩大到40英亩(约243亩)^②;1936年在原校区西北面购地50亩,1948年在原校区的南边、西南边买下随园和一座庙及一块墓地。^③固定资产也逐年增加。1916年固定资产为3930元,流动资金14 427元。1923年花了30万美元修建永久校舍,家具、科研仪器、音乐设备、图书经费逐年增加。

家具、仪器、图书等价值表

年 度	家 具	科研仪器	音乐设备	图书资料
1927—1928 年	1.3 万美元	1.2 万美元	0.2 万美元	0.8 万美元(1.25 万卷书)
1930—1931 年	1.4 万美元	1.7 万美元	0.25 万美元	1.1 万美元(1.8 万卷书)
1932—1933 年	1.423 万美元	2.15 万美元	0.79 万美元	1.42 万美元(2.1 万卷书)

资料来源:金女大1927—1928年度,1930—1931年度,1932—1933年度公告。

年度办学经费结算常常有点儿结余,出现赤字的情况

① 《金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77期。

② 1927—1928年金女大公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③ 1948年吴贻芳校长年度报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较少。

1927—1928 学年度,余额为 10 563 元;

1928—1929 学年度,余额为 20 664 元;

1929—1930 学年度,余额为 24 609 元;

1930—1931 学年度,余额为 29 582 元;

1934—1935 学年度,余额为 5907 元。^①

1932—1934 年因修建图书馆、音乐楼,楼内设备,图书购置等,动用了往年结余款,所以,1934—1935 年度余额很小。

抗战期间,金女大迁至成都华西坝办学,在华西大学借地自建了宿舍、音乐室、健身房,办学经费也没发生问题。直至 1950 年 12 月美国政府冻结美元汇入中国时,金女大的结余经费仍可以维持一学期的日常开支。

作为教会私立学校,如何达到经费结余呢?事实上,在金女大办学 36 年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其筹集资金的途径、方式,可以说是多渠道、多样化的。

金女大的办学经费来源大致有 4 个方面:

(一) 众多的基督教差会提供创办费和日常开支费用

20 世纪初,基督教陆续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 13 所。这些大学有的由个别教会管辖,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福建的华南女子大学;也有几个教会联合管辖的,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

^① 金女大上述几年的年度财政报告,见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然而,从20世纪初创办直至1951年结束的教会女子大学只有两所,即华南女子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由美国美以美会于1907年创办,只获得1.5万美元开办费。金陵女子大学由美国北长老会,南、北卫理公会,北浸礼会,基督会等5个差会联合创办,1914年各自提供1万美元用于校园建筑及图书、设备购置,600美元用于日常开支,300美元用于教师薪金。

1916年,金女大花了1.3万美元,在金陵大学东南面的宁海路购置27英亩(约164亩)土地,筹建永久性校舍。1923年迁入后,办学有了一定规模,在校学生达133人,教职员工28人,毕业生的深造率甚高。1919—1922年4届毕业生33人中,赴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达20人。这一办学成就吸引了其他基督教差会和社会团体对金女大的兴趣,纷纷加入资助行列。1924年,美国圣公会、复初会,英国伦敦会等差会,中华医学基金会,美国史密斯学院基督教工作及女校友协会,先后加入金女大校董会,这样,资助的基督教差会和社会团体达到10个。这些资助团体随着学校发展而提高拨款额度。1916年,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成立“支援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会”,每年捐赠1000美元,5年后上升为2500美元,抗战期间上升为4000美元。

1930年,金女大注册学生达166人。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还有澳门、爪哇籍者,教职工达43人。由此,基督教差会增加了拨款。1928—1929年,8家联合教会拨款28151美元,占年收入的25%;1929—1930年,8家联合教会



拨款37 946美元,占年收入的29%。其中,美国长老会拨款数由最初的600美元上升到2500美元。^①

1930年金女大在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后,联合教会拨款有所减少,但仍占年收入的20%以上。

1930—1935年拨款清单

年 度	联合教会数	拨款数(美元)	占年收入%
1930—1931年	7	26 928	24
1931—1932年	7	34 739	21
1932—1933年	8	32 554	24
1934—1935年	8	29 710	22

资料来源:金女大1930年以后的报告。

联合教会对一些大型的庆典活动也有捐助,如1940年金女大25周年纪念,美国联合教会发起增加基金运动,为金女大筹集3万美元。

英国基督教组织早期捐赠的数额虽不如美国,但40年代大有进步。如1947年,英国基督教组织捐赠300英镑以购置书籍和生物学设备,275英镑用于补充学生营养,140英镑用于购置仪器设备。^②

(二) 校长积极向海内外募捐,获得大量资金

1919年7月,德本康夫人利用回美国休假的时间,积极为永久校舍筹集经费,奔走近1年半时间,直至1921年2月回校。回校时带回60万美元,其中1/3来自创办金女大

^{①②} 《金女大1948年报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的联合教会,1/3 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 1/3 来自各界捐赠。在各界捐赠款中,有金女大的姐妹学校史密斯学院 5 万美元和 2 位个人 3.5 万美元。德本康夫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到美国许多城市发表讲话,介绍金女大办学成绩及办学困难,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的成功可以有力地证明其自身的价值,促使中国上等阶层皈依基督教,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老百姓。^①为此,德本康夫人获得 10 万美元的捐赠。当时美元对中国银元之比为 1:2.13。金女大用这笔钱在南京宁海路建成了一座“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吴贻芳出任校长第 2 年,即 1929 年,董事会会议决定:委托吴贻芳再购置 5 块土地,用以扩大办学空间。当时,校财政仅有 20 664 美元余额,将发展金女大作为己任的吴贻芳深感筹集资金责任之重大。1933 年,因美国经济问题,传教会要削减拨款,金女大资金问题更为突出。同年 7 月,吴贻芳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为期 1 周的国际妇女会议和出席班夫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吴贻芳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介绍金女大。会后赴加拿大 7 个城市的妇女俱乐部演讲,并会见教会负责人及维多利亚大学校长,谈金女大的发展。9~11 月间,又赴美参加美国大学妇女会议协会、牧师圆桌会议、教会工作者俱乐部、职业和商业妇女俱乐部、教师会、妇女会等,介绍金女大基督教服务精神,学生活动情况,毕业生供小于求的状况,还拜访了德本康夫人的朋友及基督教教

^①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77 页。



育协会。这段时间里,她访问了美国 16 个州的 32 个城市,举行了 266 次大小会议,发表演讲 206 次。^① 海外人士由此了解金女大,对金女大产生兴趣,愿意慷慨解囊。

教会大学在抗战中损失严重,战后又物价高涨,复校工作十分困难。1947 年 10 月,基督教组织成立中国 13 所教会大学联合募捐会,各校推荐吴贻芳为主席,经过半年时间,共募国币 93 亿元,金女大分得 7.6 亿元。

1930 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后,吴贻芳又积极争取政府各级机构的专项资金和个人投资,扩大了财政来源。

吴贻芳与国民政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关系密切。

1933 年,宋氏三姐妹为金女大附中捐赠一座供 70 名学生住宿的宿舍楼。

1934 年,教育部拨款 7000 元。^②

1935 年,教育部为私立和教会大学拨 72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科学设备、图书、专门讲座。金女大申请政府拨款 29 600 元,实际获得科学设备、图书经费 8000 元,中文讲座费 4000 元。^③

1936 年,获教育部补助费 1.2 万元,用于 3 个讲座教授工资。

1938 年,抗战军兴,迁至成都华西坝办学。

① 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 1933—1934 年度报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②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02 页。

③ 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 1935 年报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在华西大借地自建宿舍、音乐室、健身房、男教员宿舍。教育部补助 5000 元,四川省政府补助 2.5 万元。

1941 年,教育部补助 1.8 万元。

1943 年,教育部补助 9 万元,四川省教育厅补助家政系 3000 元。同时,教育部向 10 年教龄以上专任教员颁发奖金 1.8 万元。

1944 年,教育部向教员颁发奖金 1.35 万元。

1946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张群捐送一笔款子,用于重建学校。^①

1947 年,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拨 60 亿元,用于全国教会大学复校建设,金女大获得复校经费。

1947 年,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救济总会拨款 2.2 亿元,用于金女大修理校园主干道、四周竹篱笆等。^②

(三) 学生缴费是财政的重要来源

金女大的学杂费、住宿费、膳食费一直是较高的。这种费用标准只有上层社会家庭才能承受得起。1914 年,董事会确定学费每年 100 美元,相当于大学教师一年工资的 1/3。

1925—1926 年度报告显示,学费收入支付学校教育费用的 25%,杂费收入支付学校日常开支的 30%。1930 年在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后,按教育部规定收费。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6 页。

^② 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 1948 年报告》,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1940—1948 年学生缴纳费用情况

单位:元

年份	学费	食宿 杂费	医疗 费	电费	实验 费	体育 费	图书 费	实 习	团 费
1940	30	27 + 5 + 5	1		5	1	1		
1942	60	450 + 10 + 15	2	10		1	2		
1943	100	800 + 10 + 30	5	30	6—10	2	3	15	
1944 上半年	150	2000 + 10 + 70	15	50		6	10		
1944 下半年	500	7500 + 50 + 600	50	400		20	50		50
1945	3000	28 000 + 300 + 3000	300	1200		100	300		400
1948	195 万	300 万 + 53 万 + 53 万	10 万	30 万		10 万	17 万		2 万

资料来源:《金女大大事记》。

由于向政府立案注册,联合教会拨款所占比例减小,因而学生缴费所占比例逐渐增大。抗战前两年,学生缴费比例甚至占全年收入的 35% 左右。

学生四项缴费统计

单位:元

年度	四项缴费 (学费、杂费、住宿、膳食)	占年收入 %
1928—1929	27 265	26
1929—1930	31 615	24
1930—1931	31 550	28
1931—1932	38 500	26



续上表

年度	四项缴费 (学费、杂费、住宿、膳食)	占年收入 %
1932—1933	40 769	29
1934—1935	44 070	36
1936—1937	58 600	34

资料来源：金女大财政报告。

抗战期间，生活水平下降。迁至成都办学时学生缴费比例只占学校年收入的 14 %。^①

(四) 美国史密斯学院与金女大校友会的捐赠

1. 美国史密斯学院的支持

金陵女子大学开学招生的第 2 年，美国史密斯学院就与金女大结为姐妹学校。当年，史密斯学院的学生及同学会捐献款给金女大，以后连续 5 年，每年捐 1000 美元。1922 年，捐 5 万美元用于建造金女大的社会与体育大楼，即今天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 100 号楼。1923 年，史密斯学院成立了“支援金女大校友会”，每年捐款。1928—1929 年，捐 11 034 美元；1929—1930 年，捐 8223 美元。金女大在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后，捐款少了一些，1931—1935 年，每年汇款 4200 美元。

1924 年，史密斯学院基督教协会开始给金女大捐款。如 1929—1930 年捐 10 962 美元，1932—1935 年，每年捐 8400 美元。^②

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 77 期，第 2 页。

② 金女大 1929—1930，1932—1935 年度财政报告，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史密斯学院支持金女大的发展,除了日常的捐赠外,凡是遇到金女大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或者重大建设项目,或者遭到战争破坏时,史密斯学院的校方、校友会、基督教协会都会给金女大提供支持和帮助。

2. 金女大校友会的捐赠

姐妹学校所做的一切,成了金女大的榜样。金女大办学原则是培养学生奉献他人、自我牺牲的精神。1935年,吴贻芳在报告中写道:“金女大最大的财富是在学生中培养真正服务的精神”,而且要求将此精神在中国发扬光大。金女大学生虽来自社会各阶层,但学校提倡精神生活的富足,认为衣着和个人消费的奢华在任何国家的学生社团中都是不适宜的。^①

金女大基督教教育所提倡的奉献牺牲、至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不仅校长、教职员身体力行,也成为金女大毕业生的良好素质。她们毕业后,仍十分关注母校的事业,母校有喜事,母校有困难,她们都要捐资,或以示祝贺,或专项资助,为学校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5年金女大10周年校庆,虽只有6届毕业生50多人,却为母校捐献了1000美元的礼物。

1929年,金女大校友会提出要为母校发展承担一些财政责任,成立捐赠基金会,每年捐赠几百美元。1929年捐赠400美元,1935年前每年捐赠500美元。

^① 《1927—1928年度金女大公告》,第58页,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1936年,校友严氏四姐妹得知金女大学生增多,在校生已达259人,需要办医院的消息后,将其父亲的遗产拨出一部分,在校内建立了一所小型医院。

1937年4月,校友会总干事赴华中地区会见校友,报告母校发展情况,校友中有187人捐资,共捐款16400余元。^①

1944年国内物价飞涨,办学开支增大。校友不仅提供大量捐款,还纷纷设立奖学金。国文系主任刘麟先生捐1万元,孔宝定捐3000元,张际英捐2万元,生物系毕业生吴贻芳、胡秀英等6人捐1.8万元,邓肯捐1万元,沈次量先生捐10万元。

金女大建校30周年时,全校师生募捐789万余元,各地校友会捐赠539万余元。1946年,金女大第2届毕业生赫映青一人捐赠100万元,在校学生捐赠70万元,苏州惠灵女中校长王梅娥捐赠20万元。

1946年抗战胜利后,金女大由成都华西坝迁回南京办学,而南京校园内除了校舍房屋外,科研设备、图书、家具被洗劫一空。各地校友会通过义演、义卖,积极为母校筹募复校基金。如广州校友会举办独唱音乐会,将全部净得200万元汇到母校。

1947年10月底,金女大校友会筹募基金达79亿多元。金女大校友、金女大董事会会长徐亦蓁女士募集4亿多元。

(3) 联合办学的专项投入

^① 《金女大大事记》,金女大校友会,1991年印制。



金女大努力开展联合办学,以争取专项投资。1925年金女大建校10周年之际,基督教女青年会将在上海创办的体育师范学校迁入南京,并入金女大,除了体育器械外,还提供5年体育教育经费,每年5000美元,另支付1名体育教师的工资。同时,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美国的机构积极与关心妇女体育教育的人士联系,为金女大体育系提供赞助。^①

1924年,金女大建立医预科,与北平协和医院(英美教会于1906年创办)联合培养医生,中华医学会不定期拨款,购置生物实验仪器与制品。

二、办学经费使用与管理

(一) 办学经费的使用

金陵女子大学办学经费支出分5类,即学校行政管理经费,教学经费,食宿经费,维护经费和特殊项目经费。

学校行政管理经费包括行政管理人员薪水,行政管理办公经费。行政管理人员,指校长、秘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管理人员、注册员、总务长、会计、出纳员、舍监、校医、护士等10多个人。行政管理经费,包括入学考试、毕业典礼、办公文具、邮资、电报、印刷、接待来宾、体检、医疗护理、差旅费等。学校行政管理经费占学校全年总支出的20%左

^① 1929年10月金女大董事会记录,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右。

教学经费包括教学人员薪水,各学科教务费用,占全年总开支的 50% 以上。其中,教师薪水占全年总支出的 45% 左右。

食宿经费包括食品、厨房燃料、宿舍供热、水电、宿舍供应、厨师工资等。这部分经费占全年总支出的 12% 左右。

维护费用包括场地维护、大楼保养、供热、供水及小发电厂、煤气厂维护,看门人、工友的工资等。这部分经费占全年总支出的 10% 左右。

特殊经费包括突发事件处理费用、建设费用等,占全年总支出的 3% 左右。

1928—1929 学年从各方面获得经费总数为 106 810.28 元。

1928—1929 学年财务支出明细账 单位:元

EXPENDITURES(支出经费):

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

Salaries(薪水):

President(校长)—Y. F. Wu	1728.00
Secretaries(秘书)	1536.33
Librarian(图书馆管理员)	600.00
Library assistants(图书助理管员)	624.91
Registrar(注册主管)—K. C. Tsu	807.00
Treasurer(会计)—E. M. Priest	600.00
Business Office(总务)—W. V. Chen	848.00
Typists(打字员)	61.75
Student aid(学生帮工)	160.75



Dormitory director(舍监)—Mrs. Tseng	833.26
College physician(校医)—M. G. Smythe	300.00
Nurse(护士)—M. H. Wu	506.00
Travel(差旅)—U. S. A.	1104.55
Furlough salary(休假薪水)—M. C. Thurston	1807.22
Σ (总计)11 517.17	

Expenses(行政经费):

Commencement and Founders Day(毕业典礼和校庆日)	674.11
Education fees(教育费)	400.00
Entrance tests(入学考试)	402.34
General office expense(校办公经费)	566.94
Hospitality(招待费)	101.24
Medical attendance(医疗体检)	2219.52
New York office(纽约办公室)	505.78
Postage and stationery(邮资文具)	400.60
Publicity and printing(宣传印刷)	561.87
Telegrams and cables(电信电报).....	190.35
Travel-Board of Control(差旅管委会)	1847.45
Faculty(全体教师)	143.80
President(校长)	176.69
Σ (总计)7190.69	

Total Administration(行政办公总费)	Σ (总计)18 707.86
------------------------------------	------------------------

Instruction(教学经费):



Salaries(教师薪水):

Biology Department(生物系)	4956.00
Chemistry Dept(化学系)	2228.00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Dept(教育与心理学系)	3458.76
Chinese Dept(中文系)	3370.00
English Dept(英文系)	4320.00
History Dept(历史系)	1666.00
Music Dept(音乐系)	2839.68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Dept(数理系)	2674.96
Physical Education Dept(体育系)	4800.50
Religion Dept(宗教系)	2248.00
Sociology Dept(社会学系)	2827.86
Language study for instructors(教师语言培训)	252.00
Travel(差旅)—U. S. A.	4769.35

Σ(总计)40 411.11

Expenses(教务费用):

Biology(生物学)	804.94
Chemistry(化学)	819.44
Chemistry-Gas plant(化学—煤气工场)	168.03
Chinese(中文)	300.09
Practice School(实习学校)	1499.03
English(英语)	88.17
History(历史)	4.82
Lectures(讲座)	42.61



Library(图书馆)	1192.27
Music(音乐)	685.87
Physical Education(体育)	364.30
Physics(物理学)	200.31
Religion(宗教学)	24.37
Sociology(社会学)	12.51
Σ (总计)6156.76	
Total Instruction(教学总费用)	Σ (总计)46 567.87
Maintenance(维护费):	
Care of grounds(场地维护)	515.69
School heat(学校供热)	1207.64
Janitor's supplies(门房用品)	146.46
Light and water(水电)	948.32
Servants' wages(工友工资)	1442.53
Upkeep of buildings(校舍维修费)	4561.07
Rent(租金)	10.00
Total Maintenance(维护总费用)	Σ (总计)8831.71
Boarding Department(食宿费用):	
Food and wages(伙食和工资)	5320.74
Heat-dormitories(宿舍供暖)	1165.00
House supplies(房屋用品)	339.26
Kitchen fuel(厨房燃料)	1108.35
Light and water(水电)	948.31
Wages(工资)	1032.88





Total Boarding Department(食宿总费用)	Σ(总计)9914.54
Special Items(特殊项目):	
Adjustment of exchange on loan returned(还贷兑换调整)	1344.00
Deficit on faculty house account(教职工住房账户赤字) ...	279.32
Bookroom—account of fire loss(记账室—失火损失账目)...	500.00
	Σ(总计)2123.32
Total Expenditures(总支出)	86 145.50
Balance, June 30, 1929(结余)	20 664.98
	Σ(总计)106 810.28 ^①

上述经费支出有 4 类涉及员工工资, 约占办学经费的 50~60%。显然, 教会的投资及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可以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

20 多年后, 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事业已取得较大发展, 获得的经费亦有较大幅度增长, 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力度也加大了。例如 1932—1933 学年中, 金女大仅购置图书、杂志花费约 5369 元, 教学仪器设备花费约 2908 元, 建煤气厂等基本建设花费 4500 元, 学校教职员工工资也相应得到提高, 还开始支付退休教职员工的津贴。

^① 《金女大 1929 年 10 月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有关财务报告中的收支账目》, 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从 1932—1933 学年财务收支明细账可以看出学校办学经费使用的分类与变化。1932—1933 学年,得到教会拨款 32 554.33 元,美国史密斯学院、金女大校友会等各种捐款为 47 332.31 元,学生交纳学杂费等为 40 769.50 元,加之上一学年度剩余 17 780.91 元,总计为 138 437.05 元,比 1928—1929 学年的财政收入高出许多。这时,学校经费支出也有了变化。

1932—1933 学年办学经费支出明细账目 单位:元

Expenditures(支出经费):

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

Salaries(薪水):

President(校长) 2400.00

Adviser(顾问) 907.20

Secretaries(秘书) 1772.00

Librarians(图书馆管理员) 2660.00

Library assistants(图书助理管员) 583.71

Registrar's office(注册室) 2250.00

Treasurer's office(会计室) 1830.00

Business office(总务办) 1190.00

Typists(打字员) 101.50

Students aid(学生帮工) 102.14

Physician and nurse(医护) 1200.00

Dormitory director(舍监) 1080.00

Travel(差旅)—U. S. A. 562.27

Σ(总计)16 638.82



Expenses(行政经费):

Commencement and Founders Day(毕业典礼)	196.68
Diplomas(毕业证书和校庆日)	362.29
Education fees(教育费)	400.00
Contributions(捐款)	95.00
Entrance tests(入学考试)	480.95
General office expense(办公费)	871.70
Special expense-President(校长专项支出)	500.00
Hospitality(招待)	125.57
Medical attendance(医疗检查)	1952.27
Medical supplies(医疗设备)	726.80
New York office expense(纽约办公室经费)	1157.62
Postage and stationery(邮资文具)	718.40
Telegrams and cables(电信电报)	100.09
Publicity and printing(宣传印刷)	645.85
Travel-Board of Directors(差旅—董事会)	338.50
President(校长)	300.00
Faculty(全体教师)	183.55

Σ(总计)9155.27

Total Administration(行政办公总费)	
.....	Σ(总计)25 794.09

Instruction(教学经费):

Salaries of instructors(教师薪水):

Biology(生物学)	5616.40
Chemistry(化学)	5449.39



Chinese(中文)	4400.00
Economics(经济学)	1620.00
Education(教育学)	1728.00
Education-Practice School(教育学—实习学校) ...	3791.33
English(英语)	6812.19
Geography(地理学)	1560.00
History(历史)	3460.00
Hygiene(卫生学)	1680.00
Household Arts(居家艺术)	150.00
Modern languages(现代语言)	1200.00
Music(音乐)	6888.99
Physical Education(体育)	6964.49
Physics and Mathematics(物理和数学)	5040.00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	1900.00
Psychology(心理学)	1020.00
Sociology(社会学)	2807.40

Σ(总计)65 496.39

Language study(语言培训)	492.00
Travel(差旅)—U.S.A.	1211.90
Retirement allowances(退休津贴)	1544.51

Σ(总计)3248.41

Σ(总计)68 744.80

Departmental expenses and supplies(系科经费):

Biology(生物学)	543.65
Chemistry-gas(化学—煤气)	928.04



Chinese(中文)	326.91
Education(教育学)	30.95
Education-Practice school(教育学—实习学校) ...	3446.66
English(英语)	93.83
Geography(地理学)	135.51
History(历史学)	0.83
Hygiene(卫生学)	40.10
Lectures(讲座)	3.17
Library(图书馆)	363.43
Library periodicals(期刊)	1242.87
Music(音乐)	1096.03
Physical Education(体育)	547.24
Physics(物理学)	417.00
Philosophy(哲学)	14.74
Sociology(社会学)	93.08

Σ(总计)9324.04

Maintenance(维护费):

Care of grounds(场地维护)	691.29
School heat(学校供暖)	1620.27
Janitor's supplies(门房用品)	191.11
Light and water(水电)	1582.52
Wages of servants(工友工资)	1540.90
Upkeep of buildings(校舍维修)	3677.90

Σ(总计)9303.99

Boarding Department(食宿费用):

Food, fuel and wages(伙食、燃料、工资)	7713.02
--------------------------------------	---------



Heat for dormitory(宿舍供暖)	1466.00
House supplies(房屋用品)	542.46
Light and water(水电)	1582.53
Wages of servants(工友工资)	1373.50

Σ(总计)12 677.51

Permanent equipment(固定设备费用):

Campus improvement(校园改造)	387.60
Furniture-college(学院一家具)	366.40
Furniture-faculty(教师一家具)	273.70
Office(办公室)	30.26
Library books(图书)	4126.59
Music(音乐)	111.76
Biology(生物学)	180.60
Chemistry(化学)	456.39
Gas plant-under construction(在建煤气场)	4500.00
Physics(物理学)	720.80
Physical education(体育)	1389.72
Geography(地理学)	48.80

Σ(总计)12 592.62

Grand total all expenditure for year(年度总开支)

..... Σ(总计)138 437.05^①

1932—1933 学年财政支出,行政管理、教师和工人的

① 《金女大1934年3月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有关财务报告中的收支账目》,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工资占全年总支出的61%，图书、杂志和设备费占全年总支出的10%。事业发展如需上重大项目，遇到重大事件，还须另外筹集资金。

(二) 严格的财务管理

教会大学一般由基督教的一个或几个差会联合投资建设，组织管理有几重机构。一级机构设置在美国。由出资的教会组织派人构成联合董事会，董事会设主席、秘书、司库及其他成员。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金女大亦如此，创办人在美国纽约设立联合董事会。主席为 Miss Margaret E. Hodge，司库为 Mr. Russell Carter，秘书人选是经常换的，董事会成员10~14人，人员常有变动。董事会每年要召开年会，确定各委员会的增减人选，审议校长学年报告，行政委员会报告，金陵委员会报告，学院计划，财政报告等。联合董事会还要在美国为金女大招聘外籍管理人员和教师，决定投资增减，审定发展计划等。二级机构设在中国。金女大在中国事业逐渐发展，国内也有了投资联合办学的董事，在中国也设有校董事会。校董事会内设有主席、秘书、会计。校董事会每年要向美国联合董事会做详细书面汇报，其中包括财务流通账目、建设项目及每一笔收支情况。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保存着金女大1916—1945年的财政报告。财政报告包括以下内容：前一学年度财政情况、流通账目、建设账目，修订本学年度财政预算，下一学年度的财政预算等。例如，1929年10月财务报告中列出4项内容：

(1) 1928—1929 学年财政状况；



- (2) 1929—1930 学年修订后财务预算；
- (3) 1930—1931 学年预算；
- (4) 行政委员会和学院建议。

1931—1934 年是金女大事业发展又遇到经济困难时期。1931 年 7 月,大运河以东发生洪水灾害,9 月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据沈阳,1932 年发生上海一·二八事件。美国驻华领事劝告美籍教员离校,学校要推迟开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合董事会对金女大的投入有所减少,但学校的基本建设没有因此而停止。1932 年 6 月,图书馆兼行政楼,教堂兼音乐楼破土动工。1933 年 4 月,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捐赠的实验中学宿舍破土动工。

1933—1934 学年度,金女大财政报告出现了赤字。1934 年,董事会向美国联合董事会汇报时除了做通常的财政报告外,增加了财政委员会关于制止财政赤字的报告,并单列建设项目报告。1934 年 3 月财政报告列出的 4 项内容如下:

- (1) 1932—1933 学年财政情况及流通账目；
- (2) 1932—1933 学年建设项目；
- (3) 1933—1934 学年修订后财务预算；
- (4) 1934—1935 学年度预算。

另增财务委员会咨询建议,其内容为:

- (1) 1933—1934 学年度赤字情况；
- (2) 1934—1935 学年度增收方案；
- (3) 金陵委员会请求调整西方人员工资；
- (4) 实验学校宿舍赤字情况。



还有建设项目报告,包括:

- (1) 有关建造新楼的报告;
- (2) 有关建楼的基金报告;
- (3) 未来建楼的计划。

金女大经济上出现赤字后,一方面向联合董事会汇报,并提请调整西方人员工资,另一方面,吴贻芳于1934年5月2日离校,访问厦门、广州、香港、雅加达、马尼拉的学校和金女大校友。每到一地,吴贻芳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宣传金女大办学的成就,争取捐赠。经过努力,到1934—1935学年度决算时消灭了赤字并剩余5000多元。

三、校园建筑及风格

(一) 绣花巷校园风格

金女大的办学经历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没有走先办中学再办大学预科,再办本科的过程,而是一开始就按本科大学来建设。教师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教材均沿用英美大学的规定。校舍要求符合大学教育教学条件,要有图书馆、实验室、体育设施等。校园既要优美又要雅静,适合读书学习。

1912年冬,基督教会规划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校址选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南京。当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迁都北京,经过战争洗劫的南京呈现破败景况。许多官员、绅士逃往外地,寻求避难,市内有许多又大又空的房子。1914年,金女大租赁位于东



郊绣花巷李鸿章儿子的住宅,作为临时校舍。

李氏住宅是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格。宅门不太大,门两侧各有一尊石鼓。门内有几个庭院,每个庭院有40多平方英尺(约430平方米),由二层楼的房屋围成。屋檐下是宽宽的走廊,由坚实的柱子支撑。楼房青砖灰瓦,飞檐高耸,窗和门是木花格的。地面用地砖拼成图案。各庭院之间由呈圆形的月门连通。整个住宅约有屋百间。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赞赏不已。

1915年春,金女大对此住宅进行了适当的修缮,改造成校舍。

第一座院落,进门穿过一条幽幽的小径,到达能容纳200人的小教堂。小教堂的横梁用深棕色,花格门用纸糊上,里面光线幽暗,庄严肃穆。小教堂的对面有宾客室,室内摆放清一色的大理石柚木桌椅。斜木条格门窗上绘有中国画。

另一座院落里有图书馆。房间高敞,用天花板吊顶,墙面由白漆木片装饰,室内装有暖炉,沿墙摆放着书架,中间放置长方形桌椅。还有社交室,也是学生的学习室,长22英尺,宽11英尺,约245平方米,内设钢琴、小火炉。这里还设有女青年会、学生干部会,学生们常在这里读报、聊天、迎新生,有时冬天考试的考场也设在此地。社交室的西墙有一排玻璃门,如需进行室内大型活动,可将玻璃门拆下与邻室构成较大空间。

学生全部住宿。学生寝室内有梳妆台、脸盆架、水桶、小书架、床、桌、椅。教师起居室紧靠学生宿舍。每周五晚



上师生欢聚一堂。

第3座院落设有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内排列桌椅,北墙架子上排放着仪器设备。生物实验室有显微镜等仪器设备。另有医疗室,教职员和学生餐厅,厨房。

东边后院有一座美丽的花园。有常青灌木和四季花卉,有李树、苹果树、紫藤、绣球、玫瑰,还有栽植莲花的池塘。花园中央建有一间凉亭。这里是学生户外体操、晚会、英语会话场所。后来又租用比邻的一块空地,修建成网球场。网球场在最初的2年中没人使用。2年后,学生们意识到打球有助于身体健康,出现了争场地现象。

第一年准备收20名学生,实际到校13人。1923年,在校生成有150多人。校园空间满足了学生规模扩大的需要。

(二) 陶谷校园的规划设计与建筑

绣花巷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大屋顶,花格门窗,屋檐下宽宽的走廊以及四季百花争妍的环境,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种美好的感觉在金女大自建的永久校舍打下深深的烙印。1916年,金女大在南京宁海路购置了164亩地。1918年,聘美国纽约建筑师亨利·K·墨菲先生(Mr. Henry Kill Murphy)设计校舍。

墨菲先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开始在中国从事建筑设计。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建筑顾问。^①金女大董事会与墨

^① 《近代来华外国人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菲先生讨论校舍建筑模式时,提出采用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墨菲先生作为西方建筑师对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很有兴趣,且对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做了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决心为金女大设计出中西合璧建筑。

1918年11月,墨菲先生作出金女大最早的整体规划图和渲染图。主体校舍由西向东11幢2层楼房,构成四进四合院落。楼房均采用中国古典大屋顶。^①1919年,德本康夫人带着规划图、渲染图去美国募得60万美元。后来,墨菲先生对早期规划图做了调整,一方面使校园布局更紧凑,12幢房屋对称构成3座院落,校舍主体呈宫殿式建筑群,楼房之间有回廊连接,另一方面,因为是女子大学,校园环境融进纤秀绮丽的园林风格。楼群间配置草坪,草坪周围几条道路宽广平整,四下延伸。道旁是精心装点的绿篱花草,还有几处荷花池塘。

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完成了整体规划图中的7幢楼。1923年建成教育楼(300号)、科学楼(200号)、迎宾兼体育楼(100号)、3幢学生宿舍楼(400号、500号、600号)。1924年又建成一幢学生宿舍楼(700号),同时建成小型发电厂、煤气厂、浴室等附属设施。

第二任校长吴贻芳完成了整体规划图中的2幢楼。1934年建成图书馆兼行政楼,大礼堂兼音乐楼,还建成教工宿舍、附中校舍、医院等。

^①《拓荒者》,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撰写,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图书馆藏。



整体规划中的另3幢楼房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由南京师范学院于1954年建成文史地楼(现称北大楼)、数理楼(现称南大楼),1956年在建筑群中轴线上建造两翼为1层平屋顶式阶梯教室,中间为2层大屋顶宫殿式T字形中大楼。

为了保证宁海路随园校舍的整体均称美观,1983年、1990年,南师大在500与700号之间、400与600号之间分别建设幼教楼和计算机楼。1987年,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地建造3层的外文楼、音乐楼。至此,宫殿式建筑达16幢。

今天,海内外友人,包括走遍世界很多著名大学的朋友,参观了金女大校园后,无不赞叹她的美丽,一致称颂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建筑学博士董黎所著《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称赞金女大校园是中西合璧之作。从单体建筑看,在保持西方古典建筑的构图原则和比例尺度原则下,将中国古典建筑的元素渗透到西式房屋的墙身之中。具体说,墨菲先生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大屋顶替代了意大利式平屋顶,但在大屋顶与西式墙身之间用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额枋过渡,墙身中段用西式柱式控制构图,但将西方柱改为中国式红柱。窗的位置保持西方要求,窗棂图案则参照中国古典式。大屋顶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保证古典式屋顶的整体形象,采用歇山屋顶,但在顶端将中国的全封闭处理成尽可能开窗洞,解决了采光通风,尽可能利用屋顶的有效空间。用钢筋混凝土仿制中国古典建筑的斗拱,外部追求中国古典式色彩装饰效果,大量地采用檐下彩画和雀替彩画,



讲究墙面外装修。整体布局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墨菲根据中国故宫布局的基本原则——在轴线上依次采用纵横空间对比,湖泊山丘呼应的构图手法,在不规则的平面上,设计了纵横两条轴线,以东西方向的为中轴线。中轴线通过入口细长的林阴道来加强空间的纵深感。小礼堂和图书馆楼向轴线靠拢,使100号楼前部形成半封闭的院落空间,视觉对比由纵向深远转为横向宽敞。100号楼是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起到了空间构图的控制中心作用。穿过100号楼,是由学生宿舍为侧楼围合的另一院落空间。院落中部是一人工湖,花丛垂柳,假石倚岸,颇有后花园的情调。中轴线的终端引至丘陵的峰顶,峰顶有一中式楼阁,借助于自然地形达到完美的终结。位于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严格保持对称均衡,数量不多的建筑,在空间序列上有前导、有高潮、有尾声,在空间层次上有平、有凹、有凸,渲染出丰富而统一的艺术效果。

校园主体建筑呈方院式布局。这种方院在空间比例尺度上也是中西合璧之作。比例上是中国古典式的,尺度上是西方近代式的。方院面积与围成方院的每一幢楼的底面积之比基本相似。院落的纵横比设为4:5(纵边长80米,横边长100米),符合中国古典建筑审美习惯。方院的环境布置则是西方式的——平坦规则的草坪,几何图案的道路,修剪齐整的树丛。方院周围的建筑则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趣味。用中国园林式游廊把主要建筑联结成一个整体。游廊的卷棚顶和建筑群保持一致,低矮、狭深、平缓的轮廓反衬出主体建筑的复杂、优美和高耸、庞大。这种游廊既能起到



适当界定空间的作用,又可透空增加院落的景深,再配以西式园林的绿化布置手法,构成优雅气氛。

在人们的眼里,金女大校园的中国文化味很浓。校园建筑群的中心——100号迎宾楼是其代表。进入100号迎宾楼,是一间华美宽敞的客厅,周边有绿色窗棂分隔开的小间,一盏盏悬着红缨须、画着传统中国画的宫灯,水墨淋漓的山水画,玲珑的折叠黑漆屏风。

校园四季繁花似锦。春天,嫩绿丛中夹杂着梅、兰、桃、樱,嫣红姹紫;秋天,桂花幽香,沁入肺腑,几棵古老的银杏满树金黄,令人如入仙境。宿舍楼内有宽敞的餐厅、交谊室、梳洗室。楼两端做成骑楼式平台,一间寝室住两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环境当属“人间仙境”。

四、校园环境育人

(一) 校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不仅是传播文化、灌输知识、培养能力的场所,也是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场所。对学生的培养、教育,除了课堂、实验室、教师传授及图书杂志的影响外,校园环境对学生的品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金女大的校园环境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指中西建筑文化熔铸而成的校园及由山水、花草、树木、鸟类构成的园林文化。人文环境包括校训、校歌、校刊等校园文化生活事项。校园中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从不同方面



影响着学生。

自然环境为学生的读书学习提供了赏心悦目、优雅安静、便于思考的地方,使学生除了在明亮宽敞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学习外,还可在花园般的大自然中,在池塘边,树阴下,花丛中,草坪上,或阅读中外书籍,或讨论科学,或讨论人生,吸收消化知识。各种花草、树木、鸟类,还是天然的教学工具。生物系教师在校园里讲授花草、树木、鸟类所属的纲、目、科、属、种,实地教学,给予学生更深刻的感受。

人文环境为学生完全人格的塑造提供了熔炉。校训是校园文化主要内容之一。金女大的校训是“厚生”,它训育学生要具有奉献、牺牲精神,金陵女儿的生命因服务别人、服务社会而更丰盛。经过“厚生”校训的熏陶,大多数学生以能服务别人,服务社会为荣。金女大有一系列校园歌曲,学生在集会、校庆、返校时总会唱校歌。这些校歌不仅能激扬民族自尊,使之力争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同时又将学生凝聚在金陵大旗之下,为金女大的发展自豪,为金女大的困难分忧,与金女大共命运。最早的校歌,是1919年由美国的一首歌曲改编的。歌词为:

虎踞龙盘兮艳说国维新,
山川不改兮民族全其真,
大江纵贯滔滔兮广且深,
东渐于海注大洋达美洲。①

① 摘自吴贻芳所存歌本,歌词共3段,第2、3段略。



在 30~40 年代时,歌词修改为:

虎踞龙盘兮,女校曰金陵,
学科分文理,研析求真。
看山高水长,浩荡莫与京,
国家民族待,兹山川效应。
中华号古国,文化早著名,
道艺与方技,学海浩无垠。
化民务成俗,立己更立人,
女界多才秀,莘华赖栽培。①

除了校歌,还有琅琅上口的校园歌曲。

抗日战争时期,由学生方颖保(后改名为方菲,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作词,洪达琳作曲,谱写《我们都是金陵的女儿》,在学生中广为传唱:

我们都是金陵的女儿,
独立在伟大的时代高岗上。
我们是紫金山的朝霞,
我们是扬子江的波浪,
不怕黑夜风雨颠狂,
金陵要做祖国灯光。
快乐而欢欣永不悲观与嗟叹,
齐声高歌志气扬。②

① 摘自《我们的歌》,金女大校友会汇编。

② 金女大校友会:《永久思念》,1993 年版,第 53~54 页。



这首歌包含着金陵精神,即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要永远“快乐欢欣”,“志气扬”。许多校友唱着这首歌,在工作生活中保持、发扬了这种精神。

还有同学会会歌。会歌把金女大所有毕业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特殊的金陵大家庭。吴贻芳和校友一起修改会歌,让海内外校友同唱一首歌。同学会会歌歌词原为:“漪欤吾校,江山濒带,随园胜迹堪寻,欣文析义数载晨昏,眊彼青林有鸟嚶鸣,为善辅仁,正气同声,光母校,采大风。”

30年代初,经吴贻芳审定,改为:“回想我们,正当年轻,跨进金陵大门。为学专业多勤奋,良师益友情谊深。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以‘厚生’为校训。啊,时光流逝,夏,秋,冬,春。啊!校友遍布南北西东。要把从母校所学知识,献给祖国人民。”

校友们相聚在一起,还会唱《We Are From Ginling》。这首英文歌,在30年代初校友会成立时被填上中文词,吴贻芳十分赞许。中文歌词为:

金陵的女儿欢聚一堂,为母校金陵同声歌唱;
同声唱金陵、金陵、金陵,歌声嘹亮,传向四面
八方。

金陵的女儿欢聚一堂,年龄和专业互不一样,
都有着建设伟大祖国共同理想,共同美好理想。

校园歌曲伴随着校友一生,带有民族气节,宣扬发奋向上、奉献生命为他人的校歌,更是一种鞭策,使校训精神以一种愉快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位校友,也使校训教育延伸到



校外,延伸到校友的终身。

校刊也是校园文化内容之一。校刊反映的是学校各方面的新闻,有校长讲演、致辞,出访报道,有专家的学术报告摘要,有全校性活动简讯,也有学生的活动动态,还有师生的文学作品、书画作品。

1924年11月创办《金陵学刊》(The Ginling College Magazine),每季度一册,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主要刊登学生的论文、诗歌等。逢学校大庆,出版纪念专刊,刊登校史、校友回忆文章及校园风景、学生活动的图片等。吴贻芳接任校长后,于1933年10月出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每半月出一期。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因日本侵华,学校西迁而停刊。1939年10月,在成都华西坝暂时稳定后,校刊复印,但因战时印刷困难,改为每月一期。栏目宗旨不变,但具体小栏目针对当时主要工作而设置,故每期有变化。例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4年5月1日第12期主要内容为:求学与练习服务,招生简章,校长活动,学生代表团参赛获奖,教师讲演摘要,各系建设动态,学生会活动,文体活动,学生文稿摘要,毕业生近讯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4年5月1日第115期要目为:部令学生不得越级呈请,捐赠奖学金,五大学调整教职员待遇,刘恩兰博士赴西北讲学,社会学之学术演讲竞赛会,葛利石教授(美国西芮蔻斯大学地理系教授)来蓉,五大学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近况,本校歌咏团期末举行音乐会,体育系举行韵律运动表演,女教职员与一年级同学举行排球赛,参观燕京大学崇义桥乡村服务研究处,印缅战事,国内战局



等。

学生毕业时,校刊以毕业生的信息为主要内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4年6月第117、118期要目为:临别题词,级歌,回顾4年生活片断,本届毕业生题名录,论文题目一览,毕业消息汇志,级友素描,校闻3则,校友消息等。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东迁复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6年10月第135期要目为:本校复员经过,本学期校历,公费生福音,聘黄续汉女士为毕业同学会执行干事,教职员进修会,记迎新大会,“处处皆剑阁”的生活,还乡记,战火熄后之金陵等。

校刊维系着在校学生,也维系着毕业离校校友们之间的感情。校友们从校刊了解学校的建设、发展,而在校学生可以了解校友的就业及成就。校刊既是办学历程的真实记录,又是学校教育学生和学生自我教育的载体。

(二) 校园环境对社会的影响

金陵女子大学拥有中西合璧的建筑,宽敞舒适的西式校舍,四季如画的园林校园,成为当时南京城里的一个景点,引起了上层社会达官贵人及周围居民的兴趣。同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因此它又成为一个面向国际的亮点,引起其他国家教育界人士的兴趣。

吴贻芳充分利用美丽校园的“广告效应”,扩大金女大的社会知名度。校庆日、圣诞日邀请各方人士来校实地参观,考察校园、校舍。不时举办音乐会、运动会,打开校门,欢迎四方来宾观看,以不断扩大影响,为金女大带来更多的生源及资助者,进而推动学校发展。



1923年11月3日是由绣花巷迁入陶谷新校舍第一个校庆日,金女大发出4000份请柬,邀请省长光临,市政达官贵人到校祝贺,全市大中学生到校参观。12月25日举办圣诞庆典,邀请学校周围400多名居民到校参观。

1935年11月3日,金女大20周年纪念庆典,邀请社会各界成千上万的人参观校园。

1948年5月,在南京陶谷校园举办盛大的体育表演会,发票邀请校外来宾3000多人,各系学生穿着各国、各民族服装,在动听的音乐伴奏下,在大草坪上表演土风舞、宫廷舞、竿舞等。

美丽舒适的校园,加之海内外知名的吴贻芳校长,吸引了许多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把女儿送入金女大学习。30~40年代在金女大就读的有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的女儿章展,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大律师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曾任湖南、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女儿叶至美,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之女徐静斐,国民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之女洪范,大学教授之女鲁洁,下关电厂厂长之女鲍惠荪,安徽名医之女孙家馨,归国华侨、高级工程师之女曹怡等。

金陵女子大学不仅向国内开放,也向海外开放,经常接受或邀请其他国家的政府要员、代表团、大学校长来校参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金女大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参加校庆和毕业典礼活动。凡是参观过金女大校园的来访者,都赞美其建筑及校园环境,称之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第

八

章

动荡艰难中的应对

一、应对自然灾害

吴贻芳出任金女大校长后,正如一位校友所描述的:“一直生活在家庭不幸,国运坎坷,国际情势瞬息万变中,可您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感人肺腑的话剧。担任了金陵女大的校长,经过20多年的艰辛奋斗,惨淡经营,建树颇多,虽然尝尽了人生的辛酸,可是也享受了桃满天下的乐趣。”^①的确,吴贻芳担任校长的20多年里,国家政局动荡,社会不稳,不仅自然灾害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① 谢伟鹏:《吴贻芳校长》,《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频繁,而且内战不断,更重要的是8年抗日战争环境,几乎把吴贻芳赖以进行“教育报国”的舞台——金女大摧毁。这期间,吴贻芳惟一的亲人妹妹贻荃于1933年底失踪。吴贻芳又一次经受了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但她为了教育事业而振作起来,与同仁一起惨淡经营,艰苦奋斗,使金女大得以存续发展,为社会培养出众多杰出的高级专门人才。

吴贻芳主政金女大期间,面对的危害主要有:1931年的洪灾,1932年发生在南京附近的疟疾、霍乱,以及抗战时期的物价上涨、资金短缺等等。1931年华东发生水灾,吴贻芳动员学生捐款捐物。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得在其所著《金陵女子大学》中记载:“1931年的洪水——一场差不多危及全中国的灾害,激起了金陵师生的极大关注和同情。金陵师生被号召起来,尽其努力,提供帮助,捐献了大量的钱和物,设立了一项专门的金陵基金,总数达2068.26美元。帮助在魔岭关(音译)维修了一座堤坝,买了一些种子,以备春种。这一段时间内,学生们在洪水威胁已经减弱的情况下回到没有暖气的宿舍里。通过一点一点的个人捐献,基金数又增加了204美元。”^①1932年,南京附近疟疾、霍乱流行,学校主动与卫生局合作,参与消灭疫情的战斗,“学校将蚊帐借给居住在校园周围的人,还向他们发放了奎林,学校的生物学家和卫生官员想方设法杀灭疟疾”^②,同时尽可能对邻里提供帮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不仅市民,包括教会学校也出现了经费紧张局面。对此,吴贻芳鼓励

^{①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第80页。



学生研究食品与营养学,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做到保证供应而又讲究营养。

吴贻芳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采取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没有把校门关闭起来,而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他人的命运。这不仅培养了学生,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学校的教化作用,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二、应对政治动荡

吴贻芳在校长任内的最初几年里,国内政局不稳。国民党虽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但事实上依然是军阀混战,另有外国列强环视,加上国共两党的斗争,可谓政治动荡不安。尽管金女大为教会大学,但向中国政府注册之后,就要遵守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当局的旨意,而教会大学的学生也更加关注政局的发展。政治变化会在学校里有所反映,往往是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举行罢课与游行示威。吴贻芳在应对政治动荡局面的过程中非常理智,采取了比较得体的决策。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大学生们痛恨不抵抗政策,为催促政府向日本宣战举行游行抗议活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金陵并不赞成这样的激烈行动,却组织了一个全国抗日救援会分会,中国教师和学生纷纷参加,急救课上了整整一个学期。”^①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金女大4位西方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教师离开了金陵。面对传闻与压力,吴贻芳毅然决定春季继续开学,不因外界紧张的局势而使事业中止。正如德本康夫人所言,校行政当局是“冒险开学”,结果很顺利。这表明,吴贻芳对政治形势分析得当,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正是这种洞察力,使吴贻芳做到了决策正确。

三、应对战争环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事发生在北方,师生感到战争还很遥远。因此,金女大的大部分家庭,包括教师家庭和学生家庭,带着9月初能开学的期待依然分散到各地度暑假,吴贻芳也于7月下旬到牯岭和上海作短期休假。但8月份,日本侵略上海,并派飞机轰炸南京,教育部不得不向宁沪及沪杭铁路沿线发出通知,推迟开学。当教育部再次通知推迟开学时,吴贻芳决定迁移,“暂时放弃在南京继续维持学校教学的想法,并同时宣布了在其他中心继续金陵的精神和事业使之永保活力的大胆而又鼓舞人心的计划”^①,即“选择了3个师生比较集中而又便于与其他教会大学联系的地点,作为办学中心”^②,即武昌中心、上海中心、成都中心。

武昌中心与华中大学合作。这个中心有35个学生和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张肖松、陈品芝、龙冠海、刘恩兰、陈中凡、苏德兰等教师。教师在华中大学任教，学生在华中大学选课。华中大学宿舍只能容纳部分师生，另一部分则在伦敦会寓所住宿。

上海中心主要与圣约翰大学及沪江大学合作。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郊区，市区虽有“租界”这块招牌，但已是孤岛。金女大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借了几间房子。在上海授课的教师有蔡路得、克馥兰、陈黄丽明、朱谢文秋、胡惜苍等。此外，学生还在其他4所教会大学选课，也到中国科学院做实验。

成都中心与华西大学合作，师生人数最少。因黎富思博士在华西避暑，战争爆发后，她留在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开展工作，就成了成都“金陵团体的中心”，尽管最初只有3个学生。

这3个中心，武昌中心办得最短。考虑到日军侵占南京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武昌不能久居，吴贻芳便于1937年底到武昌结束事务，于1938年初率师生来到成都。同时，吴贻芳考虑到上海已有几所教会大学在集中办学，能够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因此，她从重庆飞往香港，再从香港乘轮船于1938年3月底到达上海，与在上海的教师及董事会成员商议“学校的未来发展计划”。当时，大家认为指望南京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否应该继续保留两个办学实体，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华西？或者是否应当将这些实体集中在一处？如果应当这样，又以何处为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学生群体太少，不能再割裂，继续这种分离状态是不明智的。最初，许多人赞成选择上海，因为它离南京很近，提供



了将学校迁回南京的希望；另外，金陵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它所在的那个地区。然而，很快人们就对此提出异议。上海方面的成员也意识到对于必须在当地做的那种工作存在着许多反对意见。很明显，上海拥有的其他学校能够为本地需要服务。许多支持金陵的学校已经到西部去了，在那里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加正规的办学条件。”^① 鉴此，吴贻芳决定关闭上海的办学中心，所有能够走的教师与学生都迁往成都。考虑到已在上海学生的实际情况，吴贻芳给学生提供了3种选择方式：“（a）随学校去成都上学；（b）继续在上海借读；（c）转学到上海其他学校”^②。后来有5名学生随6位教师到了成都；有31名学生作为金女大的学生，在上海几所教会大学借读，直至毕业；其余的，则转学到了圣约翰大学。

在作出相对分散办学的决定后，吴贻芳最初留在南京，以保持与分散各地的教学中心的联系，处理教学楼及校园的相关问题。随着战争向南京推进，人们都劝她离开，担心她会失去与3个教学中心的联系。因此，吴贻芳在南京安排好留守组织，即“一个由华群小姐领导的驻校维持委员会，以便在紧急时刻为邻居们服务，并尽可能保护金陵的财产”^③，然后撤往武昌。

吴贻芳乘船由南京撤往武昌的途程，成为她“一生中最

①③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第105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痛苦的经历”。她是这样描述的：

我在1937年12月3日离南京去武昌时，正值日寇侵占南京前夕，国民党政府在极为混乱中撤退，只能设法乘坐英商怡和公司的船。这只船为了装运南京博物馆古物，迟迟不开。一天里有过7次空袋。每次一听警报，这只船就靠到停在江中的英国军舰旁边去。我目睹英帝国主义的私商船只和军舰在我国的江河中通行无阻，英帝国主义的军舰成了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的庇护所；而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却缺乏防空设备，江边连掩体都没有，江岸上成百成千无法上船的中国人处于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人丛中还堆着许多箱弹药，随时都可能遭到日机轰炸，令人触目惊心。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①

学校迁往成都后，吴贻芳“曾认真考虑在华西地区找个半农村环境建校，试行一种使学生在战争环境中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教学方案。可是，第一是在华西中小城镇中找不到适当校舍，又兼西迁后设备不足，不能独立办学；第二是课程若不按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执行，学生的学位将不为政府所承认，因此，最后还是接受了华西大学的邀请，到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成都华西坝办学”^①。为了使金女大得以保存,吴贻芳与四川省政府协商,在华西大学校园里借了一块地,建起了一幢教师和学生居住的简易临时宿舍,后又建起一座小型体育馆。华西大学作为东道主,借出一些教室和一间地下实验室供金女大办学之需。这样除原有学生外,金女大从1938年开始招收新生,保持着独立学院的地位。尽管当时办学条件艰苦,但同学们表示她们并不是娇生惯养的人,她们对新校址很满意,“条件很差,但一切都是自己的”^②,再也不用在动荡中颠沛流离了。当时在华西坝办学的除华西大学外,还有数所内迁至此的大学,由于教授不足,各校所开课程允许各大学学生互选,互相承认学分。

在华西坝办学期间,吴贻芳制定了一个重组教师队伍的计划,尽可能将原金女大教师队伍稳定下来,同时想方设法改善教学与实验条件,保持办学质量。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出现不少经济困难学生,吴贻芳采取了很多措施给予她们帮助。她说:“从这个时期起,许多学生的家庭受战争影响,经济不如过去宽裕。金女大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让她们在课余或假期做些工作,如打字,管图书,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钢琴伴奏等,给予报酬。又设立奖学金,发救济物品或补助。学费也较前下降。”^③

①③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5页,第105页。

②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抗日战争期间,吴贻芳就金女大所作出的决策与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作为一所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外教会组织支助,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的女子教会大学,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将学校关闭,让学生自谋出路或转移到其他学校,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谁会给予过多的指责;也可以与规模较大的学校合并,或依附于其他学校,维持办学。如此,金女大都可能终结其发展历史。但吴贻芳本着对事业负责、对学生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在最初战事急迫时,让学生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于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的地方,选择一个教育程度合适的学校做借读生,同时在师生相对集中的地方分散办学。这种决策,使学生及其家长看到了学校维持发展的决心,对学生负责的决心。在成都办学期间,吴贻芳努力保持金女大相对独立的办学传统,并根据新形势需要加强为社会服务、为西部服务的系科,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值得指出的是,吴贻芳及其同仁在抗日战争艰难的环境里能够坚持办学,学生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与所谓“金陵精神”有密切关系。在抗战初期分散办学的日子里,校友设法向学校转达她们对母校的思念之情,电报联翩而至,表达了金陵女儿对母校的祝愿:“金陵被分散了,金陵人并不沮丧。我们只有一个希望,一个信念——母校青春常在,生命永存。”“愿金陵家庭加强自身的力量,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勇赴国难,俾学校创始人及学校的理想观念,值得永久纪念。有什么力量能够把我们与伟大的基督之爱割裂开?



是忧患还是灾难,是人为的迫害还是自然造成的饥馑,是衣不蔽体,身陷绝境还是面对利刃?都不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有金陵给我们的爱,我们都将获得最后的成功,化险为夷。”^① 金陵学生与校友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确实做到了勇赴国难。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大量的救死扶伤工作,多次发起募捐和捐献活动,无私地为前线将士及其家属、难民服务。吴贻芳不断地激励学生在困境中振作。1939年10月,她专门为师生作了《如何振作精神》的演讲,要求人们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认识精神的力量,尤要注重实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清楚的认识,进而振作精神。吴贻芳还要求学生自立自强,告诫学生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品格上,都要以自立自强为原则。在战争环境里,生活要力求简朴,课外当多阅读报章杂志,多得政治知识,使自己有眼光。为了进一步凝聚师生的精神,弘扬金陵女儿为社会服务,无私奉献,不畏困难的精神,1942年秋,吴贻芳主持了金女大建校27周年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以宣扬金陵精神为中心,庆祝游艺会演出了《金陵自传》。该节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开卷语;序;第一章,儿童时期;第二章,少女时期及学校生活的影响,体现坚强刚毅的性格;第三章,成年时期,知识丰富、精明能干的女儿已成为社会家庭的中坚分子;第四章,将来展望,金女大毕业生中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足迹走遍世界;尾声,祝颂金女大寿比南山,福如东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4页。



海,万寿无疆。正如德本康夫人所言,尽管环境恶劣,但“整个金陵师生群体的精神却是无与伦比的”^①。在华西坝办学期间,吴贻芳提出“艰苦建校,抗日救国”、“努力读书,后援抗日”的要求^②,使金女大学生养成了以爱国为己任,服务社会为己任,帮助他人为己任的精神。

四、应对内战局面

抗战胜利后,吴贻芳迅速作出迁校回南京的决定,1946年9月在原校址复课。为减少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于学校重建,吴贻芳辞去了一些社会兼职。但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被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打破了,吴贻芳所期望的和平新局面并未出现,依然是内战局势下的饥饿、动荡。残酷的现实使吴贻芳困惑,在与姨父陈叔通交换意见后,逐渐地疏离了国民党政治,拒绝加盟国民党政府,对不断爆发的学生运动,在试图进行约束而又无效的情况下,给予默许和行动上的支持。在国民党军警要抓捕学生的时候,她利用社会影响加以制止。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战争越来越接近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家长催促女儿尽快回家。吴贻芳没有像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那样严厉批评学生听信谣言想回家的举动,而是痛苦地看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②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84页。



着学生离开学校,跟随她们的父母去了香港、台湾或美国。到1948年下半年,金女大的工作已近于瘫痪。吴贻芳说:“国共和谈决裂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展开了。当时有人主张将学校迁往台湾,我坚决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要保护学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秋毫不犯的,就决定学校仍留在南京,迎接解放。”^①

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还没有进城,南京出现了暂时的“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当她被邀请担任南京各界治安维持委员会副主任时,她没有推诿,而是欣然同意。为了保障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发生动乱,吴贻芳与原西北军高级将领马青苑等发起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签发了安民告示。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这一天,吴贻芳与金女大在校学生一起到新街口欢迎解放军。南京解放后,由于解放军没有掌握制空权,台湾当局不断派飞机轰炸,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这时,设在南京城里的一些外国银行、商行和学校,纷纷竖起外国国旗,以避免飞机轰炸。考虑到金女大的情况,也有人向吴贻芳建议,在学校的最高处悬挂美国国旗,说这样一定可以受到美国方面的保护,前来空袭的飞机就不会把它作为轰炸的目标了。听到这一建议……吴贻芳掷地有声地说:‘不管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悬挂美国国旗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解放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学校里,为什么要

^①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挂美国国旗？这事关民族气节和国家荣誉，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这样做。’”^①

吴贻芳在抗战胜利后本想谋金女大更大的发展，将金女大办得更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妇女人才，无奈内战局势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她的美好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她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最终作出了远离国民党政治，拒任国民党政府要职，拒绝去台湾的正确决定。解放后，她被委以重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①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发行，1993年版，第121页。



第

九

章

学生眼中的校长

一、严格认真

大学校长的一言一行,尤其是涉及学业、道德、生活、深造、就业等切身利益方面的言行,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学生的一生。

吴贻芳执掌校务 23 年,热心、忠诚于学校发展。为了办好金女大,她辞掉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拒绝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了培养具有“厚生”精神的中国知识女性人才,她呕心沥血,以身作则,为人师表。1928 年以后进入金女大的学生,有许多人亲聆校长的教诲,亲身感受校长的慈爱,目睹校



长的坚韧、公正、无私。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校友聚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吴贻芳校长留下的深刻印象,她们纷纷撰写文章,汇成文集《永远的思念》、《金陵女儿》。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深入了解吴贻芳的学识人品,感受她的音容笑貌。

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及家长认为,金女大闻名遐迩的原因之一是对学生严格认真的管理。女孩子上金女大,家长放心;女学生上金女大,能健康成长。2002年7月10日,我们去金女大1932级校友、南师大外语系教授黄续汉家中采访。当回忆起往事时,她对金女大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严得不得了”。吴校长执行毕业标准、学籍管理规章制度不折不扣,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作风上违反规定时,她的批评从来是不讲情面的,是很严厉的。

1935届校友慕淑勤是一名孤儿,在金女大学习期间曾受到吴校长直接的教导和多方面的关怀。她说:“母校就是我的家,老师就是我的家长。我的一生受到吴校长的关怀太多了。”^①入学时,慕淑勤选择主修音乐,辅修物理。当时吴校长正好在旁边,她说:“音乐是文科,物理是理科,文理不能同时成为选修专业,但可以作为选修课目。”吴校长了解到慕淑勤进校前毕业于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让她直接选读主科音乐和辅科历史。慕淑勤回忆时说,吴贻芳校长在执行学校规章制度上是极其严格、认真的。学校规定住

^①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校生星期六可以回家,慕淑勤在南京没有家,只有一位小学、中学同学,又共事4年的好朋友。一个星期六,好朋友邀请她去玩,天晚了便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回学校。回校后,吴校长亲自找她谈话,了解星期六晚上的情况,并问她为何不请假,如遇到危险怎么办,要求遵守学校制度。学校规定,音乐系学生毕业前要举办音乐会。因慕淑勤写了两首钢琴乐谱和几首独唱、合唱歌曲,任课老师同意她可以不举办音乐会。但是,校长室发通知给她,要她在5月20日举办音乐会。当得知是校长的意见后,她便拿着通知去见吴校长。吴校长说:“举办不举办音乐会,不是老师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按学校规定办。”距举办音乐会只有1个月时间,校长特许她早上及晚上10点之前在琴房练琴。音乐会前两周,学校布告栏内贴出为她举办音乐会特别印刷的请帖。因不希望别人参加音乐会,慕淑勤连续两次把请帖撕掉。吴校长找到她,严肃地指出,撕请帖是违反校规的行为。以后,不仅再一次把请帖贴到布告栏,还以慕淑勤的名义邀请她中学的校长、好友、音乐老师及音乐系高年级同学参加音乐会。5月20日,当音乐会顺利结束时,慕淑勤激动地发现吴校长到场并带来花篮。她让慕淑勤将花篮送给老师以表示感激之情,并亲自宴请了她的师长。

1933届校友甘碧云深深地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选课。1931年甘碧云回校续学,要先选课,后注册,但指导三年级选课的教师度假未回。为难之时,吴校长叫甘碧云到校长办公室,亲自为她指导。甘碧云专修历史专业,吴校长建议选修金陵大学历史系名教授贝德士的《俄国史》。甘碧



云吓了一跳,半天不吭。因为贝教授上课很严,经常有口试、笔记,指定的功课繁重,打分数又紧,一般同学都怕选修贝教授的课。吴校长得知甘碧云发愣的原因后,轻轻一笑,说:“你怕难吗?”面对这样有挑战意味的问话,甘碧云立刻回答:“不怕!”就这样决定了甘碧云今后做学问的途径和目标。两年中,凡贝教授开的课,甘碧云都选修,连毕业论文也请贝教授指导。从贝教授处,她不仅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养成了好的学风。后来她考进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系,依然是认真学习,细心考证。另一件事是出国访问。1933年5月,甘碧云被南京基督徒学生联谊会选派去日本两周。当时离毕业还有6周时间。按金女大的规定,学生毕业前不仅要完成毕业考试、毕业论文,还要完成毕业级夕会。毕业级夕会是毕业班同学向师友辞别的晚会,事前要排练中文剧、英文剧、舞蹈等节目。甘碧云将出国访问的事告诉专业教师,请教师帮她督促其他级友去准备夕会。当甘碧云准备出国行装时,没想到吴校长找到了她,问:“级夕的各种节目准备得差不多了吧?中文剧、英文剧、舞蹈等都练习得纯熟了吗?”甘碧云随口说道:“时间还早,节目都在练习,各节目都有专人负责。”吴校长委婉地说:“这样很好。但你不要忘记,每年的级夕晚会外来的宾客和家长都很多。万一有什么准备不充分,出了差错,你会不会感到失望、难过,有愧于心呢?你被选为代表,去日本做友好访问,我也替金女大感到光荣,但你自己衡量一下,哪一个更为重要?”甘碧云顿悟:与出访日本相比,级夕会虽小但事关师生情谊,事关金女大的声誉。既已肩起,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半



途而废。^① 当时就答应辞去友好使者的头衔,让别的同学代替前往日本。

1930 届校友谢纬鹏(毕业后担任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因丈夫任温哥华和约堡总领事而随迁加拿大,现定居美国)说:“吴校长平时对我们爱护备至,却又威严有加。谈笑时,让人如沐春风;威严时,言语如暮鼓晨钟,声声扣人心弦。”^②

二、慈爱宽容

吴贻芳要求学生严格认真,但生活中常给予体贴入微的关怀。

1933 级校友张素我是张治中的女儿,1935 年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宣传、妇女培训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对外贸易学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92 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回忆往事,张素我激动不已:“吴校长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爱,常常到学生中间问长问短。新生入学后,她总要到宿舍去看看,要学生注意生活之冷暖,并问膳食如何。”“1935 年夏天,我刚满 20 岁,将远离国土,赴英国求学。校长知道这一消息后,就想到正巧有两位美籍教师经欧洲返美度假,于

^① 甘碧云:《忆吴校长贻芳师》,《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63 页。

^② 谢纬鹏:《吴贻芳校长》,《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5 页。



是,精心安排让我和他们结伴乘船赴欧洲,途中能得到教师的照顾。那时我为校长慈母般的爱而深深感动,她为远游的女儿想得多周到啊。”^①

1935级校友方非(在金女大读书时名为方颖保),毕业后参加重庆抗战服务团工作,1942年在苏北盐城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苏省国际友谊促进会会长。方非回忆道:“1935年初秋,17岁的我只身来到金女大,这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新奇的。几天后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正面遇到吴校长。吴校长在我走近她时站住了,微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又亲切地问我:‘你从安徽省来,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当时我心中十分惊诧:我刚入学不到10天,校长就已经了解我的情况了。……1949年,我从苏北解放区随人民解放军渡江回到阔别12年的南京,我穿着解放军军装,怀着眷恋的心情,走进母校金女大校园。真巧,和14年前一样,又是在图书馆门前,遇到吴校长。当我们目光相遇,两人都停下了脚步。她愣了大约1分钟,竟敏捷地做出反应:‘你不是××吗?’‘吴校长,你怎么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惊诧的心情胜过了第一次她叫出我的姓名时刻。‘我记得你,我记得我的每一个学生。你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了?’吴校长露出了喜悦的笑容。”^②

1984年,金女大海外校友回国。吴贻芳校长乘坐轮椅

^① 张素我:《回忆敬爱的吴校长》,《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② 《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在南京师范大学迎宾室迎接自己的学生。面对分别几十年的学生,吴贻芳校长不但能叫出在座的每个人的姓名,还能将学生在校生活的情形说得绘声绘色。只有把学生的成长当成自己的事业,把学生装在自己心中,把学生当成自己女儿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金陵女子大学许多校友都能感受到吴贻芳校长是一位慈爱宽容的人。

1946级校友陈尚璆自幼腿有残疾,考入金女大后,每周3次去金陵大学听王绳祖教授的欧洲历史课,每次从宁海路的金陵女子大学奔到汉口路的金陵大学总是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知道这一情况后,吴贻芳校长每次乘三轮车去金陵大学时,都让陈尚璆坐车同行。陈尚璆的腿发病时,吴贻芳校长让她免费住进校医院。1948年春,吴贻芳校长给她一笔奖学金,钱存入学校会计处,除用于学杂、膳食费外,还用于治疗,雇车去金陵大学上课,或用于营养,或添置衣服。这样,陈尚璆就不必再打工了,从而保证安心读书。^①

1948级校友秦筱娴记得,吴校长曾做出规定,凡患病学生由食堂补一份营养菜,如炒猪肝等,并发鱼肝油丸、钙片等药品。秦筱娴读中学时,由于条件艰苦,曾患肺结核病,考入金女大时体检记载“已钙化”。自进入金女大后,因得到了调养,病情大有好转,数十年来没有再犯病。她说:“当时可能没有哪一位高校校长能如此无微不至地爱生如子。”^②

^{①②}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第397页。



1938 级校友龙襄文说,1938 年西迁,“在成都华西坝校内,师生宿舍同在一处,两边是学生,中间是教师,校长亦在其中。师生同甘共苦,在一个大食堂共同进餐,除了固定伙食外,每日清晨一个鸡蛋,中午一盘猪肝,晚上一盘绿菜,是家庭条件较好学生及中外教职员的添加食物。但家境贫寒而身体虚弱必须进补的同学也有添加菜,这是吴校长用自己的薪金补贴学生的。”^① 这一年夏天,龙襄文因军训不慎造成左右臂脱臼,两手臂被石膏缠住,生活无法自理。吴校长知道后,将自己的黄包车让她使用,自己则步行去办公。同学们劝龙襄文将黄包车还给校长,但吴校长坚决不答应。

吕慰庭出生在北方,1938 年秋考入金女大,学校由南京迁成都后,对每餐吃大米饭特别不适应,每次吃饭都流眼泪。没过几天,餐桌上有了馒头,她感到十分惊讶。桌长告知,这是吴校长特地交待厨师为她准备的。吴校长不仅观察到吕慰庭吃饭掉泪,还了解掉泪的原因,就让桌长告诉她“先这样吃着,将来慢慢会习惯的”^②。

1935 级校友孔宝定说,抗战期间,大学生毕业后有一个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吴校长一直挂在心上。孔宝定 1939 年毕业后,由校长亲自介绍到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得知孔宝定的丈夫 1938 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待业在家,吴贻芳又表示愿意接受他到金女大化学系工作。^③

①②③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6 页,第 129 页,第 125 页。



吴校长的慈爱宽容拉近了她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便利了师生之间的交流、理解，使教育的理念、学校的目标更易于实施。

三、平等公正

民国时期，吴贻芳博士在学校内是校长，在社会上是著名教育家，是国民政府参政议员，她与师生的关系却是平等的，对社会事件的态度是公正的。

校友吴丽云等回忆起 1940 年 11 月师生欢度校庆中的一件事时，十分感慨。校庆活动中，吴贻芳校长、教师与毕业班学生一起演校史剧，道具很简单，“门”是想像中的，“跨门槛”动作按京剧的程式办。校史剧演完了，吴校长搀着一位西籍老教授跟着其他演员走向台下，却忘了像别人那样抬腿“跨门槛”。刚入学不久的新生捧腹大笑。当明白学生笑的原因后，吴校长重新上台，“跨”门而出。这一行动给全体师生尤其是新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校友曾星华说，在成都金女大读书时，有幸成为吴贻芳校长的邻居。新生入学后第 3 天早晨，吴校长要去四川省政府开会，省主席张群要派小车接送，但是校长坚持要坐自己的黄包车往返。她从不施脂粉，不戴饰物，平日身穿一件长及脚面、衣袖齐肘的黑色旗袍，见到师生都和蔼可亲地打招呼。一次，曾星华与堂姐应一位远房亲戚邀请，去成都青

^① 金女大校友会：《永久的思念》，1993 年版，第 46 页。



城山游玩。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很早就起身了,刚要出门,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楼道打扫卫生——是吴校长。曾星华心里一热,赶紧跑上前去,要接过扫帚,但吴校长推辞不让,说:“你们青年人读书很辛苦,清洁女工也很累。我难得有礼拜日这样的闲暇,应该做点儿事。”

吴贻芳校长是蜚声海内外的女教育家。她从来不以自己的德行去反衬别人的卑微,不以自己的博学去揭示别人的肤浅。她给予人的感觉永远像春风般和煦,冬阳般温暖。^①

抗日战争胜利前,吴贻芳校长与国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且相互合作。她以文化界知名人士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主张抗日,主张民主。1943年,她作为著名的“六教授”之一赴美国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抗战期间,她积极参加大后方的妇女活动和儿童保育活动,并培养、推荐金女大学生投身到支援抗日战争的各项有益工作中去。

1946年以后,吴贻芳被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件件政治事件震惊。1946年6月,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南京下关惨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推荐北大教授马叙伦,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吴耀宗等11人到南京求见委员长,呼吁停止内战。可是,代表团一到南京下关,

^①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页。



就遭到暴徒包围殴打。1946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喊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地区6000多名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伤50余人,失踪40余人,造成“五二〇”惨案。

吴贻芳校长对下关惨案进行公开批评,到医院慰问伤员,当面责问国民政府委员长,要求撤销警察局长的职务;深夜探访教育部长,发出不准军警进入金女大抓人的警告;不再做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候选人。

1949年4月,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宋美龄派人送机票给吴贻芳,可是她选择留在南京,继续办学。

1946级校友邵华1983年拜访吴贻芳校长时说:“我看到报上登载你在南京解放前夕对南京治安做了很大贡献。当时致毛主席的电文上署名的有两人,对吗?”吴校长说:“那位军人(马青苑)不是嫡系,而是作为留守军队的负责人留下来的。那时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已撤退,而解放军尚未来到,所以,我就同那位马将军说让我们来维持南京的治安吧。那位将军面有难色,说他人生地不熟,怕不行。我说:‘我可以帮助你,你任正职,我任副职好了。’后来他同我都用了‘副’的名义。”^①

^① 金女大校友会:《永久思念》,1993年版,第67页。



四、坚韧躬行

金陵女子大学在 36 年办学历程中经历了几次生死转折点,而这几乎都发生在吴贻芳任校长期间。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大地上掀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要到政府立案注册。立案注册,将意味着改变金女大创办人的宗旨,如何办? 30 年代,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上海、南京遭轰炸,金女大在南京办不下去,怎么办? 抗战胜利后,金女大在南京的校舍成为“空壳”,如何复建? 4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金女大是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留下? 在这些重要关头,吴贻芳校长始终抱着“竭诚奉职,与全体职员合作,谋求学校继续发展”的信念^①,细致谋划,果断决策,协调各方,战胜困难,既保证了学校的生存,又使学校获得稳步发展。金女大在一次次危难之中挺住了,吴贻芳校长也一次次经受了考验。吴贻芳的胆略和才识越来越得到国内外承认,学生们也越来越敬仰吴校长。

五、无私奉献

金女大定校训为“厚生”。这个词源自《圣经》中《约翰福音》第 10 章第 10 节,原意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① 《金女大校刊》,第 11 期,1929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并且得的更丰盛”。吴贻芳在金女大读书时,就“受基督徒的活动感动”。^①她很赞赏基督的高尚人格——牺牲服务精神,并决心以服务人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吴贻芳担任金女大校长,使她有机会,也有可能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她要培养学生不仅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工作技能,而且要具有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精神。

吴贻芳一方面采用管理手段,以学生团体活动、课外活动、教学实践活动等培养学生乐于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以自身的言语、形象、行为来实践厚生精神,要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人师表,感染、影响学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校友回忆了吴贻芳校长对她们终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做人上,在婚姻家庭,事业,为社会、为国家等等方面都要有奉献精神。

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教授张素我,1933年考入金女大。她说:在金女大读书只有2年时间,但是,吴校长那严肃而慈祥的风度,清晰而爽朗的话语,朴素而大方的穿着打扮,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一个想法时常在我脑际浮动,将来我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无疑,吴校长是我学习的榜样。^②

张素我回忆道,1940年结婚后,与丈夫由重庆迁往西安工作。途经成都时,去探望吴校长。吴校长见到张素我

^① 《吴贻芳1943年10月讲演》,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II/IV/148.2923。

^② 张素我:《回忆敬爱的吴校长》,《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夫妇非常高兴,热情地表示祝贺,又关切地询问抵达西安后的计划,并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成家了,跨进了一个新天地,肩上有两副重担,一是你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二是家庭负担。这两副担子,你都应该勇敢地挑起来啊!”

多少年来,张素我一直牢记校长的教诲,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服务于社会,直至花甲之年仍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又勇敢地承担起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

吴贻芳校长对学生的教育不是一事一议,而是终身影响。她给予学生的是为人哲学,处世之道,为学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女将军、全国人大代表钟玉征,1949年考入金女大化学系。她提到一件事:1950年4月底的一个中午,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年仅42岁的母亲在香港病故。得到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钟玉征姐妹俩失声痛哭。老师、同学都赶来安慰。吴校长赶紧来看望两姐妹,并轻轻地说:“人生总会有各种遭遇。你们还年轻,要有勇气,要坚强。”钟玉征知道吴校长一生坎坷的经历,感到应该学习吴校长博大的胸怀,要多想别人,少想自己,要学会在不幸的时候,从自己内心找到战胜困难的勇气。学习吴校长热爱生活,热爱工作,乐观和坚忍不拔的精神。^①

吴贻芳校长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精力用于帮助、教育、培养学生,而对于个人生活总是克勤克俭,反对奢侈。她的

^①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381页。



一生是为国家,为教育,为金女大,为他人的一生。

南师大金陵女子学院第一任常务副院长,金女大 1944 届校友梅若兰在 1990 年谈到,吴贻芳博士身为一校之长,几十年一直住在一间不到 15 平方米房间里。粗茶淡饭,从来不讲究吃喝。衣着朴素,除了出于礼仪上的需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外,内衣缝缝补补,总舍不得丢。她不要小轿车,只肯买一辆黄包车。她每月的工资除留下生活费以外,其余的都接济朋友。她在外演讲得到的酬金和礼物从不归为己有,一一转赠师生,而且不让受赠者知道。她在外国人面前衣着大方,不卑不亢,令人肃然起敬。

她关心师生胜于自己,逢人总要问寒问暖,使人倍感亲切。她能记住许多师生的姓名,甚至他们的爱好、特长。

她最喜爱的一个谜语是“象牙罐,紫檀盖,里面坐了一棵小白菜”——莲子。她说做人就要像象牙那样纯洁,像紫檀木那样刚强坚实,却又是一棵平易近人、给人营养、价廉物美的小白菜。这个谜语不正是她一生为人的写照吗?^①

金女大南京校友提到 1982 年 4 月吴贻芳给校友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关于设立“吴贻芳奖学金”问题。这一问题是 1981 年五一上海校友严连韵(1920 级学生)、杨立林(1933 级学生)提议设立的。吴贻芳在信中说:“我没有好好考虑,就说×××同学既然急于把她的一笔款子捐出,就先由校友会代收保存。杨、严两位回沪后设立了基金募捐委员会,并发函至各地校友会,后经我全面考虑,甚感不妥,

^①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永久的思念》,1993 年版,第 72 页。



故请她们转告各地,取消原建议。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当由我负责。我再三考虑,现在设立这种基金会是不妥当的。一是因为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取消个人崇拜的倾向。二是去年各地自然灾害严重,‘四化’建设正需要人民群众提供各种贡献(包括经济支援),为国分忧。三是金陵精神是在金女大学习生活中陶冶而成的。每个同学忠于母校,发扬这种精神,不一定用奖学金的办法保持下去,最重要的是把金女大精神贯彻在我们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并感染子孙后代以及所接触到的人。”^①

吴贻芳晚年不仅保持高尚的品格,而且始终关心女子教育事业。1944级校友甘克超说,1984年秋卧病在榻的吴贻芳校长提出兴办金陵女子中学的建议,希望校友会理事会能议一议。因为台湾有一所校友会兴办的金陵女中,办了几十年,办得很好。在南京办一所金陵女中,便于两岸校友间交流。经过金女大校友会几次讨论,提出了一个在较高层次基础上,针对社会对某些职业人群的迫切需要,全面提高职业女性的素质,拓宽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女性的就业机会,兴办一所高等女子职业学院的设想,并将这一意见禀告住在医院的吴校长。校长非常关注地听完陈述,又询问了一些有关职业教育的情况,久久地陷入沉思。

从此以后,尚在病中的吴校长殚精竭虑地思考、筹划着。经过反复考虑,1985年5月11日,吴校长致函江苏省

^① 吴贻芳:《给金女大校友的信》,《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政府,建议在南京师范大学(原金陵女子大学校址)内,增设一所公办民助性质的金陵女子学院,设置中文、实用英语、营养与食品、儿童教育等专业。为便于与国内外校友及其他方面通报信息,争取资助,吴校长还向省政府提出了学院筹备组建议名单。9月24日,在病情恶化,呼吸困难时,仍示意随伺在侧的医护人员将南京校友会黄续汉、方非、曹琬和甘克超紧急召至病榻前,谆谆嘱咐,盼早日办成金陵女子学院。^①

许多校友都说,吴贻芳校长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她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她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但是,她从来没有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融化于人民之中,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着。她与人相处,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并能尊重别人,为别人着想,情愿克制忍受,也从不给别人增添哪怕是一点点儿麻烦。她总觉得自己为国家、为别人做得太少。

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与世长辞,走完了她93年的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她的学生、1926级校友谢纬鹏撰写了一篇祭文,其中说:吴贻芳校长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融会于我国传统的美德中,形成金女大特殊的“厚生”精神。平时对学生爱护备至,却又威严有加。但并不以权威来硬性塑造学生的性格,而是以宗教深入教育的方式来阐明真理与爱心,不仅使学生见到生活美的一面,人生可贵的一

^① 金女大校友会:《永久的思念》,1993年版,第69~70页。



面,同时也了解为人处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宽容,不是报复,是牺牲,不是自私。吴校长的爱心,不但滋润了学生的生命,还使学生发掘了生命的真谛与爱心的泉源,领悟到人生的正义,学会了尊重人、欣赏人,扩大了生活的容量,获得了一个成功的秘诀,即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明晰的观察力,抱着信心,把握着时机,不断地努力去追求,最后获得成功。吴校长是我们思想的导航者,选择职业的辅导者,受挫折时指引我们勇敢前进的明灯。因为经常接受校长的指导和熏陶,校长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磨灭。校长的教训散布到金女大周围每个人的心里,使之代代相传,永不停息。^①另一位校友说:“不少金女大校友和我一样,都以校长为榜样,立志做热爱祖国的,具有渊博知识、高度文化修养的,工作认真负责、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愿意无私献身社会的伟大女性。”^②

六、桃李满天下

评价一所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的重要指标有两个,一是校长的办学成就和教授的学术贡献,一是毕业生的就业成才。学校有著名的校长、知名的教授,毕业生有卓越成就,其社会影响就大。在大学中,学生十分关注名校校长、名教授,希望从他们

① 谢伟鹏:《吴贻芳校长》,《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② 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那里传承文化知识、创造能力、高尚品格；而校长则十分关注培育学生适应社会所应具有素质和能力，希望从学生离校后的事业与发展中获得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和学校地位的提升。

1915—1951年，金女大培养了1000名毕业生。其中，1915—1928年培育了127名本科生；1929年吴贻芳任校长，直至1951年，培育了760名本科生，113名专科生。在当时的几所女子大学中，金女大毕业人数是最多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全国大学在校女生人数逾万。但是，女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成才的数量就多。因为当时相当多的女子接受大学教育后重新回到家庭，“既不愿从事职业以服务社会，更难立志做大事……以结婚为职业，受教育也不过是为选择一个较好的夫婿做准备而已”^①。相比较而言，金女大毕业生的就业和成才率则相当高。1934年前后，中国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失业风潮，金女大毕业生却有供不应求之势。1935年金女大职业介绍部统计：“最近3年来，各方向本校聘请之人数超过毕业生数约3倍，足证社会人士之信任本校毕业生；至谋深造者，数逾全体毕业生1/4。以此而论，在国内殊不多见。”^②深造率和就业率高是金女大毕业生的特征。1947年，金女大对32年来历届毕业生做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本科毕业生共29届732人，其中去世29人，现存703人。毕业后再深

① 潘锦瑞：《今日中国女子教育的检讨与改进》，《妇女文化》，第3卷，第1期，1948年4月。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0周年纪念特刊》，《申报》1935年11月2日。



造者计 191 人,占 27.1%;获博士学位者 38 人,获硕士学位者 73 人,获护士学位者 12 人,在国内继续研究者 2 人。703 人的就业情况:服务于教育界者 242 人(其中,大学校长 1 人,大学教授、行政人员 60 人,中学校长或主任 29 人,中学教员 152 人),占 34.4%;从事社会服务业者 89 人,占 12.7%;医生、护士 33 人,共占 4.7%;科研人员 68 人,占 9.7%;公务员 66 人,写作、编辑 8 人,共占 10.5%;宗教工作者 11 人,占 1.56%;家政服务 142 人,占 20%;其他及不详 44 人。^① 在妇女职业十分狭窄的旧中国,金女大毕业生能在各个领域立足,诚属不易。这与金女大学科专业设置合理,培养的学生有为社会服务、帮助他人的人生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在 1000 名毕业生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家政系、托儿专修科 267 人,占 26.7%,体育系与体育专修科 155 人,占 15.5%,外文系占 7.0%,历史系占 6.3%,音乐系占 5.0%,中文系占 4.7%,医预、护预科占 3.3%,化学系占 7.1%,生物系占 7.5%,数理系占 3.1%,地理系占 2.0%,经济系、哲学系、政治系、宗教系共占 3.0%。吴贻芳说:“金女大毕业生虽然不算多,但在当时女大学毕业毕业生还不多的情况下,她们在我国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我国的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及其他领域有一定的贡献。”^② 金女大毕业生多数具有较强的职

^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 145 期。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8 页。



业意识,事业心强,勤业敬业,能发奋自立,刻苦耐劳,且对社会服务事业有浓厚兴趣。不少人事业有成,为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届校友徐亦蓁,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学习,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硕士学位。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妇女教育事业和济贫救困慈善事业。1946年出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曾创办全国大学妇女学会。晚年住进老年公寓,仍结交朋友,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做心理疏导,帮助他人解决难题。

1925届校友刘恩兰,毕业后出国攻读自然地理研究生,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学家、女海洋学家,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由国务院任命为国家海洋局顾问。

1930届校友何怡贞,毕业后出国留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开创金属玻璃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30届校友徐秀英,毕业后一直任中学教师。1949年迁至台湾,为了继承和发扬“厚生”精神,年过半百的她接受在台北创办私立金陵女中的艰巨任务。在担任金陵女中第一任校长期间,她以校为家,重视学生教育,开办实习家庭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素质、气质与风度,使金陵女中成为台湾办学质量高、有影响的一所高级中学。

1932届校友刘家琦,毕业后获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眼科专家,是美国眼科学院国外委员。她毕生



从事眼科事业,走到哪里,便把医术带到哪里……在商店,在公共汽车上,甚至在街道上,只要见到有眼疾的病人,她都忍不住上前询问,给以帮助。年近8旬,创建全国第一家小儿眼科,填补了国内空白。

1932届校友胡秀英,毕业后出国留学,获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她热心于教育事业,20世纪50年代为兴建金陵女中捐款。60年代,在美国波城近郊买房,为金女大校友、中国留学生提供住宿,为中国植物学留学生提供赴美的轮回助学金。

1941届校友熊菊贞,毕业后出国留学,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开创病毒实验诊断研究。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和领导者,是国际病毒医学界的权威,为世界各地培养了无数病毒学人才。

1943届校友彭洪福,毕业后获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专业硕士学位,一生致力于高山病防治。她花五六年时间研制出“高山神者”——复方党参片,获全国科技大会奖。为了保证高原指战员及时服药,她不顾高原反应,不辞劳苦,坚持每年上高原,讲解高原反应的发病原理,帮助指战员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

1947级校友郑小瑛,出国学习交响乐指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20世纪80年代,她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音乐知识,到剧场、大专院校开设音乐讲座,创建“爱乐女”室内乐团,送音乐上门,听众达20多万人次。

1947级校友鲁洁,在社会学系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地



下党,投入祖国解放的战斗中。南京解放后,回校读书,1953年从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毕业,留校任教,成为教育科学家。她主编的《教育社会学》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她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曾宪梓全国高校教师一等奖,担任全国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1949级校友钟玉征于1948年考入中央大学医本科。因喜爱金女大,1949年重新参加金女大入学考试,被化学系录取。抗美援朝时期,她响应号召参军入伍,进入防化兵行列。以后又去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到军事院校任教。80年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0—1993年,受命参加国际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技术秘书处组织的第2~4轮“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被指定为专家组组长。钟玉征教授在实验中所做的水样处理方法被作为范例,印成专页,推荐给各参试国。中国专家组在数次实验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国际有关权威组织和同行的高度评价。它标志着中国化学防护毒剂分析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1992年,中央军委授予钟玉征一等功。

1950届校友孙家馨,毕业后到上海乐团担任演员和声乐教员,刻苦探索西洋花腔与中国民族唱法的结合,先后学习过“四川清音”、“单弦”、“河北梆子”,在花腔的吐字腔韵方面都有创造。她的花腔演唱艺术,把许多中国民歌唱得“感情真挚,声情并茂”,深得听众喜爱。80年代,担任中央



乐团社会音乐院副院长兼声乐系主任。90年代,列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书。

1951届校友曹怡,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留学苏联,获化学博士学位。60年代中期,开辟光化学研究领域——感光胶片的剖析与合成。70年代,她和同事们出色完成研制高速航空胶片和卫星用胶片的任务,使中国在感光胶片研制方面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80年代初,任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所长。在职期间,在国内率先开展光致电子转移反应的机理研究,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从事高技术应用背景的研究。该项技术研究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曾两次获中科院自然科学成果二等奖。

金女大毕业生遍及海内外,她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吴贻芳校长感到欣慰,使她“教育强国”的理想得到实现。1985年,年过9旬的吴贻芳博士在与她的学生们反复研究后,写信给江苏省人民政府,建议创办一所高等女子职业学院,设置一些既适合女子服务又满足社会需要的专业,如中英文秘书、营养学和儿童福利等,学制2年,公办民助。吴贻芳去世后,在海内外金女大校友支持下,由南京师范大学提请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设立金陵女子学院。1987年3月,金陵女子学院成立,其经费除由政府提供外,还接受海外吴贻芳基金会,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国内外金女大校友或社会个人的赞助。金女大海外校友会为建金陵女子学院教学楼,添置仪器设备、



图书、计算机等捐资 100 万美元。还资助金女院师生到美国进修,国内校友退休后到金女院任班主任、教师、副院长。现在,金陵女子学院已有 1000 多名学生。实用英语、涉外会计、营养与食品专业毕业生得到社会好评。当年吴贻芳为校长时所形成的“金陵精神”及其事业,在今天教育不断发展变革的进程中,仍在继续发扬和发展着。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附

录

吴贻芳学术活动纪要

- 1893 年 1 月 26 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城一个“候补知县”家庭。排行第三，别号冬生。
- 1904 年 3 月，姐姐吴贻芬以命相拼，父母同意姐妹俩入杭州公立弘道女子学堂学习。
- 1906 年 12 月底，姐妹俩在姨父陈叔通开导下，考入上海启明女子学校。
- 1907 年 1 月，姐妹俩考入苏州景海女子学校。
- 1909 年 父亲吴守训因公案投江自尽，生活来



- 源断绝。被迫辍学。全家由武昌迁往杭州外婆家。
- 1912年 全家由杭州迁上海,哥哥、母亲、姐姐相继离世。和9岁妹妹,7旬祖母迁姨父家居住。
- 1913年 在陈叔通资助下,就读于杭州弘道女子学堂,插入四年级学习。
- 1914年 2月,因陈叔通先生赴京就职,随迁北京。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和该校附属小学任英文教员。
- 1915年 12月底,复随陈叔通先生搬到上海。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美籍教师诺玛丽女士来信。推荐入大学深造。
- 1916年 2月,作为特别生插入金陵女子大学一年级。夏,在同班好友徐亦蓁引导下,在上海四川北路曼摩氏女中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学校批准成立学生自治会,被推为会长。
- 1919年 6月2日,带领全校5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
6月25日,成为中国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毕业生。
秋,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先生聘请,担任该校英文教师和英语部主任。
- 1921年 冬,给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参观的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做口语翻译,并表示愿意留



学深造。

1922 年 5 月,接美国密执安大学函,知该校给予巴勃尔奖学金,接受入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学专业。8 月,赴美就读。

1924 年 被推荐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当选留美中国学生副会长,并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

在密执安大学杂志发表《黑蝇生活史》。

1928 年 春,收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聘书,聘请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10 月,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到金陵女子大学。

11 月 3 月,出席新校长就职典礼,发表就职演讲。

1930 年 12 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学校正式注册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是年,在《教育季刊》第 6 卷第 2 期上发表文章《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

1931 年 主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务,将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校的每日早祈祷,星期日宗教仪式均由统一参加改为自由参加,把附中扩充为完全中学。

1933 年 7~11 月,应邀出席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复赶赴班夫出席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会议。

1934 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批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自行



颁发学位证书,不必审。

- 1935 年 5~11 月,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赴美国参加哈佛大学 300 周年纪念典礼。

是年,在《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文章《Women Leaders In New China》(《新中国的妇女领袖》)。

- 1937 年 因 8 月 15 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决定建立 3 个办学中心:上海中心,武昌中心,成都中心。9 月乘船赴武昌。

- 1938 年 1 月,因南京沦陷,武汉吃紧,决定武昌办学中心、上海办学中心迁往成都。借住华西大学女子学院。4 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9 月,在成都华西大借地自建校舍。任学生厚生团会顾问。

- 1939 年 7~10 月,停设数学系、物理系,增设家政系。设立乡村服务处,为当地妇女儿童服务。

- 1940 年 6 月在《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文章《Women In The War》(《战争中的妇女》)。

7 月,停设哲学系。12 月底,作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主席,中国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基督教协进会 10 年大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战情况,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和声援中国抗战。

- 1941 年 3 月,当选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主张抗日,主张民主。



4月,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大专院校专任教员颁奖,获三等奖。

11月,在建校27周年庆祝会上讲演金陵女大精神。

1942年 10月,当选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1943年 3月,参加“六人教授团”,以国民资格到美国各地宣传中国抗战。增设儿童福利专业。

4月,筹募经费,开办儿童福利实验所。

5月,获美国施密斯学院荣誉法学博士称号。再次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奖励。

1945年 4月15日~6月25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1946年 春,组织复校工作。

9月23日,金女院在南京原校址复课。为集中精力于学校重建,辞掉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其他一些兼职。

11月,再次被选进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张兼职不兼薪,将代表和主席办公费捐做家庭清寒的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12月,宣布不参加国民大会主席团。

1947年 年初,当选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会长,世界妇女界中国协会会长。

7~8月,被推选为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9月3~13日,作为中国副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基督教会议。

10月,被推选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会主席。

1948年5月,前往国民政府教育部声明:为了学校的尊严,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特宪不得进入金女大,不得到校内秘密捕人。9月,建议学校训导委员会改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设立生活辅导处,12月底,校董事会召开会议,部分董事建议学校迁往台湾。予断然拒绝。

1948年 4月,主持《大学周报》举办的大学校长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大学教育及当前时局之出路。

1949年 4月22日,退还宋美龄馈赠赴台湾机票,留守南京。

9月初,应邀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1月29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女院第一次教务会议提出:学校课程要注意理论与实践配合新民主主义。

1950年 5月28日~6月,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11月27日~12月30日,金女院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活动。

12月17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金,并停止美元汇来中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面临危机。



- 1951年 1月6日,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经费,金女院改为公办。5~10月,金女院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经教育部批准,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1952年 夏至12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建立南京师范学院。任第二副院长。
- 1953年 1月,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 1954年 8月,吴贻芳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
9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 1955年 1月,被推举为江苏省首届民主妇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3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6月,赴芬兰赫尔辛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 1956年 8月24日,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是江苏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省长。
10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致留美中国学生公开信。
- 1957年 3月,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9月,当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 1958年 4月,赴维也纳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关于新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现状与发展》讲话。
- 1962年 1月,当选民进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连选连任,直至逝世。



是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江苏省分会副主席、中国对外文化协会江苏省和南京市分会会长。

1964年 9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并被选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1966年 2月17日,陈叔通先生在北京逝世。

1966~1970年 文化大革命。曾去江苏省句容县石山头茶场4个月。

1971年 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外事活动、社会活动。

1973年 1月26日,撰写《八十生辰感言》。

1975年 1月30日,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 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重新担任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兼任南京师范学院名誉院长。

1979年 2月,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和平与智慧女神”奖。

9月,江苏省教育学会成立,当选名誉会长。

1983年 3~6月,因病住院治疗。疗养期间,在学生朱绮协助下,撰写《金女大四十年》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9月,当选全国妇联副主席。

11月初,邀请金陵女子大学在美国和加拿大校友回国参加金女大创建70周年纪念活动。

1984年 3月,南京师范学院更名南京师范大学。担任名



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

誉校长。

5月,为《幼儿教育》创刊号撰文,以示祝贺。

1985年7月26日,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在《江苏工人报》发表寄语。

9月,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仍关心妇女高等教育。

11月10日上午8时20分,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人间。



主要参考文献

- 1 金陵女子大学年度报告(1928—1934).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图书馆藏.
- 2 金陵女子大学历史档案卷.吴贻芳档案(编号 2589—3013).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 3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览(1940,1948).南京师范大学综合档案室藏.
- 4 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 5 朱学波.吴贻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
- 6 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7 张竞.吴贻芳.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 8 许辉,戴家馥主编.江苏爱国名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68.
- 10 金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 11 金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续集.2000.
- 12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13 金女大校友会编.我们的歌.金陵女子学院,1987.
- 14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15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 16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 17 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18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
- 19 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 20 程斯辉.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
- 21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22 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23 李喜所,刘集林等.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 24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 2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 26 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师范大学志(1902—1992).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27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
- 28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29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 30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



- 出版社,1987.
- 31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 32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33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 34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35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36 王炳照,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 37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
- 38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
- 30 陈孝彬主编.教育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40 黄志成,程晋宽.现代教育理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 41 毋国光,翁史烈主编.高等教育管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42 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管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43 黄洁珍.从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论文,1996.



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

后

记

参与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具体研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却又是一件较困难的事,一则吴贻芳自己留下的文字著述甚少,二则关于吴贻芳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吴贻芳作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研究很少,可资查阅参考的资料不多。是丛书主编章开沅、余子侠两位教授的鼓励与信任,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子大学及其著名的女校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也是本研究与我承担的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国立、私立、教会大学的比较研究”有关的原因,促使我



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为了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实践与办学思想,我于2002年暑期,乘坐10余小时的长途汽车从“火炉”武汉来到另一个“火炉”南京,在南京师大孙海英教授的热情帮助下,进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的档案资料。由于档案馆规定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不能复印,只能手抄,于是我只得在位于档案馆附近的一家旅馆中住下,早出晚归地手抄相关资料,无暇踏访南京的风景名胜,尽管我是第一次来南京。可手抄资料速度慢,不得已我只好向第二历史档案馆流通部的曹必宏主任请求,能否允许我复印一些相关资料,曹必宏主任得知我来自武汉,专程搜寻资料,参与的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规划的课题,遂允许我复印了一些对研究吴贻芳有重要参考作用的研究资料。若不是曹主任应允,我整个暑期恐怕都要在南京度过了,而由此带来的经费开支是我无法支撑的。因此,我要特别感谢曹必宏主任,是他的理解与支持,使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收获颇丰。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20余年,她管理的学校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吴贻芳在学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形象,在南京查阅资料期间,孙海英教授带我参观了位于南京师大内的金女大校园故址,拜访了吴贻芳的学生——1932年毕业于金女大已是93岁高龄的黄续汉老师,这使我对吴贻芳及金陵女子大学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孙海英教授又将她收集到的有关吴贻芳的资料借给了我，离开南京时，我不仅有了研究吴贻芳的资料，而且增添了研究吴贻芳的信心。可谓没有南京之行，就没有这本著作的如期刊世。由此使我更加体会到在研究中收集资料尤其是占有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收集资料中有人相助的重要。这本著作还是合作研究的结果，我拟定本书的写作提纲后，孙海英教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最后商定我们一同合作完成。本著作的引言、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及第八章由我执笔，第七章、第九章及吴贻芳学术活动纪要由孙海英执笔。我能够完成本著作的大部分，要衷心感谢孙海英教授的帮助。在写作过程中，丛书主编及金林祥、黄书光、梁吉生、吴洪成、张彬、孙邦华等诸位教授提出了许多建议，对我们启发很大，在一起研讨中的愉快情景将同本书系的出版一样，成为抹不去的记忆。本书的责任编辑刘校梅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令我们感动；外聘编辑刘庆芳先生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许多资料，大多注明了出处，并表示衷心感谢，未注明者，敬请谅解。由于时间较紧，对于吴贻芳的研究还有欠缺之处，恳请读者与同行批评指正。

程斯辉

2003年9月28日于武汉大学教科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作者=程斯辉 孙海英著

页数=288

SS号=11530873

DX号=

出版日期=2004年04月第1版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 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就职典礼
- 二、出任校长的外部环境
- 三、出任校长的内在条件

第二章 培养人格、造福社会的办学宗旨

- 一、金女大创始人的办学宗旨：培养为基督服务的妇女领袖
- 二、吴贻芳对校训“厚生”的理解
- 三、女子人格教育主张

第三章 协调关系与社会活动

- 一、协调与政府的关系
- 二、协调与教会组织的关系
- 三、协调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关系
- 四、协调与校友的关系
- 五、社会活动

第四章 专业设置与教学管理

- 一、学科设置与调整
- 二、特色系科及发展
- 三、教学指导思想
- 四、教学管理

第五章 学校组织与教师管理

- 一、学校组织管理的演进
- 二、现任校长与前任校长
- 三、校长与下属
- 四、教师管理

第六章 学生活动与学生管理

- 一、对学生活动的态度
- 二、学生社团建设
- 三、学生活动特色

四、学生管理

第七章 办学经费与学校建设

一、多方筹措办学经费

二、办学经费使用与管理

三、校园建筑及风格

四、校园环境育人

第八章 动荡艰难中的应对

一、应对自然灾害

二、应对政治动荡

三、应对战争环境

四、应对内战局面

第九章 学生眼中的校长

一、严格认真

二、慈爱宽容

三、平等公正

四、坚韧躬行

五、无私奉献

六、桃李满天下

附录：吴贻芳学术活动纪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